

b153106

K250.6  
31  
2:6

# 革命史资料

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出版社

一九八二·北京

A888486



## 革命史资料

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地质印刷厂印刷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29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1982年2月第一版·1982年2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sup>1</sup>/<sub>32</sub> 印张：8<sup>1</sup>/<sub>16</sub> 字数：176,000  
印数：1—13,000册 定价：0.90元  
统一书号：11224·82

# 目 录

## 三陷图国志不泯

..... 庄希泉 (1)

要为华侨争人格——告败英总督——“前次出境证复活”——别开生面的婚礼——我是中国人——第三次遭难

## 立足南粤

——抗战后广东党组织活动概况

..... 尹林平 (9)

最后一个“土围子”的覆灭..... 刘景范 (24)

活捉匪首谢文东..... 谭友林 (31)

蒋军心脏中的一条秘密战线..... 段伯宇 (37)

打进军务局，酝酿反蒋——掌握武装，接上党的关系——加强党的领导，展开地下活动——组织武装斗争，策应解放军解放宁沪

## 二十六路军起义前夕

——在董振堂同志身边见闻..... 高志忠 (53)

回忆东北地区的工人运动..... 唐韵超 (61)

大连最早的工人团体——华人工学会——大连  
早期工人运动和建党活动——反动当局大举镇压  
工人运动——沈阳的工运情况——赴莫斯科  
参加中共“六大”——周恩来在满洲省委传达  
“六大”精神——刘少奇对东北工人运动的  
指导——立三路线对哈尔滨的影响——六届四  
中全会前后——陈潭秋在哈尔滨狱中——大连  
总工会和东北总工会的成立

出使东北军..... 王 英 (88)

拿山一出“戏”..... 金忠藩 (96)

### 初显神通

——记中央苏区红军电台的建立

..... 袁 光 (99)

地下航道..... 曹 达 (107)

“行总”烟台办事处斗争散记..... 张沈川 (134)

中央苏区第一任粮食部长陈潭秋

..... 钱希均 (150)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红二十四军的片断回忆..... 陈子毅 (156)

确山暴动..... 林壮志 (168)

徐向前同志忆彭湃..... 李而炳 (183)

## 日 记

延安纪事…………… 续约斋(186)

## 专 访

### 送往草岚子监狱的两封信

——孔祥祜同志谈“六十一人”出狱

…………… 本刊记者 石肖岩(223)

## 考 证

### 红四方面军为什么要撤出鄂豫皖革命

根据地…………… 谭克绳(232)

## 传 记

李鼎铭传略…………… 李敬谦 熊宇良(242)

### 关于张汉民烈士的资料

张汉民同志是怎么牺牲的…………… 周益三(247)

张汉民同志被杀经过…………… 徐文伯(250)

# 三陷囹圄志不泯

庄希泉

**【编者按】**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侨联主席庄希泉同志，最近不顾九十四岁高龄，在北京医院口述了他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而三次入狱的经历。我们刊载于下，以示对这位爱国华侨领袖的敬意。

在我近一个世纪的生涯中，曾三度被捕入狱。第一次是一九二〇年，在新加坡，因反对英国殖民当局企图扼杀华侨教育事业的苛刻教育条例，被英国殖民当局拘捕，前后关押五个月，最后被判“永远驱逐出境”；第二次是一九二五年，在厦门，因反日，被日本人逮捕，解送台湾，关押三年多；第三次是一九三四年，因在菲律宾办报，反蒋抗日，在一次回国省亲途经厦门时，被蒋介石反动派抓捕，险遭杀身之祸。往事历历，颇堪回首。毛泽东同志说过：“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我的大半生均在与天斗之中渡过的，在今垂暮之年，回忆往事，倍感与帝国主义、反动派斗，确也其乐无穷！

## 要为华侨争人格

一九二〇年，我在新加坡与余佩皋女士一起创办“南洋女子学校”，我为董事长，余为校长。女校着重培养华侨学校师资，对发展华侨教育事业无疑是有力的推动，因而引起殖民统治者的嫉恨。又值国内“五四”运动之后，反帝怒潮风起云涌，“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山东”等口号亦传至星洲，爱国侨胞痛失胶州，拒绝参加英殖民政府举办的所谓庆祝欧战胜利的活动，致使英人极为恼怒。遂于一九二〇年五月间，突然抛出《海峡殖民地教育条例》。这是一个以控制、扼杀华侨教育为手段，以镇压华侨爱国运动为目的的苛刻条例。条例规定华侨办学必须经英殖民政府批准登记，校长教员必须经审查才可就职，教材必须经审核批准方可采用，国内来的师生亦必须经审查，才可任教和入学，并订有罚款、取缔等措施，确是一项有辱我国格、人格的条例，因而遭到全海峡七州府三百万爱国侨胞的强烈反对。我们联合学界、商界、工界人士，组织“学务维持处”，发起签名请愿运动，短短几天，签名人数达二十余万，其声势之浩大、群情之激愤，为星洲前所未见。当时，我被推举为三位华侨请愿代表之一，到新加坡华民政务司抗议、申辩；余佩皋女士则被选为回国请愿代表，要求政府提出国际交涉。那时，我天天奔走呼号，真是舌弊唇焦，经常一天只吃一餐饭，我公开声明：“这种条例如果实行，不但华侨回复到从前愚蛮状态，而且殖民政府亦要耻笑我们。我虽牺牲全盘生意，亦要替华侨争回一点人格，我一定反对到底！”致使殖民当局视我为眼中钉。

当年七月二十四日深夜十一时许，我刚自“学务维持处”开

完会回家，途中窜出五、六名密探，一拥而上，把我拖至侦探室。等候到凌晨二时，侦探长才来问话，不由分说，先将我身上衣服、鞋袜统统剥下，搜查数遍，然后给我戴上手铐，押赴警察局拘留所，彻夜不容入睡。我要求电话通知亲友，亦遭拒绝。拘留所里，污秽不堪，臭虫满屋。一连关押我二十四天，迟迟不作处理。

一天，午后两点钟左右，来一警察，把我和陈寿民（他后我一天被捕）带出拘留所，送往不远处的一座三层楼房，那里，一间间牢房密如蜂房，这就是七州府最大的监狱——西朗敏。从拘留所到监狱，是一条沙砾路，我因鞋袜被剥，赤脚踩在尖石碎瓦上，步履维艰。我心中全无惧怕，却暗自好笑，自己平日作惯高等游民，从未赤脚行走，现在尝个滋味，颇觉新鲜。但是狱中犯人，均埋头做工，警察密密巡视，稍不如意，即挥鞭抽打，惨不忍睹。警察把我们带到一间屋子里，已有三人先在，一个是审判官，一个是华民政务司官员，再一个是翻译。审判官列举逮捕我们之缘由，皆是无理找理，不堪一驳。例如说从我鞋子里搜出一张印刷品，便虚张声势审问我有什么“密件”，为何藏在鞋袜之内？原来我穿的一双新鞋，太硬磨脚，便顺手拿了一张纸垫上，以减轻皮肉之苦，不料竟被当成什么“密件”，真是可笑复可气。我和其他代表据理一一驳斥，自下午二时至五时，一场唇枪舌剑、斗智斗勇的审问才结束，但毫无结果。

### 告败英总督

根据《海峡殖民出境律》规定，必须经过审判，始可判驱逐出境。一旦判了出境，限期半月便要送出，不能延长拘留。如不



经审判就驱逐出境，则只能让人自由出境，而不能拘留。这是五六十年前订下的条例，但殖民当局很少执行。

我被捕时，拘票即已写明驱逐出境，这是当局执法犯法之一；我被拘留后又大大超过所限两星期，此为执法犯法之二。就这两项违法事，我决定对英总督起诉。这一决定震惊了华侨界，不少人听了吓得吐舌，一个殖民地侨民，竟胆敢告掌握生杀大权的总督，真是破天荒的稀罕事！告总督不单冒极大风险，而且要花许多钱延聘律师，甚至要倾家荡产。但我意已决，即使为此耗尽钱财，再遭厄运也要上告！官司一直打到英国伦敦。在事实面前，殖民主义者为维护其虚伪的法制，不得不判总督败诉，我完全胜诉，予以当堂释放。而历来被判出境的，从无一人能获释。侨胞闻悉，莫不额手称庆，热烈迎接我出狱。这次斗争，我虽罄尽家财，却为中国人格尊严得以维护而兴奋莫名。

### “前次出境证复活”

然而，当时的中国毕竟为弱国穷民，国内当权者又不维护海外侨胞利益，我纵使胜诉亦难逃他们的巨掌。不出三星期，他们又挖空心思找借口，继续对我进行迫害。竟说我虽告败总督，但判我出境的理由仍然成立，于是以“前次出境证复活”这一极其荒谬的理由重拘我入狱。扬言除非华侨代表公开承认错误，可望获释，否则没收财产，递解出境。有的代表，经不住高压利诱，屈服了。我坚持认为，维护华侨教育权利，完全是正义之举，无错误可言，决不认错！我被监禁五十多天后，被强押出境。

强押出境那天是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二日下午三点，三个侦探如狼似虎地逼我下船，我只穿单衣一件，行李全无，幸有几个朋

友闻讯后匆匆赶回，为我取来简单行李，船便启航了。我实在气愤不过，质问英国侦探：“我反对苛刻教育条例正大光明，你们送我出境，反用这等黑暗手段，以后我们中国人觉悟日高，都会起来反对你们这种苛例，你们这样逼人出境，不知要害死多少人！”而那个侦探长却涎皮赖脸，不理不睬。我于悲愤中写下《满江红》词一首：

闷坐监狱，厌闻那呜呜汽笛。问你是为甚事情，只因惜别，惜别呀本来无谓，但今日却难尽说。唉我的泪珠儿滚滚，簌簌簌。且住么，人要逐。回去呀，终难恕。我十年相亲的侨胞呀，望你勿从此灰心，望你勿从此便棍，待故国山河重改造，从头说。

### 别开生面的婚礼

自我被捕入狱那天起，余佩皋女士即想方设法进行营救保释，并负起我责，继续领导侨众进行斗争，表现出她那坚定、沉着、乐观、自信的美德。允许探访后，她又每日必来看望，交换监狱内外斗争情况，商讨对策。在斗争中，我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我获释后的第二个星期，我们决定结婚，并举行一个别开生面的婚礼。

十一月七日，我俩在同德书报社举行一个演讲会，会上，说明我们对婚姻家庭的新看法，请大家共同研究。由于官司诉讼，我俩只剩几元钱作结婚茶点费，但那天到会的，足有二千余人，后到者竟无立足之地。

婚后一星期，我夫人佩皋即被大家推选为代表，只身回国，奔走于京沪之间，尽历艰辛，吁请国内各界及当局予以支持。而

我在她准备动身之前两天，又遭无理拘捕，那时，我们全身心均系于维护华侨教育事业之上，极少顾及个人及家庭，嗣后十数载，直到一九三四年，佩皋身心交瘁，因病离世之前，我们均处于惊心动魄的斗争之中，而罕有宁静、安谧的家庭生活。

### 我是中国人

我被逐出境回到厦门，脚踏祖国大地，心头颇感兴奋。在南洋办学，备受阻挠，现在，我要在自己的国土上，重振旗鼓！在爱国侨胞慷慨解囊支持下，我又办起一所中学，定名为“厦南女子中学”，以此向帝国主义表示继续抗议、示威。我和佩皋，倾尽心力，抱着为中华民族争光，为海外侨胞争气的赤诚心愿去工作，果然，厦南女子中学办得生气勃勃。

一九二五年，发难于上海的“五卅”惨案波及全国，作为五口通商之一的厦门，很快掀起反日高潮。厦南女中的师生们，上街游行，抵制日货，慷慨陈词，为受难同胞募捐，一时间，革命、爱国的气氛弥漫校园。日本人、国民党右派对此极为恼恨，竟无理将我拘禁。

当时，日本人说我是台湾人（我祖籍台湾），而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我即为日本侨民，故应遣送台湾审理，把我强推上船，押往台湾。一到台湾，立即加扣手铐，把我作为杀人嫌疑犯对待。原来，在我即将解赴台湾之时，福建国民党亲日派林仲复被杀，日本人疑我为指使人。从此，我与亲人海天相隔，天天翘首西望，在台苦熬一年多，尝尽人间地狱之苦楚。但我奋斗之心不灭，虽寒天恶食，我仍坚持锻炼身体。

后来我才知道，在我被捕以后，大批国民党军警，手拿刺刀

长枪，包围了我的住所，扬言抓共产党，来捉佩皋。佩皋在亲朋护送下，匆绕后山逃走。之后，佩皋反英反日之志更坚，经常出席各种抗日集会，发表演说。

一天，佩皋开完会回家，走至半路，突遭枪击，幸而子弹只将衣袖穿透而未伤及皮肉，她在反动派明枪暗箭的目标之中却毫不畏惧，人们称她为“奇女子”、“女界之丈夫”。

我在台湾关押一年多，获释时，日本人不许我返回大陆，我只好取道东京，再转赴南洋。当船泊上海码头时，我趁人不注意，悄悄离开码头，潜回市区。我因受够了所谓日本侨民之苦，回上海后，即办理申请中国公民证，并在《新闻报》上发表声明：“我是中国人，并非日本侨民。”署名“庄海涵”。后来，为了更明确表达我爱中国，我是一个中国人的心愿，特意改名“庄一中”，所刻一方图章，至今犹存。

### 第三次遭难

三十年代初，我与王雨亭（前侨联副秘书长）在菲律宾合办《前驱日报》，办报宗旨就是反蒋抗日。由于该报旗帜鲜明，影响遍及海峡各殖民地。蒋帮政权为此很是恼火，然而，鞭长莫及，除指使歹徒，不时给报馆骚扰捣乱外，只好望洋切齿。

一九三四年夏，我从菲律宾回厦门省亲，突遭国民党军宪逮捕，声言要把我送福州审判处决。我父亲四处奔走，设法营救。那时，日本人恨我不愿当其顺民，便提出要将我引渡日本审理。我说：“我是中国人，不是日本侨民，我坚决反对引渡！”但卖国的国民党深怕得罪日本人，反过来强迫我说：“你不引渡不行。”我终于被引渡到鼓浪屿日本领事馆的拘留所。

在拘留所，我目睹日本看守对犯人的残酷毒打，实在按捺不住心中怒火，便跟看守争吵起来。凶狠的日本浪人见我竟然顶撞看守，上来就打，拳脚交加。我也不示弱，凭我平日刻苦锻炼出来的体格，也能招架一番。他们气急败坏，把我双手拷起来打，我头被打破，血流不止，但我始终不屈服。周围的犯人非常惊奇，我怎会有此胆量与这些凶残成性的日本浪人较量。日人见我不服，找我问话：“你身为日本殖民地侨民，为什么总要反对我们？”

我说：“你们这些日本人侵略欺压中国人，我当然要反对。”

他们又问：“你是台湾人，为什么要退出日本籍？”

我说：“我祖祖辈辈都是中国人，从来就不是日本人。”

当他们最后问：“你是做生意的，有日本籍不对你更有利吗？”

我淡淡地回答：“不需要！”

从日本拘留所释放后，我来往于上海、南洋之间，我租苏联影片到南洋放映，宣传十月革命，并继续办学。

就这样，我先后坐过英国的、日本的、国民党的监狱，受尽帝国主义、反动派的折磨，痛感华侨没有强大祖国做后盾，终难扬眉吐气。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万侨振奋，奔走相告。强大的中国，终于使广大侨胞摆脱海外孤儿的悲惨处境。但十年内乱中，林彪、“四人帮”却把归国侨胞赤诚之心伤透了，爱国华侨绝不是“特务”、“资本家”的同义词，他们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为了祖国的繁荣兴旺，可以倾尽财力，即使献出生命也会在所不辞的。

(黄霭玲整理)

# 立足南粤

——抗战后广东党组织活动概况

尹 林 平

(全国政协常委 广东省政协主席)

一九三六年，我在福建工作时，与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书记薛尚实）有联系。抗日战争爆发前，我在福建漳州、厦门作党的秘密工作。一九三七年七月，闽南红三团何鸣部队事件发生的当天，我根据闽粤边特委指示，到香港向南委汇报红三团被缴械事件，要求中央出面交涉，挽救这支人民武装力量。以后我就留在南委工作。当时香港已有八路军办事处了。同年冬，根据上级指示撤销南委，成立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组织部长薛尚实、宣传部长饶彰风、军委书记林平（即尹林平）、职工部长梁广、妇女部长张越霞（博古的爱人）、青年部长麦蒲费，省委常委有张文彬、薛尚实、梁广、张越霞、林平等五人。广东省委属长江局领导。长江局书记起初是王明，王明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被撤职后，这个地区党组织由周恩来同志负责领导。

一九三七年成立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和广州市委（书记罗范群）。同年冬撤销广州市委。广州失守前又成立东南特委，以梁广为书记，吴有恒为组织部长，杨康华为宣传部长。

一九三八年春节（一月底或二月初），广东省委从香港迁回广州。同年五、六月间，张文彬曾到长江局开会，回来后传达了有关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等问题。同年九、十月间，张文彬到延安开会，听说这次会议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曾听张文彬说过，周恩来同志在长江局工作期间，曾同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武汉失守前，长江局的干部和工作人员从武汉撤至长沙，遇到国民党采取所谓“焦土”政策，火烧长沙，后转到重庆，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以周恩来同志为书记。参加南方局领导的有叶剑英同志，以后又增加了董必武同志。当时，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活动地区属中央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和江南部分游击区属南方局领导。在抗日战争时期以及解放战争初期，广东党组织属南方局领导。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广州沦陷，广东省委迁至韶关。同年冬，召开省委会议，长江局组织部长兼秘书长黄文杰到韶关向省委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正在扩大侵华战争，要打通粤汉铁路，占领长江中下游流域。因此，粤汉铁路以东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都属敌后。我党在这些地区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摧毁敌伪政权，建立人民政权，工作大有可为。指出，要独立自主地领导武装斗争，不要被国民党捆绑手脚。要批判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国民党要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

团结的方针。开会前，我曾写信给长江局，要求回部队工作，因为我到广东之前是军队干部。黄文杰对我说，不要回部队了，要我到东江地区去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这次省委会议决定成立东江特委：书记林平、组织部长饶卫华、宣传部长饶彰风、青年组长饶璜湘、妇女组长余慧。

省委会议结束后，我到东江地区组织游击队开展抗日斗争。抗日战争前，广东原有两支武装队伍：一支由冯白驹同志领导的，是大革命失败后十年内战时期坚持在海南岛进行斗争的武装队伍，在最艰苦的年代仅余下数十人；另一支是由古大存同志率领的，活跃在大埔县一带的武装队伍，最后仅留下十余人。我还听说抗战前陈毅同志在南雄县活动期间也有一支武装队伍，但是后来由谁领导，有多少人，都不清楚，也没有联系上。

一九三九年六、七月间，根据上级指示，省委改组，书记张文彬、组织部长李大林、宣传部长涂振浓、统战部长古大存、妇女部长张越霞、秘书长王均予（解放后曾任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副院长）。

一九三九年又决定成立以下特委：

西江特委：负责人冯燊。

粤中特委：负责人罗范群。

粤北特委：负责人黄松坚。

江西赣南特委（负责人杨尚奎），这个时期中央决定也归广东省委领导。

原闽粤赣边委负责人是张鼎丞、谭震林、邓子恢，一九三七年底、三八年初组织新四军北上后。中央决定成立闽粤赣特委（省级机构，直属中央领导），负责人方方。



一九四〇年一月，李大林到惠阳向我们传达党中央、南方局的指示，指出国民党已掀起反共高潮。说国民党的反共三步骤是：第一是“容共”，国共合作；第二是“溶共”，让我们的一些干部当官，溶化我们；现在是第三步“熔共”，就是要消灭我们的革命力量。我们要放手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力量，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坚持抗战。如果国民党进犯我们，我们就坚持反击。要发展抗日力量，要做好舆论工作，争取社会同情，坚持又斗争又团结的方针。要把蒋管区已暴露身份的工作人员撤退出来转到游击区工作。

一九四〇年下半年，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成立，书记方方，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文彬、宣传部长涂振浓、秘书长郭潜（即郭铁梅，后叛变）、副秘书长姚铎、妇女部长苏惠、青年部长吴华（即吴济生），南方工委机关设在梅县，领导广东、广西、江西、福建等地区。南委归南方局领导。这时，广东设立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组织部长饶卫华、宣传部长黄康、统战部长饶彰风、青年部长陈能兴、秘书长严仲（陈志华）。粤北省委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另设粤南省委，负责领导香港、珠江、南路、粤中的沦陷区。粤南省委书记梁广、组织部长王均予、宣传部长石辟澜。粤南省委一九四一年底撤销。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寇南侵，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央来电给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廖承志同志，指示：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高潮以后，许多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因在国民党统治区站不住脚，撤退到香港；现在，香港已沦陷，要想方设法挽救这批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廖承志同志把中央来电口头告诉了我。他还对我说：胡公（指周恩来同志）也有电

报来，说许多民主人士被困在香港，这批民主人士当中有的是我国文化的精华，要用一切办法把他们转移到国民党统治区的安全地带。广东党组织坚决执行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大力从各方面开展组织营救工作。结果，邹韬奋、沈雁冰、沙千里、沈志远、千家驹、胡绳、廖沫沙、张铁生等八百多人从香港安全地转到内地，同时，还有英、印、美、荷、比等十几个国家的几百名外国人也在我们帮助下撤出香港，转移到叫做大后方的国民党统治区。关于这件事，《华商报》在一九四六年二、三月间曾登载过。

这批民主人士路过游击区时，张文彬同志同他们曾举行座谈会，研究同国民党当局谈判并报告南方局请示谈判问题。一九四二年三、四月间，张文彬同志在宝安县东江总队队部，说周恩来同志有电报指示：据确凿消息，国民党反动派要消灭我部势在必行，要我们不要幻想与他们谈判，要高度警惕，要坚持依靠群众进行坚决斗争才有出路。这是我们建立电台后第一次直接收到南方局的指示，在此以前的中央指示，都是通过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转来的。

约在一九四二年春、夏间，郭潜被捕叛变，江西省委首先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跟着，粤北省委于一九四二年五月遭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广西工委也被破坏。南方工作委员会也在同年五、六月间遭到破坏。这一年，江西省委的谢育才被捕，南委除方方同志安全转移外，涂振浓被捕后叛变。张文彬同志被捕后在狱中受摧残病故，廖承志同志也在广东乐昌被捕。同年八月。南方局发电报给我们（当时我担任东江特委书记、东江敌后前线特委书记、惠东宝抗日游击总队政治委员），指示说：“据确实消息，南方诸省，广东、广西、江西省委以及南委都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破

坏。为避免事件的继续扩大，中央决定：除敌占区、游击区党组织照常活动外，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一律暂行停止活动；已暴露身份的干部，一律转移到游击区工作；其余干部应谋找职业（如教书、做工、做小生意等社会职业）作掩护，多交朋友，约定暗号，定期联系，等待时机以恢复工作。”并要我们设法把这个指示转告同我们有联系的组织。我们接到南方局这个指示后，立即把它传达给下属各级党组织转告全体党员。当时，我们电台与南方局经常有联系，一般报告由电台报南方局，有时也一并报延安党中央。

广东党组织虽然暂时停止活动了，但是，在过去几年中，省委还是做了不少工作的。当时派出不少同志到各地联络，争取了许多同志来部队工作，同时还与各地组织加强联系。同中央密切联系，使许多革命工作还能正常开展。然而，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原则性不强，如郭铁梅原是公开了的干部却调南委搞秘密工作；警惕性不高，如江西省委已破坏，南委同省委几个月没有联系，还派谢育才去当省委书记，谢一接头就被捕了。

抗日战争发生后，在武装问题上，当时省委一些同志也是不够明确的。在广州沦陷前后，省委在开会时曾争论过。我提出要搞武装，搞敌后游击战争，八路军、新四军驻广州办事处主任云广英同意了，我们两人联名写了关于开展广东游击战争的意见报告中央军委，叶剑英同志批复同意我们的意见，但省委一些领导同志不够重视，他们主张多交朋友，强调要坚持与国民党团结抗日。结果，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军侵入广东，国民党部队溃不成军。而我们的武装工作又衔接不上来。当时我们在农村也做了一些工作，组织了壮丁义勇队。如东莞县壮丁模范队就发挥了很好

的作用。廖承志同志要曾生同志在东江组织了一支部队。我们帮助吴勤也组织了一支部队，并派了一些人进去。从当时的情况看，我们是有了一些武装的，但省委对这些武装队伍只派了不足三十名干部。而且也没有注意放手发展革命武装组织。所以，我们掌握的武装的力量还很小。后来，广州沦陷了，省委迁到韶关，组织青年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搞了一点，但还不是独立自主搞的。省委一些同志强调搞统战，说帮助国民党，联合抗日，搞什么“统一战线模范省”，送了八百多名党员和进步青年到国民党军队中工作，没有把主要力量放在农村发动群众，把工农武装起来。假如我们当时独立自主地搞武装，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一九四二年九、十月间，南方局直接给我们发来指示，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支持已发动的太平洋战争，要打通南北交通线；国民党军不堪一击，我们不要把抗日希望寄托于国民党身上。我党要依靠群众，积极领导广大人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并指示成立广东军政委员会主持工作，以林平为军政委员会主任，委员有连贯、梁广、曾生、王作尧、林锵云、罗范群、梁鸿钧、杨康华。

十二月，南方局又来电说，由于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成立广东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临时省委）。以林平为书记，连贯、梁广为委员；并规定林平抓全面工作，主要是抓军事工作；梁广抓城市工作，主要是抓广州、香港、澳门等城市的工作；连贯抓蒋管区党组织联络工作和对华侨统战工作。嗣后，临时省委在南方局直接领导下，开展全省城乡抗日斗争以及各项工作。这个时期广东的东江、海南岛、珠江、韩江、南路、粤中、北江等各个地区的抗日斗争蓬勃发展。

一九四三年上半年，日本帝国主义扩大太平洋战争，在广东敌占区拼命抢粮食。这一年广东发生大旱灾，出现大饥荒，饿死很多人。我们把这个情况报告党中央、南方局。中央、南方局在这期间曾三、四次通过电台指示我们，在灾荒期间，要关心群众、关心战士，要我们想方设法领导广大群众渡过灾荒。我们看到这些指示，深受感动，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积极带领群众抗灾渡荒。在部队提倡节约渡荒，规定干部每天食四两米（每天两餐稀粥），战士每天食六两，挤出粮食救济老百姓。经过一段时期的抗灾斗争，这一年的下造有了较好收成，整个形势有了好转。

一九四三年八月间，广东各地党组织恢复建立，其中包括：

前东特委：书记是黄宇，委员有谢鹤筹、张持平、黄庄平、陈铭炎、郑重、余慧。

后东特委：梁威林、饶璜湘。

粤北特委：黄松坚、邓楚白。

珠江特委：罗范群、刘田夫。

西江特委：冯燊、梁嘉。

南路特委：周楠、温棹华。

同年秋，南方局来电，指示我们把惠东宝抗日游击总队的番号改为东江抗日游击纵队，以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并指示我们发表《东江纵队成立宣言》、《省委告广东人民书》。我们起草了宣言和告广东人民书用电报发至党中央、南方局。南方局把《宣言》和《告百粤人民书》修改后转发回来。经过修改后的《宣言》和《告百粤人民书》旗帜鲜明地揭发了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政策，指出了中国人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打败日本帝

国主义，收复失地，建设新中国。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坚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权的主张，决心打到鸭绿江边，把日本帝国主义彻底赶出中国。与此同时，我们还把东江纵队的人选名单报送党中央、南方局。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日，经党中央批准，东江纵队正式成立，司令员曾生、政委林平、副司令员王作尧、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梁鸿钧、政治部主任杨康华。一九四四年夏（五月间），中央批准珠江纵队成立，以林锵云为司令员，罗范群为政委（后改为梁嘉），副司令员谢斌。同年十一月，粤中游击队公开宣布成立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以梁鸿钧（后牺牲）为司令员，罗范群为政委，谢立全为副司令员，刘田夫为政治部主任。以后，我们共有电台六、七部，同党中央、南方局、新华社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了。

一九四四年八月，临时省委与东江纵队领导人开联席会议，会后写了一个报告给中央和南方局。报告分析了当时形势认为，国民党已完全放弃抗日，只是一心反共反人民；依靠国民党反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武装全中国人民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为此，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人民武装斗争，凡是共产党员都要参加到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革命斗争中来；要从现有的几支抗日武装扩展到全省的人民抗日武装斗争，要恢复党的组织活动。中央和南方局很快复电给我们，说临时省委、东江纵队领导人联席会议的报告，中央完全同意；指出报告所提出的工作方针和任务是符合中央最近指示精神的。指示要积极恢复党组织的活动，推动全省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开展。同时还指示我们协助开展广西方面的工作，要动员全

省党员为实现省委的八月决议而努力工作。我们收到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后，立即组织东征队——向粤东挺进；西征队——向西进军直至南路到达广西边境；南征队——到达两阳（阳江、阳春）；北上队——挺进到北江。这时，潮梅、东江、北江、西江、粤中、南路等地的党组织均积极开展了活动。广东临时省委加强了对各地党组织的领导。

一九四五年三、四月间，中央通过南方局指示我们，由于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要把临时省委改组为广东区党委，委员人数比过去适当增加，但因战争环境不宜过多，委员名单由我们提出后上报中央，我们报了区党委委员名单十五人。后中央说委员人数多了一些，要我们研究酌减后再报。后因抗日战争胜利，忙于接收工作，所以第二次名单来不及报中央。我们当时曾研究决定区党委委员为九人或十一人。中央还指示我们把领导机构从宝安转移到东江北岸罗浮山。

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为纪念党的生日，广东区党委原拟在博罗县的罗浮山冲虚观开会，由于人员未到齐，延至七月六日才开，至二十一日结束。会上正式宣布成立广东区党委（人员已按中央指示减少，但未报），书记林平，委员有连贯、梁广、曾生、罗范群、林锵云、王作尧、梁鸿钧、杨康华、冯燊、黄松坚等。会议期间，中央以及南方局均发来指示，指出，由于整个革命形势已起了大变化，要使抗日武装斗争全面平衡发展，中央决定派几支部队南下，并告诉已由王震、王首道两同志率领的一支部队将到粤、湘、赣边区的五岭，广东应派出游击队到粤北与王震、王首道两同志的部队会合，以五岭为根据地，发展人民武装，坚持抗日斗争，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我们遵照中央的指示，派

部队到粤北的南雄、始兴附近一带。后来，由于抗日战争胜利，中央通知王震、王首道北回。因此，会师未成。

八月，延安通过南方局电台转来中央的指示：日本帝国主义已投降，抗日战争即将全面胜利。各级党组织要迅速做好动员工作和组织工作，扩大武装人员，解放中小城镇，建立革命政权，接受日军投降。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我们即开始接收日伪军的武器，由曾生同志负责这项工作。由于我们事先进逼各敌据点，对敌军开展了宣传攻势，许多敌伪按指定地点投降，交出武器（就在这时，蒋介石下令日伪军就地驻防维持治安，没有他的命令不准交出一枪一弹给共军）。与此同时，我们及时把收缴的武器用来扩大部队和武装人民群众。同年九月，南方局转告广东党组织：毛主席已去重庆谈判，通知各级党组织不要担心，要不断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后又转告，为了粉碎蒋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我们决定从八个解放区撤出，以便适当地集中我们的力量。并告今后斗争方针，要广东党组织团结广大干部、群众坚决执行中央决定，坚决自卫，反击内战。

一九四六年二月间，南方局来电，命林平秘密乘飞机到重庆准备参加谈判，并命林平在去重庆之前，想尽一切办法迫使国民党承认华南有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当时，国民党妄图取消我们，死不承认广东有抗日游击队。南方局指示我们要依靠群众、干部，团结一致坚决反击国民党军的进攻，并要我们在报纸上揭穿国民党反动派不承认华南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的反动阴谋。我们即在香港《华商报》等八份报刊上登载了广东各地抗日游击队在抗战期间抗击了多少敌人，收缴了日军多少武器，建立了



游击根据地、人民政权，标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华南抗日部队的战绩，并报导了我华南抗日部队曾营救了一批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外国侨民，从香港安全转移到内地，以及美军设在东纵的联络处等闻名中外的大事件。三月初，我按通知到达重庆，住在曾家岩。南方局开了盛大的欢迎会，欢迎叶挺、廖承志、林平等同志到达重庆。会后，周恩来同志指示我在重庆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我发表了广东抗日游击队八年抗日斗争的经过战绩，指出有人妄图否认和取消华南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存在的阴谋。翌日，重庆《新华日报》即以广东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政委林平将军抵渝的标题予以报导，并报导了我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谈话和华南抗日游击队抗战战绩。

当时，国民党矢口否认华南有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张发奎拍桌狂吠，胡说什么广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只有土匪。对此，周恩来同志予以严词驳斥。经过多次斗争，国民党最后被迫承认事实。

当时，广东游击队牵制了国民党六个军。国民党希望将我广东游击队撤走，以便他们部署内战。国共重庆谈判最后签订了停战协定。为了集中兵力，我方从八个解放区撤出部队转移到华北其他解放区。按照协议，广东游击队要北撤。为此，中央决定八路军派滕代远同志、新四军派郑绍文同志、华南抗日游击队由林平同志为代表，同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具体谈判解决部队撤出的有关问题。周恩来同志给我的指示中谈了两个问题：一、在北撤中，要防止敌人的袭击；二、广东游击队北撤到达的地点应在陇海铁路以北。后来确定我军到山东烟台登陆，撤退人数定为二千四百名，由美国军舰负责运送。不北撤的战士复员，发复员证及复

员费，教育他们回到本地继续团结群众参加生产，并随时准备响应号召重新归队闹革命。

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同志白天同国民党谈判作斗争，晚上回来又向我们讲谈判斗争情况。他常常工作至凌晨二、三时。有时一边开会，一边批阅文件。

一九四六年三月，周恩来同志回延安。我在他离开重庆的第二天也到延安。周恩来同志带我去见了毛主席、刘少奇同志，毛主席同我谈了一个多小时，先问我是哪里人？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然后谈了有关工作问题。我向刘少奇同志作了广东革命工作的简略汇报。我在延安住了三天即回重庆，过几天就同廖承志同志回广州。

我回广州后，负责处理东江纵队北撤的问题。撤退时，全省各地均留下了一批力量以保卫群众利益，进行合法斗争。并且，省委为指导各区工作在各地设立特派员。

前东特派员：蓝造、祁锋。

后东特派员：梁威林、严尚民。

粤北特派员：黄松坚。

赣南特派员（兼管粤北地区）：刘建华。

南路特派员：周楠、温焯华。

西江特派员：梁嘉。

珠江特派员：曾谷和谭桂明。

潮汕特派员：林美南。

东江纵队北撤时，原计划我也是随军一起走的，由梁广负责广东工作。所以对一些人的安排和决定，我没有参加研究。后来，中央又决定要我留下。东江纵队北撤人员在一九四六年六月

底集中在宝安县大鹏湾上船，七月一日启航北撤至山东烟台。

一九四七年一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撤销中共广东区党委，成立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由刘长胜、方方和林平等同志负责。香港分局归上海局（书记刘晓）领导。后来，刘长胜由于工作需要离开香港。中央通知，方方为香港分局书记，林平为副书记，章汉夫、连贯、许涤新、夏衍、刘宁一、梁广等为委员。

分局下面设有：‘城市工委，梁广；侨务小组，连贯；统战小组，林平、连贯；文化小组，章汉夫；财经小组，许涤新；青妇小组，苏惠、余慧、黄焕秋。此外，林平还管农村武装工作，苏惠还兼管组织工作。

香港分局辖许多区，各区负责人如下：

闽粤赣边区党委：魏金水、刘永生。

粤赣湘边区党委：林平、黄松坚、严尚民、梁威林、左洪涛、黄文俞。

粤桂南边区党委：梁广、杨应彬。

粤中区党委：冯燊、吴有恒。

海南区党委：冯白驹。

粤桂边委：梁嘉。

湘南特委：唐麟。

赣南特委：刘建华。

桂滇黔边区党委：周楠，后来林李明、庄田。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中央指示：香港分局改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委员照旧不变。一九四九年八、九月间，中央指示，华南分局改组，以叶剑英同志为第一书记，张云逸同志为第二书记，方方同志为第三书记。

以上是广东党组织机构在抗日、解放战争时期的简略变迁情况及其开展斗争概况。有些情况可能记忆不周不确，仅供参考，并望尚在的有关同志予以补正。

（何锦洲整理）

# 最后一个“土围子”的覆灭

刘 景 范

(全国政协常委 民政部副部长)

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提到了打“土围子”之事，它指的是一九三六年，在陕甘宁地区，我红军和游击队消灭且八寨反动地主武装、摧毁最后一个“土围子”的战斗。

且八寨成为最后一个“土围子”，这是有它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所造成的。

且八寨，座落在陕西省保安县城西南约八十里的且八镇附近。它在洛河上游，金顶山东南二十华里，永宁山西北八十华里，且八镇南面的一个山巅上，和且八镇只有一条洛水之隔，且八镇在洛水北，且八寨在洛水南。

还在早年，保安当地人民，为了防范战乱和土匪的骚扰，利用险要地形，修筑了很多城堡与山寨。且八寨是其中的一个。这是一座石寨，寨后深沟，两侧是陡峭的山崖，来往只有寨前一条小路，易于防守，不易攻入。这座石寨，后来被保安县的头号大地主——曹俊章霸占了。为了保护他的田园家产，压榨人民，曹

于民国年间办起了民团，成了当地的土皇帝。旦八寨也成了反动势力的“土围子”。

一九二九年，保安县开始有了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在群众中的影响很大。

一九三三年冬，在红二十六军不断取得胜利的影响下，陕甘边特委开始在保安县发动群众，开辟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当时，这个县里地主占据的山寨和崖窑——即“土围子”很多。山寨有：堡子山、新寨、金顶山、刘家老庄、李家塔、永宁山、保娃沟门、陈家砭、旦八寨等；崖窑有：老崖窑、小崖窑、井家坪、罗儿坪、刘家砭、李家嘴、边家嘴等，共二十几座山寨和崖窑，大部分有地主武装。要建立根据地，首先就要扫除这些“土围子”，消灭地主武装。一九三四年春，保安游击支队成立，它的任务就是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消灭“土围子”，建立根据地。到三五年，除旦八寨外，全县的“土围子”都被消灭了。就连驻在保安县城内的国民党八十六师一个步兵团，在红军胜利形势的威逼下，也逃跑了。

旦八寨地主武装头子曹俊章，是顽固的反革命分子。其长子曹创业，曾是共产党员，后来叛变，曾捕押了红二十六军派往陕北工作的曹士荣同志和保安游击队班长王文昌同志。三四年夏，国民党十七路军杨子恒部队的仇良民团，与甘肃庆阳反动民团谭世林和陕西靖边地主武装张廷芝一起，“围剿”陕甘边南梁苏区。曹俊章为向敌人邀功请赏，将以上两位同志交给了“围剿”部队。这两位同志惨遭杀害。

旦八寨民团还经常出来骚扰破坏苏区，袭击根据地的群众和领导机关，曾杀害了在七区工作的董子良同志，在四区工作的王

荣贵同志，在三区工作的冯世光同志等。

为了消灭这一支罪恶累累的反动民团，彻底摧毁这一“土围子”，游击队和红军曾三打旦八寨。

一九三四年秋，陕甘第二路游击队——合水支队，雨夜袭击旦八寨，虽然攻入寨内，但没有消灭敌人。游击队只没收了一些财产，就撤出了。更遗憾的是，没有破坏寨上工事。游击队一撤出，敌人又占据了旦八寨。

三五年五月，保安游击队和当地赤卫军又围攻旦八寨近半月。正在进攻陕甘边苏区的敌军——宁夏马鸿逵部，派了一个团来救援，袭击了游击队，这次进攻未能成功。

三六年秋，陕甘红二十九军一个团，曾围攻旦八寨几天，中途调走，也未攻克。

三次攻打旦八寨，都未能奏效。敌人气焰嚣张，利用山上有水井，地形险要，又屯集了大量粮食，修筑了坚固工事，而成为难以攻破的堡垒。

当时，游击队的装备很差，为了保存实力，不能轻易打攻坚战。对这个有坚固堡垒防守的敌人，只能采取发动群众，围困、封锁、孤立的办法，以图消灭他们。因而，旦八寨这股顽敌虽未消灭，但处在苏区包围、封锁之中，完全孤立起来。

三五年秋冬，西北工作委员会王明左倾路线的执行人到陕甘边区，他们在甘泉、保安部分地区的土改中，提出的口号是：“地主从肉体上消灭，家属赶上山去吃草，富农扫地出门。”在执行这条路线的过程中，一些地方杀掉地主，撵走家属，把富农及其家属赶出家园，编入劳改队劳改。在划阶级成份时又搞扩大化，把一些富农划成地主，富裕中农划成富农。在这种左倾做

法影响下，旦八寨附近的地主、富农及一部分中农，纷纷逃进了旦八寨子，大大地帮了敌人的忙，使旦八寨反动武装力量更为加强了。

更为严重的是，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又在陕甘边苏区进行了主观主义的“肃反”。把开辟陕甘边根据地的领导人和一大批干部，当做反革命逮捕关押，甚至杀害。他们还杀害了一些投奔革命队伍的人，如：保安县起义的民团芦仲林等二十多人，和小学教员高景山、陈宝学等五人，来到陕甘边区政府所在地——下寺湾，左倾路线的执行者，把他们看成是反革命阴谋，统统杀掉；曹俊章的二儿子曹成业，在榆林中学学习时，参加了共产党，三五年回家后，对其父亲所做所为十分不满，从旦八寨跑出来，但他一跑过来，就被当做“反革命”，杀掉了。寨内对曹俊章不满的人，再也不敢投奔红军了。乱抓乱杀，使一些不坚定分子叛变投敌，如：保安四区游击队队长张克俭，家庭是中农，左倾路线执行者将其家定为富农，并为肃反对象，张克俭便带着游击队叛变，杀害了县委书记任文明同志，投奔了旦八寨曹俊章。左倾机会主义者的种种做法，引起了农民极大的恐慌和动摇。反革命乘机大造谣言：“红军被白军消灭了，刘志丹也被杀了。”煽动群众反水。结果，一九三六年一月，保安县二、四、七、八四个区的一部分不坚定群众反了水。地主、富农勾结旦八团匪，袭击区、县政府，抢劫公私财物，杀害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和红军家属，使这个地区人民的生产与生活遭到严重破坏。党中央和毛主席到陕北后，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底，释放了被左倾路线错捕的干部，纠正了错误的“肃反”政策和土改政策。在中央正确政策的指导下，三六年三月间，平复了这次叛乱，在平乱过程中，叛乱首领



投奔了旦八寨。

这样，旦八寨“土围子”中，由原来二十几户人家，二十几支枪的武装，增加到一百几十户人家，二百多人的武装，并和国民党特务有直接联系。寨内驻有国民党“西北剿共总部”派来的军统特务，人称孙副官，指挥曹俊章的反革命活动。旦八寨成了陕甘宁苏区危害最大的一个反革命据点。

三六年红军西征，迎接二、四方面军，陕北的部分县被敌人占领，党中央由瓦窑堡转移到志丹县（这时保安县已改名志丹县）。旦八寨直接威胁着党中央机关的安全，党中央决心消灭这个“土围子”。

周恩来副主席亲自召开会议，布置了消灭这个“土围子”的任务，并组织了攻城指挥部，调中央警卫团团长白志明同志任指挥，我兼任政委。作战部队是由中央警卫团两个连，陕甘独立团的三个连和志丹县的地方武装组成，约七、八百人。

周恩来同志指示我们：要采用军事围攻和政治瓦解并重的方针。同时指出：旦八寨内象曹俊章这样的死反革命分子是少数人，多数是受骗的农民。其中一部分是对我们错误的“肃反”和过“左”的土改政策不满意，或有顾虑的富农和富裕中农。要向他们宣传目前的革命形势和我们党的抗日主张。向他们说明，我们党中央已纠正了左倾路线，纠正了“肃反”和土地改革中的错误。要争取群众，分化、瓦解反革命势力。

围攻旦八寨子，是一九三六年八月开始的。

旦八寨防范严密，寨内修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寨两旁的悬崖下，是一片开阔地带，不易隐蔽，白天难以接近山寨。我军曾两次夜间搭云梯，攀悬崖，想攻上寨墙，但均未成功。当时，红军

装备很差，围攻部队虽有两门八二迫击炮，但因弹药陈旧，往往不是射击不准，就是炮弹不炸，寨内又是坚硬的石头工事，炮弹作用不大，许多机枪也不易发挥火力作用。红军围攻一月之久，仍未攻克。

对于这样一个坚固堡垒，强攻伤亡太大，我们便在围攻同时，展开政治攻势。在白天加紧围攻之下，晚上政工人员摸到寨墙下，向山上喊话。同时，用掷弹筒将传单射到寨子里。因我是当地人，寨子里有认识的人，晚上便亲自到寨下喊话，宣传我们党的政策。逐渐，寨内一些老百姓，不太害怕红军了，有的晚上悄悄吊下城墙割草。

有一天夜里，我们争取来了几个割草的农民，招待了他们，向他们讲明了政策，要他们回去向群众宣传。我又写了一封信，托他们带给寨子里的曹景斌，约他第二天晚上在城墙下见面。

曹景斌，原是曹家河人，学生出身，当过小学教员，和我熟悉。他家被定为富农，因害怕扫地出门，全家逃进了寨子。

第二天夜里，曹景斌果然在城墙上等我，我讲明保证他人身安全，请他下来谈话，他便攀着绳子，下了寨墙。

我领他到指挥部，招待他，并向他讲明：我党中央已纠正了“左”的土地政策，把不应该没收的土地和财产退还给他们，劝他们回家安心生产。还向他指出：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已在甘肃会宁一带会合，中国革命形势起了重大变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已扩大与巩固。曹俊章妄想死守旦八寨，等待国民党军队卷土重来，只能是梦想，绝对办不到的。如果继续跟着曹俊章，是没有出路的。目前，日本帝国主义已在华北建立了伪政权，我们党中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不论阶级、党派，

只要参加抗日，我们都欢迎，都一视同仁，与人民享受同等权力。我们一直谈到后半夜，最后我送他回了寨子。

接着，我们又发动了一次群众性的宣传运动，动员许多团匪士兵的家属，逃进寨上的地主富农的亲友，在寨子外面喊话，宣传党的政策。这样，每天夜间，有成百上千的人在寨下喊话，有父母叫儿子的；有妻子叫丈夫的；有儿女叫父母的；有爷爷叫孙子的；有哥叫弟的，弟叫哥的；也有朋友叫朋友的；且八寨“四面楚歌”。

不久，寨子里的人夜间纷纷逃出寨子，回家了。有的团匪中的士兵，还随身带着枪支，向当地政府缴械投降。从寨上下来的人，当地政府都给予妥善安置，分给他们土地和口粮、农具、牲畜，使其回家安心生产。

寨子里的人越跑越多，前后跑出来近百人，人心已乱，战斗力大减。曹景斌给我们送来消息说：寨中人心动摇，已守不住，望加紧进攻。

红军加强攻势，十二月的一个晚上，冲上了寨墙，敌民团很快溃败，即使曹俊章全家督战，也无济于事。曹俊章无法，只得带少数人，拼命突围，逃跑了。且八寨这个最反动最顽固的“土围子”终于覆灭了。

曹俊章跑出了苏区，跟随他逃走的团丁也分化了，他们最后将曹俊章打死，大部分都回到了苏区。

（刘尚雅整理 一九八一年三月）

# 活捉匪首谢文东

谭 友 林

(乌鲁木齐军区政委)

一九四六年，四平战役后，为了巩固后方，我东北部队在深入发动群众的同时，组织了强大的剿匪部队，对分散在山区的土匪部队进行清剿。当时，我在三五九旅任副旅长，奉命率部到合江、牡丹江一带执行这项任务。

牡丹江一带有好几股土匪，如谢文东、李华堂（座山雕）、张黑子、车力行、孙云九等，不断出来骚扰我解放区，给我们发动群众带来极大的困难。当时势力最大的要算谢文东匪徒。谢文东是东北人，曾是抗日联军某军的军长，对牡丹江一带地形很熟悉。当时日本鬼子都对他没有办法。后来，由于谢的副官叛变投日，日本侵略军才把他抓住，接着把他和他的母亲都弄到了东京。在软硬兼施下，谢终于投靠了日本帝国主义，天皇还送给他一个金菩萨，以保长命。从此，谢文东领了一个伪满劳工大队长之衔，做了铁心汉奸，干了许多丧尽天良的坏事。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谢文东摇身一变，成了牡丹江一带的保安司令。蒋介石派了专员专程送去委任状和绸子等，以示慰劳。谢文

东受宠若惊，他又死心踏地地为蒋介石卖命，在我东北后方不断进行骚扰，破坏地方政权，搞得老百姓人心惶惶。消灭这股土匪成了当务之急。

我们部队进驻到这一带时，谢文东势力已经发展到了一万多人。我们旅部驻在东安市，那里曾是谢的独立王国，他有自己的铁路、银行、企业。我们进驻后，他们已经到牡丹江一带活动。于是我们就把部队调到牡丹江一带，以勃利为中心，开展剿匪工作。当时我们的部队有新八团、九团、骑兵团，地方上有独立团、骑兵大队等，都归合江军区统一指挥。

开始，由于没有经验，曾采取了用大兵团“铁壁合围”的正规战，总不能奏效。因为这是一股惯匪，集中了地痞、流氓和地富分子，非常反动，加上他们地形熟，特别是里边有不少抗日联军的叛徒，对这一带的森林山地很熟悉，我们占领县城，他们就跑到农村，借助青纱帐进行活动；我们到东边，他们又跑到西边，往往使我们扑空，很难抓住这些狐狸。

不久，总指挥部派来贺晋年同志，成立了剿匪指挥部，他任指挥，我任副指挥。根据以前剿匪用正规战不能奏效的经验教训，我们在佳木斯开了一个会，研究了土匪的活动规律，重新部署了作战方法，决定在土匪经常出没的地方安上一些钉子，即派上一个连以上的部队驻在几个据点。然后用大部队穷追猛打，使土匪不得有喘息的机会。这下搞得这些土匪无容身之地了。

冬天到了，东北的青纱帐已经倒下，这是我们作战的好时机。因为青纱帐一倒，大股土匪在农村活动失去了天然掩护，加上我们在许多地方安上钉子，驻上部队，并把牡丹江各个渡口都派上部队把守，把他们的各条出路都堵死了。于是，我们又派出

小分队到农村，积极开展发动群众工作，使他们完全失去了对农村的依托。

谢文东这只老狐狸看到大股活动已经不行，就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把他的部队分成几股，自己带几百人钻到山里去了。牡丹江一带山高林密，方圆几百里无人烟，一进入里面，抬头不见太阳，地形不熟的人，弄不好就出不来。记得我们有一个连曾经和大部队失去联系一个多星期，克服了重重困难才转出了森林。后来老百姓告诉我们，欲进入深山老林，必须带足粮食，用砍刀在树上砍下记号：东一西二南三北四。这个办法果然灵，以后，我们就逐渐进入森林进剿。

土匪在进入山林前也曾作了充分的准备，他们建立了一些据点，把粮食藏在一些古树的树洞里。我们进入森林，拔了他们的据点，把所藏的粮食都搜出来了。敌人断了粮，天气又冷，想下山搞粮食，可到处都驻有我们的部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犹如惊弓之鸟，整天奔跑，没有吃的，只好杀马充饥，战斗力已经完全丧失，士气也极其低落。而我们却兵强马壮，士气非常高，特别是一些朝鲜族的同志参加了剿匪工作，他们不仅地形熟，而且能吃苦，打仗非常勇敢，土匪非常怕他们。

我们把圈子越围越小，看见乌鸦起飞或发现炊烟，我们就马上追击，亡于奔命的土匪越来越无处藏身了。他们只好等待牡丹江封冻以后，设法过江逃跑。已经快封江了，一天，谢文东派出的侦察员下山来侦察封江情况，一下被我们抓住了。我们很热情地招待他，已经长期没有吃到饱饭的匪徒，狼吞虎咽地吃着我们给他的肉和饭，他没想到解放军能这么宽大，我们趁机晓以大义，指出当土匪没有出路，希望他立功赎罪。这个匪徒很受感

动，表示愿意改过自新。我们就把他放了，要他把谢文东等引下山来，他欣然同意了。

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匪首谢文东领着一批匪徒到了四道河子和五道河子之间的一个村子里，而那里我们已经设下了埋伏。

敌人还未站稳，我们的八团和独立团已经团团把他们包围了。一声令下，部队似洪水般的冲进村子，一下就把他们打垮了，俘虏了三百多人。但是查来查去，却没有发现谢文东。后来，从一个俘虏的口中得知，谢文东一看情况不好，便匆忙带着儿子和一个马夫溜走了。

时间已经接近春节，老百姓开始准备年货，部队也准备过年。但是战士们因为没有抓住谢文东很不甘心，老百姓也担心谢文东东山再起。因此，我们下决心要抓住这只老狐狸。

谢文东会往哪里跑呢？我们进行了调查研究。根据分析，他没有吃的，一定会到平川去找老百姓。我们找到一个采蘑菇的老人，他住在四道河子，对谢文东比较熟悉，平时也受尽了匪徒的苦，所以很热情地帮助了我们。他说：“估计谢文东还未跑远，山碓子那边封江比较早，说不定会在那里过江，可以到山碓子那边搜一搜。”

我们八团有个五连，是个新兵连队，连长姓李，因为没有让参加剿匪战斗，很着急，李连长来找我请战，我就把搜查谢文东的任务交给他们。为了鼓舞他们的士气，我又对他们讲了一番话：“虽然这一带茅草很深，但是人家连蘑菇都能找到，难道三个大活人还抓不到？我们不抓到谢文东，决不休兵。”五连接受了任务，愉快地走了，这时贺晋年同志从五道河子给我来电话，说他

要回去汇报工作，也快过年了，剩下两、三个人就算了吧！我说，谢文东没有抓到，还有些事也要处理，这时候我还不能走。接完电话，我就回到五道河子，问问还有什么事。

事也凑巧，当天下午我正在午睡，通讯员从四道河子给我来电话，说是谢文东抓到了，并报告了详细的经过。原来是那天下午三点多钟，五连根据蘑菇老人所提供的线索，到山碓子一带搜索。忽然发现土地庙旁边冒起一股青烟，那是谢文东的马夫正在用茶缸烧饭。战士们悄悄地摸了过去，大喝一声：“什么人？”马夫惊慌失措地举起了双手，接着又缴了谢文东和他儿子的枪。这时谢文东已经化装，穿着蓝布衣和日本的短大衣，但是蘑菇老人一下子就把他认出来了，谢文东一见蘑菇老人，也只好乖乖地承认。

我让赶快把谢文东送到五道河子，为了防止他半途逃跑或出别的意外，战士们把他捆在抬架上，一直抬到了五道河子。带进来以后，谢文东象死狗一样，一下跪在我的面前，弯着肥胖的身子，秃顶的脑蛋直磕头，哆哆嗦嗦地说：“司令饶命！只要不杀我，我帮你们喂猪都行。”当年土匪的那股骄横劲已一扫而光。我严肃地说：“杀不杀，要由群众决定。你现在必须老老实实，调皮捣蛋对你没有好处。”他连连点头：“是！是！”

我赶紧把这消息报告了贺晋年同志，他非常高兴地表扬了五连的同志。后来，我们把谢押到勃利，经过公审，因他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终于把他枪毙了。抓到谢文东，我们出了号外，老百姓非常高兴。

谢文东消灭以后，其他几股土匪还没得到消息，陆续出来找谢文东，也先后被我们消灭了，车力行、张黑子、李华堂（座山雕）、孙云九等八个匪首都被抓住服法。只有杨清海，被我们打



了一下，匪徒几乎全被歼灭，他自己带了两、三个人跑了，搞了我们一个区公所，又拉起了队伍，后来我们又花了两、三个月才将他消灭。

开始，许多老百姓对抓住匪首将信将疑，看来发动群众还有些障碍，我们把匪首的脑袋砍下，装了八个盒子，拿到佳木斯示众，参观的人你拥我挤，人山人海，这下群众才真正相信土匪已经剿灭。

土匪消灭以后，群众一下发动起来，掀起了一个参军参干、支援前线的热潮，为以后土地改革运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由于这次剿匪比较彻底，使我们的后方得到了巩固，这也是使我们的解放战争和后来的抗美援朝战争，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的重要原因。

(黄国平整理)

# 蒋军心脏中的一条秘密战线

段 伯 宇

八年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反动派不顾全国人民和平民主的要求，公然破坏“停战协定”，疯狂地发动内战。战火弥漫全国。

在人民解放军奋起反击的同时，在国民党统治机关的核心，还存在着一条地下战线，来策应我党的解放战争。参加这条战线的成员，是国民党军队内部分裂出来的有觉悟的同志。他们不满意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考虑了国家、民族的前途（当然也考虑了个人的前途），逐渐的接受了党的影响，选择了革命的道路。

当时，上海地下党策反工作所涉及的蒋方军队很广泛，我所联系的武装力量，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有贾亦斌同志领导的国防部预备干部总队，刘农峻同志领导的伞兵第三团，段仲宇同志领导的淞沪港口司令部及附属的汽车队三个团，王海峤领导的工兵第四团，齐国楮领导的江苏保安总队，以及宋健人、宋光烈所联系的×××军和××军。总的兵力约为五个（特种兵）团、两个总队和两个军。它分布在西迄芜湖、南京，东至常州、上海、嘉兴、杭州，沿长江千里的防线，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形成了一条看不见的地下战线。

一九四九年三月底，为了策应我解放大军渡江，解放宁沪，由地下党负责策反工作的张执一、李正文同志传达了上级党的决议，由贾亦斌同志领导预备干部总队四千人在嘉兴起义，刘农峻同志领导伞兵三团在上海起义，以瓦解蒋军军心；并联系驻××的××军，驻××的×××军，策应我军渡江；其余部队配合当地的解放斗争。参加这条战线的同志们，在接到党的任务后，在各自的岗位上，果敢地执行了党的任务。

由于我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条战线的工作，因此对于全部过程比较了解，现按斗争的进程，分章陈述。

### 打进军务局，酝酿反蒋

一九四六年春，我从陆军大学毕业，我弟弟段仲宇当时在国民党军务局当参谋，他提出让我到他那里去，我考虑在当时形势下，如能打进军务局，将来对我党是有利的。所以我就同意了他的意见。一方面由他向军务局局长俞济时介绍，同时我又利用社会关系见到军务局参谋总长徐永昌（徐是陆军大学我父亲同学），由他分我到军务局。经过以上的关系，我于当年六月间打进了国民政府军务局。

该局前身是蒋介石的侍从室，为反动头子蒋介石的最高军事机要部门。下有六个科，各科的参谋人员基本上是陆军大学毕业的，我分在主管军事情报的第四科，从此有了一个有利的工作据点。但是工作怎样做，真是束手无策，何况我当时是和党失掉联系的共产党员，要在敌人的心脏里反蒋，怎么搞法，更是心中无数。我迫切需要找到党的领导，可找不到，当我知道中共代表团到南京，就想尽一切办法和代表团取得联系，多次冒险到梅园新村，

终以敌特监视严密而不能接近。正在无可奈何的时候，我偶然发现第四科的内部材料中，有国民党中宣部收听翻印的我党各个时期的文件和毛主席等领导人的言论讲话。这些材料是国民党内部研究对策用的，可是由于他们的反动本质，看不进去，而且也不愿看，被放置在一边，尘土满筐。我看到之后如获至宝，正如在黑暗中见到了光明。这些文件也就是我当时学习和工作的依据。

一九四六年夏天，陆军大学的同学先后分到南京的伪国防部和各军事机关，我和部分同学早在陆大时已建立了联系。毕业离校后，借着同学聚餐又在一起，更觉接近。这些同学有贾亦斌、刘农峻、宋健人等十余人，会餐多半是在×××的家里，以后就在贾亦斌的家里，他当时是以蒋经国为局长的国民党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的代局长。所以在饭前饭后，可以海阔天空的谈，也可以接触一些时事。宋光烈、王海峤等同志更多的在我家接触。当时涉及的问题是在八年抗战之后蒋介石又打内战，搞得烽火遍地，民不聊生，大家不约而同的对此不满，希望和平，反对战争，希望民主，反对独裁。一九四七年蒋军在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节节失败，接着蒋介石所谓重点进攻也被粉碎，随后刘邓大军向大别山一带挺进，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同学中如贾亦斌、刘农峻等同志感到国民党前途无望，又不甘心同归于尽，曾表示脱离国民党，回家当老百姓。当时我提出应采取积极的态度，弃旧图新，走自新之路。在谈论中得到贾亦斌、刘农峻、宋健人等同志的同意。

一九四八年秋季，随着蒋军前方的失利，国民党统治区出现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群众运动。潮流所趋，国民党的内部也出现了动摇。就在这个时候，一天下午，我正在军务局，突然接到贾亦斌同志的电话，约我到他家一谈，说有几位同学在等

我。傍晚，我到干河沿一〇九号（贾的寓所）。见到有贾亦斌、刘农峻、宋健人等五、六位同学，挤在一个小书房里。南京的晚秋，气温还是很高的，我见他们敞着衣衫，卷着袖子，争论的面红耳赤。以往同学碰面都有礼貌，有时谈的很有风趣，从未见到过这样紧张的情形。我感到茫然，就问亦斌是怎么回事？他沉思了一会，激昂慷慨地说：国民党贪污腐败，苛捐杂税，横征暴敛，搞的民不聊生，蒋介石八年抗战之后又打内战，失掉民心，前方节节失利，败局已定，我们不能跟他同归于尽。今天同学们讨论的主题，要在南京搞暴动，带领部队包围飞机场，选择时机，把反动派一网打尽。如果失败，就占领紫金山，上山打游击。贾亦斌讲完后，问我有何意见，我当时思想上没有准备，觉得很突然。我当时考虑，既不能挫伤大家的热情，又不能附和贸然行动，便讲了几点意见，首先表示同情大家的心情，但要估计敌我的力量，南京是蒋介石的军事重地，集结重兵，我们的行动，无异以卵击石；第二，讲了我们要搞革命，就不宜盲动，更不能快意一逞，应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的搞；第三，要掌握武装，积蓄力量，待机行动。我的话得到多数人的同意。

自碰头会之后，大家分头运用各自的条件，争取部队，同时想方设法找党的关系。不久郭蕴璋到了南京，和我接头之后，他提出亲自到解放区，找旧同学王兴纲、陈锐霆、王启明等同志接关系。从此，我们策反工作，由以前的思想准备，转入实际行动的阶段。

### 掌握武装，接上党的关系

一九四八年冬，我们掌握了一定的力量。贾亦斌同志在宋健

人的协助下，成立了预备干部总队约四千人，刘农峻同志接了伞兵第三团团长，都驻防在南京郊区。王海峤争取到工兵第四团团长，驻苏州。齐国楮领导了江苏保安总队，驻常州、金坛一带。宋光烈、宋健人联系了×××军长×××（驻××），××军军长×××（驻××）。段仲宇同志争取担任了淞沪港口副司令，主管海上交通和宁沪杭铁路的运输，驻上海。临行之前，我嘱咐他牢牢掌握交通，保证日后的交通联系。

同年冬，济南战役，敌守军被歼，王耀武被俘，我解放军兵锋所指，黄百韬兵团又被歼灭，接着徐州被解放。蒋介石惊惶失措，一面布置淮北战役，同时布置江防，在国防部的调动中，下令把预备干部总队开到嘉兴，伞兵三团开到上海市郊的安亭，工兵四团开到杭州。这个时候，我们派去解放区和党联系的郭蕴璋由河南回到南京，告诉我和解放区的城市工作部联系的情况，城工部的同志接待了郭并与王兴纲（我入党的介绍人）、陈锐霆、王启明同志联系上，得到了他们回电。城工部的同志约定我的代号为“白人”（伯字的拆写），以后由组织上派人和我联系。我焦急等待着，可一直等到年底也没有党的同志来找我联系，这时贾、刘、王、段他们，都已转移到上海附近，为了便于联系，我借病脱离了军务局，由南京去上海，集中力量搞这项工作。

年底，我到上海后，住在宝山路的家里，那是段仲宇就任淞沪港口副司令时把我接去的，地点在宝山路和宝昌路的交叉点上，是一幢两层楼房。作为段仲宇的住家，装有电话，地点邻近火车站，交通联系也方便，在段仲宇的掩护下也比较安全。我的家以后也成为联系工作的据点。

我有一个表弟温尚煜，在上海同济大学读书，他经常到我家

去。我到上海的当天晚上，他见到我，头一句话就说：“我已入党了”。尚煜很进步，我在南京时曾叫他找过党的关系。当听了他的话后，我真是喜出望外，忙把他拉到我的寝室里，把我的工作概况告诉他，并告他我是失掉关系的共产党员，嘱咐他马上回校找组织上汇报，要绝对机密。

隔了几天之后的一个下午，尚煜领着一位年长的同志来到我的家中，介绍说，这是张执一同志，来接你的关系。我心情激动极了，多年的心事要向他倾诉。张执一同志却是有经验的，他当时并未答话，只是透过室内四周望了望，才说，这座房子很孤立，我们另找个地点好好谈谈。当时我提出我的三弟段叔宇住处在山阴路的一个巷子里，比较隐蔽。我们便到那里谈了一个下午，主要是我向张执一同志汇报我在重庆工作时和周诒同志失掉关系的经过，以及失掉关系后继续为党工作，打进军务局，团结争取了一部分进步的陆大同学，并通过他们掌握一部分蒋军的情况。希望党加强领导。张执一同志听了我的汇报之后，表示今后由他直接主管这项工作，随时和我联系。

不几日，大约是年终，张执一同志对我说，你们这部分工作量很大，单位很多，又分驻在宁、沪、杭各地，需要专派一位同志和你联系。并约定于新年元旦在指定的地点见面。届时我到指定的地点，一家饭馆的楼上，张执一同志和另一位同志已在等我，张执一同志介绍了李正文同志，并说，今后专门由正文同志和你联系，指导工作。之后，我们便一同早餐，共渡新年。

### 加强党的领导，展开地下活动

李正文同志接了工作后，抓的很紧，经常到宝山路找我联系。

我把当时几位主要人员贾亦斌、刘农峻、段仲宇、宋健人、王海峤等同志的情况以及部队的情况，详细地向正文同志汇报了。接着由正文同志分别找他们谈了话。我还向正文同志转达贾亦斌、刘农峻、王海峤、齐国樯等同志的要求，希望党派人到部队加强联系，并提出我的建议。经正文同志与组织研究之后，先后选派了张文藻同志到预备干部总队协助贾亦斌同志，调周其昌同志到伞兵团协助刘农峻同志，派王声明同志到工兵团协助王海峤同志。当时陈景明同志和齐国樯是同学关系，我同意他到江苏保安总队协助齐国樯。经过以上的工作，进一步密切了这些部队和党的关系。

接着李正文同志由我陪同到嘉兴，看了贾亦斌同志和他领导的预备干部总队。为了争取时间，我和正文同志又分别看了驻防安亭的刘农峻同志和伞兵团，驻在杭州的王海峤同志和工兵团。最后我和正文同志去南京，约见了×××军军长。××军驻在××，因为长江被严密封锁，由我转达了李正文同志的意见。

一九四九年二月间，李正文同志向我传达了上海党的决定，组织上认为我在失掉关系之后，继续独立工作，做了一定的工作，决定恢复我的党的关系。我倍感党的信任，决心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党。三月间，我向正文同志提出刘农峻、宋健人等同志希望入党的要求，并提出我的意见。当时正文同志问我，为什么不提段仲宇？我讲，因为是我的弟弟，可以多考验考验。正文同志说，在几个月的接触中，他表现很坚定，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听党的话，应该发挥他的作用。我当然同意。经过组织上研究，于三月底、四月初由正文同志告我，组织上已批准刘农峻、段仲宇、宋健人等同志入党。

这些同志在斗争中曾接受了考验，下举两例：



(1) 保护宁、沪、杭铁路工人反饥饿、反迫害的罢工运动。解放战争中，上海、南京的学生在党的领导下，发动了反饥饿、反迫害的群众运动，当时宁沪铁路、沪杭铁路的工人也相继响应这项运动。一九四九年的元月中，南京、杭州两路局的工人集中到上海，包围了上海铁路总局，发动索薪、罢工运动。这一运动吓坏了在上海的反动头子汤恩伯和上海警备司令陈大庆，他们派了宁沪、沪杭两路局局长王兆槐和上海警察局长毛森进行镇压，并调了伞兵三团的一个营警戒。当时段仲宇担任铁路军运指挥官，伞兵营归他指挥，也叫他参加这件事的处理。段仲宇是个军人，他没有处理过工人罢工和群众运动，正在紧迫的时刻，李正文同志来到他的军运指挥部，段仲宇向他汇报了紧急情形，正文同志告诉说：“要保护铁路工人的运动，不能流血，同时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因为你还担负着更重要的革命任务。”段仲宇接受任务后，经过慎重考虑，亲自赶到现场了解情况，这时两路局的职工群众大部分集中到红房子两路局的院内外，情绪激昂，喧声沸腾，他了解了群众的要求，紧接着又去看部队，这时伞兵营也开到了车站附近。反动头子陈大庆指示镇压工人。当罢工群众看到部队，更加情群激昂。段仲宇为了避免引起冲突，发生流血事件，他当机立断，命令伞兵营集合。当时已深夜时分，严冬的季节，天寒露重，他指挥部队到车站大厅，列队休息，暂避风寒，旋即召集伞兵营连排长以上人员训话：“没有我的命令，任何情况下不得开枪。”一切部署妥当后，他来到车站大楼会议厅。这时，路局局长王兆槐和特务头子毛森，在群众的包围中被迫答应工人派代表谈判，接着又为代表名额进行讹诈，段仲宇到达后，提出为了避免事态扩大，达到谈判的目的，可以考虑

工人代表增加名额。在情况紧迫下，王兆槐怕事态扩大，酿出流血事件，首先同意段仲宇的意见。特务头子毛森原幻想凭借武力来恐吓群众，但当他感到伞兵指挥不动时，也被迫同意了。段仲宇转告工人可以增选代表进行谈判。第二天拂晓，路局局长王兆槐终于答允了职工群众的要求，两路工人的罢工斗争得到了胜利，国民党反动头子陈大庆镇压工人的阴谋未能得逞。

（2）保护电台的斗争。约在二月的一天，李正文同志找到段仲宇，讲了转移一部电台的困难，他主动承担了任务，由组织上派人将电台送到我家交段仲宇保存。几个星期之后，段仲宇利用港口司令部的车子和正文同志一起亲自把电台转送到指定的地点。这件事是正文同志直接布置段仲宇的，以后在讨论吸收段仲宇入党时，正文同志才告诉我的。他讲，当时上海我们的电台被敌人侦察出来，遭到破获，工作同志被捕。另一台必须转移，妥为保存，当时找不到适当的地点保存，组织上考虑段仲宇有公开职务的掩护，虽然他当时还未入党，但认为他忠实可靠，就交给了他这一任务，而他毅然接受了这项任务，尤其在转移电台行动中，他表现的果敢坚定。正文同志描述当时的情形说：我穿着西装坐在车内，扶持着电台。段仲宇身穿佩带着少将领章的军服，亲自驾驶着带有港口司令部通行证的车子，按着我指定的路线前进，要通过北四川路国民党的军警宪检查哨，沿途还遇到巡逻队，可段仲宇沉着、坚定，开着车安全通过，完成了转移任务。

### **组织武装斗争，策应解放军解放宁沪**

一九四九年初，淮海战役之后，蒋介石逃到奉化老巢，策划顽抗。他集结了残余部队，号称百多个师，沿江布防，企图凭借

长江天堑，退守东南半壁。在这种形势下，上海党组织为了配合我军渡江作战，解放宁沪，组织我们一部分地下武装力量，参与了战斗，当时的直接领导者，就是张执一、李正文同志。

现将斗争情形分述如下：

### （1）组织预干总队和伞兵起义

我解放大军渡江之前，上海党策反工作委员会决定，由贾亦斌同志领导预备干部总队在嘉兴起义，刘农峻同志领导伞兵团在上海利用乘船开拔厦门的机会起义，以配合解放宁沪的战争。

关于贾亦斌同志起义的经过：贾亦斌同志当时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代局长（局长是蒋经国）兼预备干部总队长，他积极靠近党，总队开到嘉兴之后，党组织又派张文藻同志作为联络员，进入预干总队。在贾的活动下预干总队官兵逐步明晓大义，反蒋的情绪高涨，引起敌人的怀疑。该部的副总队长黎天铎又希望得到总队长的职务，对贾亦斌以副局长身份兼总队长心怀不满，从而伺机向蒋经国进谗告密。当初预备干部总队的成立，是为蒋经国培养干部的，是小蒋的基本力量。由于黎天铎的告密引起小蒋对贾亦斌的怀疑。总队调嘉兴后，蒋经国通知贾去溪口（当时蒋介石父子住溪口）。记得是三月初的一个早晨，贾亦斌同志到宝山路我的家中，谈了这个情况，考虑是否去的问题，我当即向李正文同志汇报了，经过组织上研究之后，正文同志转达党的意图：一、不去更引起小蒋的怀疑，将对贾不利，为了解除疑窦，应该去见蒋；二、争取小蒋的信任；三、借此行窥测蒋氏父子的动静。贾亦斌欣然应允。临行之前，我们又作了具体分析和对策。大约十天左右，贾亦斌同志安然由溪口回来，他详细地谈了见蒋经国的经过，麻痹了敌人。随后亦斌即回嘉兴，整顿部队。但事情并

未平息。大约三月下旬，贾亦斌同志由嘉兴匆匆地来上海找我，他得到消息，国防部撤销他的代局长和预干总队长的职务，并以黎天铎为总队长，开到福建整训。我当即转告了李正文同志，并一起听取了亦斌的汇报。我们研究的结果，尽量拖延移交，积极准备起义，争取相机行动。紧接着在李正文同志主持下，又吸收刘农峻同志参加，连夜开会，讨论起义办法。根据当时敌我形势，考虑起义较难于成功，但贾亦斌同志表示，不论胜败，要坚决起义。李正文将讨论情形向张执一同志反映，经组织反复考虑后，由正文同志转达，批准贾的起义。并确定在嘉兴起义后，向天目山挺进。同时由上海党组织联络皖南游击队东出莫干山迎接，浙东游击队牵制蒋军的行动，以及通知齐国楹的保安总队在右翼掩护。我们作出决定后，分头准备。首先亦斌把他的家属迁到沪北区的临平路掩护起来，由组织上电知友军配合起义行动。当时预定的起义日期为四月十五日，因为临时得知贾的撤职令已传到了部队，为了争取掌握部队，贾亦斌同志提前赶回嘉兴。

当时，斗争是激烈的，黎天铎已接替了预干总队总队长，风闻贾亦斌同志潜回嘉兴，布置党羽严加控制。贾亦斌赶到总队部见黎，逼他下令行军演习，黎顿时气馁，在威力之下，签署了行军命令。贾亦斌同志乘机率领队伍出发，夺取枪支弹药，乘夜离开嘉兴西进。这天是四月七日，因为行军的疲劳，加上携带的弹药过重，部队走不动，为了减轻疲劳，沿途征集船只，乘船西进，这样一来，目标暴露，行动迟慢，行抵乌镇一带，即被敌军包围。嘉兴位于蒋帮的腹心之地，预干总队又是蒋经国的基本力量，贾起义的消息传开之后，蒋氏父子无比惊慌。据当时《浙江日报》刊载，蒋介石派了八个团的兵力，乘汽车连夜追赶，并派飞机轰

炸，预干总队陷入重围，这时被裹胁的黎天铎乘机煽动，在内外夹攻中，总队大部学员被俘，贾亦斌同志于吴兴以南地区率部突围，沿途遇到截击，转战到山区之后，只剩贾单身一人，进入我解放区。这次起义损失虽严重，但影响是很大的，上海各报纷纷发出号外，《浙江日报》第一版全版发布了起义的消息，大字标题是：“悬赏银洋拾万通缉贾亦斌”，蒋军队伍中也纷纷传说：“太子派投了共产党”，军心涣散，社会上更是传说云云：“蒋家王朝，大势已去。”

关于刘农峻同志领导伞兵团起义的经过：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的军队在我军一再打击下，残缺不全，但伞兵还是较完整的。蒋介石父子逃往溪口之前，命令把伞兵三团开到上海郊区安亭驻防。安亭距上海市区较远，为了便于联系，刘农峻同志在延安路设了个办事处。同时党又派了周其昌同志到该团协助刘农峻同志工作。在张执一、李正文同志的领导下，该团成立了党支部，周其昌同志任书记，经过一系列的部署，加强了党的工作。三月初，李正文去杭州看王海峤同志的工兵四团，他叫我去看伞兵，由刘农峻同志同我到安亭伞兵团驻地，看了部队（用公开职务的身份去的）。之后，由周其昌同志和我向正文同志作了汇报。当时正文同志说，党要保留这支部队，作为新伞兵的基础。三月中旬的一天，刘农峻同志来找我，他说，蒋介石潜来上海，召集军事会议，布置顽抗，同时约见了刘农峻。蒋对他说，当初在黄埔就是依靠一个团起家的，将来到台湾后，就以你这团作卫队，东山再起。蒋在谈话中极力拉拢。几天之后，刘农峻接到伞兵旅参谋长的通知，命令该团随同旅司令部一同乘船海运厦门，再去台湾。当时我和刘农峻同志将上述紧急情况向正文同志反映，经组织上

研究后，于四月初由正文同志向我和刘农峻同志传达了党的决定：争取海运，在通过敌军的警戒线后，开赴连云港，并作了具体部署：一、为了海运，把这项工作交给段仲宇调拨船只，协助刘农峻同志完成任务；二、确定船只后派人与船上海员同志联系，协同行动；三、由上海党与连云港地区联系，届时迎接伞兵三团登陆。布置已定，即分头进行。准备起义。

在伞兵起义的斗争中，当时遇到了两个阻力，一个是伞兵旅参谋长要带一个直属营和伞兵三团一起搭船开赴鼓浪屿；另一个是伞兵三团的副团长是个顽固分子，与该团的政工人员串通一气，阻挠刘农峻的工作。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由段仲宇协助刘农峻同志排除了这两个障碍。在调拨船只时，刘农峻同伞兵旅参谋长一同到段仲宇处联系，当时伞兵团的一个营担任上海铁路的警备，归段仲宇指挥，当旅参谋长提出伞兵南调请派船只运送时，段仲宇回答：铁路没有警备部队接替，伞兵不能调走；并保证今后伞兵团走时负责配备舰艇。这样就争取到刘农峻全团有单独行动的机会。下一步为排除伞兵团内部顽固分子的阻挠，刘农峻、段仲宇协商，利用他们争先南逃的心理，调拨船只叫顽固分子作先遣人员，南下设营。经过上述的措施，排除了内外的阻力，又争取到伞兵团单独活动的机会，为起义准备好了条件。为了争取按党决定的日期（四月十五日）起义，段仲宇派联络参谋李春华到港口司令部调拨了一〇二号登陆艇，交给刘农峻同志接管。

四月十三日下午，全团上船后，刘农峻同志根据党支部的决定，作了如下的部署：集合营、连、排长，命令枪支集拢保管，全体官兵进仓休息。傍晚时分，刘农峻下令起航，甲板上不许有士兵行动，并指派刘锦世同志（该团警卫连长，刘农峻的弟弟）

的警卫连担任全船警戒，要害部门（电台、指挥塔、轮机室）派了战士持枪监视。入夜后，一〇二舰艇通过海军警戒线之后，刘农峻命令转向北驶。当时指挥台、轮机等人员觉察方向不对，但在警卫连战士的监视下不敢抗拒，只好按刘农峻同志的命令执行。

四月十五日凌晨，舰艇安然到达连云港，该地党的特委书记谷牧同志亲自带队迎接伞兵团登陆，并致慰问。十八日又召开大会，由谷牧同志讲话致欢迎词。二十八日新华社发表了伞兵三团起义的消息报导。当时中央很重视这支部队起义，五月八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发来电报：“祝贺你们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加入人民解放军的英勇行动，希望你们努力于政治上和技术上学习，为建设新中国的伞兵而奋斗。”并命令一〇二登陆艇编入人民海军服役。

预备干部总队和伞兵团都是蒋的嫡系，预干总队是“太子派”的基干，伞兵团是蒋介石准备作卫队的，两部在一周之内相继起义，投靠了共产党，而且是在蒋家王朝的腹心地区起义，这对国民党的震动是很大的，起到了瓦解蒋军军心，和配合解放军解放宁沪的作用。

## （2）策应渡江和解放宁沪的斗争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我军渡江战斗中，由于我们争取了国民党×××军军长×××（驻××）。××军军长×××（驻××），在我解放大军渡江时撤出阵地，起了策应渡江的作用。

这两个军的军长是陆军大学的同班同学，开始由宋光烈联系，做了很久的工作，随着国民党的节节失败，他们感到前途无望，表示愿意和我们联系，提出待机立功，走自新之路。为了加强工作，以后由宋健人同志负责联系。三月间，宋健人同志到上海研

究工作时，提出建议：长江江流广阔，波涛汹涌，加上国民党海军封锁江面，空中飞机监视，将来我解放军渡江时，多属木船，行动困难，如在敌前强渡，损失可能很大。×、×两人屡屡表示待机立功，如果说服他们策应我军渡江，当可顺利。我非常同意他的意见，立即和正文同志约宋商谈，决定由李正文同志与两位军长面谈机宜，并请宋健人先回，约×、×面商。

当时，蒋军中布满军统特务，为了安全，四月初，我和李正文同志由上海同去南京，由宋健人同志带领到×××军军长的家中。当我把正文同志和该军长介绍后，他很诚恳的表示见到正文先生非常高兴，愿聆指教。李正文同志介绍当前形势，陈说利害，指明前途，他边听边表示首肯。最后，该军长自己提出，将来解放军渡江时，保证在他的阵地前沿绝不抵抗。在会谈中达成了协议。当我和正文同志告辞时，他再次表示保证履行诺言，同时也提出希望我们将来能保留他的职务。

之后，接着约会驻××的××军，当时长江已由国民党海军封锁，无法通过。正文同志不能久呆，便回上海，由我和宋健人同志连夜到该军长的家中。该部也保证我军渡江时，撤出××、××。约定之后，留宋健人继续保持联系，我回上海向李正文同志汇报，在宋健人同志的联系下，两部履行了诺言，策应了我军渡江。由于当时我们没能保存他们的职务，在两部撤出江防后，随蒋军南逃福建。在南逃的途中，黄振涛领导一个师起义，加入了我解放军。黄振涛的起义也是宋健人同志联系的。

（3）当我解放大军渡江之后，向宁沪杭地区进军中，齐国楮同志响应了党的号召，他领导的江苏保安总队万余人，在陈景明同志的协助下，于常州以南的金坛、溧阳一带，迎接了解放。



驻防杭州的王海峤同志领导的工兵团，在王声明同志的协助下，抵制国防部的命令，把部队和筑路的机车车辆，沿浙赣路散布了数百里，断了交通，阻碍蒋军南逃，配合了杭州的解放。

在解放上海的战斗中，段仲宇同志所掌握的辐重汽车团（两个团、六个独立营）在上海起义，加入了解放军，并集中了大量的汽车，输送我解放军，组成追击部队，追歼蒋军。

\* \* \* \*

回忆当年的地下工作，深深感到斗争的艰巨。解放之后，参加这条战线的同志，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为社会主义的建设继续工作。惋惜的是，当年的战友，如刘农峻、宋健人等同志，在十年内乱中，遭受摧残，相继去世了。今天，我们原来一道工作的同志表示，愿为台湾的解放，祖国的统一，再贡献个人的一份力量！

# 二十六路军起义前夕

——在董振堂同志身边见闻

高 志 忠

一九八一年，是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整整五十周年。每当我回想起当年那紧张而激奋人心的日日夜夜，便好象又回到了这次起义的主要负责人董振堂同志的身边。

一九三一年，我被派到董振堂身边当勤务员（后来当他的警卫员、警卫队长，前后工作了七年），亲身体会到，在我党地下党员的宣传教育下，部队起的一些变化，而感受更多的是董振堂等人从一个旧军人迅速转变成为出色的红军指挥员。

下面，仅就宁都起义前夕我所再闻目见的的事情，做一个片断的回忆。

一九三〇年，蒋、冯、阎军阀混战，结果以西北军失败、冯玉祥出走而告终。翌年初，蒋介石乘机将这支吃了败仗的部队改编为国民党的二十六路军，董振堂任师长的十三师，被编为二十六路军二十五师的七十三旅，董改任旅长。三一年初，蒋介石以不可告人的阴险用心，下令二十六路军南下江西，“围剿”中央红军。

二十六路军到了江西宜黄地区，刚和红军接触，便吃了败仗，退守到宁都孤城。总指挥孙连仲到上海看病去了，部队由赵博生参谋长主管。二十六路军的军官和士兵，由于吃了败仗，加上供应和医药条件较差，水土不服，病死的很多（二十六路军大多是北方人），短短的几个月，就病死了上千人。宁都城北门外的山坡上，到处都堆起了新坟，部队战士情绪十分低落，都盼望早一点回北方。一些军官的心情也极其矛盾苦闷，他们认为跟红军打仗是打不赢的，而返回北方又绝无可能。这时，在部队中流传着一些歌谣，如说：“出了北门望北坡，坡上埋的都是北方的老大哥，要想回到家乡去，大家一起来倒戈”。战士们一边说，一边黯然伤神。正因如此，部队减员一天天显著。

董振堂面对孤城，心中忧虑。他平时很爱看“三民主义”的书，但是此时看不下去了。一次，他在办公室里，背身看着地图，对随身副官刘振亚说，蒋介石置我们于死地，这不是清清楚楚的吗！倒戈吗，红军怎么样呢？董振堂在大革命时期，曾接触过刘伯坚等许多共产党人，有一次他对郭如岳参谋和边章五说，象刘伯坚那样的共产党人是为人民的楷模，但后来都被冯玉祥驱逐出了西北军。并且说，此后，他曾打听过刘伯坚等人的下落等等。董振堂在苦闷彷徨中，请假到南昌看病。实际上，他身上的病本来不大，到南昌后很快就治好了。但是，他思想上的“病”，在南昌是无药可医的。于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就返回了宁都。他回到宁都后，就问我部队里有什么反映没有？部队的情况怎样？我便将看到的、听到的一切情况作了报告，特别是当他听到望北坡的那首歌谣时，默默地沉思着，没有吭气，看得出，他十分忧虑。

董振堂过去无任何嗜好，从未见过他下棋、打牌等等。可在

南昌回来之后，大约在十一月间，突然和一个陌生的人下起象棋来了。这个人，高高的个子，头戴礼帽，身穿长衫，四十多岁。他一来，董振堂就叫我把棋盘摆好，他们一边下棋，一边喝茶、聊天。有时，一坐就是半天。这个陌生人，有时也和旅部的刘振亚、郭如岳、马全富等人接触。我曾问董振堂他是谁，干什么的，可首长说，以后来人，你不要问人家姓名，来的人都是我的朋友。一次，董振堂在和这个陌生人下棋，赵博生参谋长来了。那个陌生人风趣地说：“老朋友又见面了，”赵参谋长说：“水流千里归大海嘛！”当时，我不明白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上旬，大概是八、九号的晚上，宁都城北门附近一栋二层小楼上的灯火几乎亮了一夜。这幢二层楼房，就是董振堂的住处和办公室。这天晚上七、八点钟时，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七十三旅旅部的刘振亚、郭如岳参谋、马金富、学兵连连长李青云等陆续来到这幢小楼，秘密会议就在这里开始了。我因是勤务员，来回倒水送茶，所以我听到讨论的中心议题是，二十六路军去向何方？

会上，赵参谋长说：“我们不能继续跟红军打了，打下去没有什么好结果，只有全军覆灭。”董振堂说，打是肯定打不下去了，现在，士兵有四怕，一怕和红军打仗，二怕害病，三怕下雨，四怕吃大米。部队病号这么多，士气这么低落，是无法打仗的。他接着便把望北坡的歌谣向大家说了一遍。最后他又强调说，现在一无兵员，二无弹药，加上生活不习惯，实在无法和红军打下去了。这时，刘振亚问赵、董：那么，你们认为红军怎么样呢？于是，参加会的人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赵博生参谋长说，也有说红军好的，也有说不好的。但是，说共产党“共产共妻”的事，

看来是没有的，他们抓了我们的人，还给放回来，不打不骂。其余一些人都自觉不自觉地说了红军的好话。就这样，大家一边喝茶，一边议论。到了十二点多钟时，董振堂看看手表说：赵参谋长，咱们二十六路军到底怎么办？今晚也不好再说了，先叫大家回去考虑考虑。

会后，赵参谋长没走，又和董振堂两人谈到后半夜。据我记忆，赵说，咱们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南方没有我们的地盘，北方的地盘又全丢了，弄不好就会死无葬身之地。董说，看来只有一条路，就是把部队拉出去投奔红军。赵问，你有什么线索吗？董说，我没有什么线索，只有一个被红军放回来的参谋，现在押在警卫连，可把他叫来问问红军的情况。于是，把那个名为押在警卫连，实则完全保障自由的参谋王中其叫来了。王把红军的好处，红军对他指出的，二十六路军同蒋介石的矛盾，以及蒋介石对二十六路军迫害的手段等等，还有红军奉劝二十六路军同红军一起打回北方去的话都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之后，王中其又被送回警卫连。赵和董一边吃夜餐，一边议论蒋介石把他们推到前线居心叵测。这时董振堂说，我们处境很不好，军官和士兵情绪这么低落，长此下去，不被打死，也得病死，不如投诚！

十一日晚上，会议又开始了。见参加会议的除刘振亚、郭如岳、李青云、边章五、马金富等人外，还有常来的那位陌生人。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七十三旅连以上干部思想状况和政治可靠程度。当研究到一个叫郭德培的团长时，大家认为他不可靠，说他是给钱就干的兵痞，同时说到这个团的战斗力很强，需要派人加以控制。董振堂即刻决定请边章五去控制这个团。当时还谈到一个黄营长，说他带的三营很能打仗，是七十三旅的主力。对于

这个营的营长和连长等军官，董振堂是经常接触的，他们和董也较熟，有时还问董要钱花。可在这个会上，郭如岳提出这个营不可靠，董振堂却不叫派人去控制，董说，要先找黄营长谈谈再说。他说，这个黄营长，当部队在甘肃时就跟着我，我考虑这个人问题不大。这次会又开到深夜一点多钟。

过一天的晚上，董振堂把我找出，突然问我：小高，你是哪里人？我说是陕西咸阳县人。董旅长沉吟一下说：你不是咸阳县人，你是长安县人，你还参加过渭华暴动。他还说，你们一起来的十二个人，现在都在七十三旅、七十四旅和总部。我听了之后，吃了一惊，不知道他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接着他又问：你怎么跑到河南当兵的？我就把我当兵的经过一一作了报告。当我十三岁时，正在念书，老师贺修之是地下党员，渭华暴动时，他叫我来回送材料。但来往传送的多是一些书籍，里边究竟是什么，我一点也不清楚。我联系的人不少，其中有一个姓宋的铁匠和一个卖活络面的王麻子。一九二八年渭华暴动失败后，我跑回老家。第二年春，姓宋的铁匠突然来找我，说我过去给共产党办事当交通员，国民党要来抓我，叫我赶快到西安鼓楼南面的一家茶馆去。我到那里时，已集合了一些青年学生，年龄最大的只有十六岁，我当时最小。姓宋的说，送我们到洛阳军官学校学习，我们总共十二个人就跟他走了。到了洛阳，住在一个店里，但给我们带路的人，第二天一早就不见了。我们住店很快钱花光了，一天夜里，董振堂任师长的十三师来店查夜，看到我们便盘查起来。我们告诉他们，是来投考军官学校的。那些查夜的士兵到处翻，他们从我背的一部《左传》里翻出了一支粉红色的大烟花，于是二话没说，就把我们带到了十三师师部。我在十三师特务连住了一宿，第二

天就被分到十三师师长那里当勤务兵了。我把这一经过叙述之后，董旅长又问我：我们这几天研究的事你都听到了吧？我答：听到了。他又问：我们到红军中去，你去吗？我说：旅长到那里，我就到那里。董振堂听了我的话，满意地点了点头。

十三号晚上，七十三旅那个姓黄的营长，还有一个团长和另外两个军官，气冲冲地来到旅部找旅长，我把他带到楼上，他们一见旅长就大声嚷道：“旅长，我们投奔红军，这不是跳火坑吗？！红军能要我们吗？！能相信我们吗？！”这时，董旅长见他们火气很大，便先把他们领到里屋，让他们坐下，然后说：“你们先消消气，咱们慢慢地再说”。气平息下来之后，董问他们：“这事你们听谁讲的啊？”他们不说话了。董旅长说：“本来我想找你们，这也好，你们来了”。董振堂诚恳地说：“咱们在一起这么多年，难道你们对我还不相信吗？我绝不会领你们跳火坑，若跳火坑我先跳，绝不能让你们跳，你们还应该相信我吧”。听了董的话后，那个姓黄的和那两个军官都表示听旅长的。这时，董旅长又说，蒋介石把我们北方派到南方，送到最前线同红军打仗，损失很大，可又不给补充兵员；而中央军打完仗，兵员却及时补充。他还讲了部队士兵水土不服，染病的多，病故的多，大家要求回北方的情况，等等。这时，那个团长和营长也都说，蒋介石不会叫他们回北方等。董旅长接着说，蒋介石不让我们回北方去，士兵又大量减少，弹药也不给补充，士气又这样低，你们说怎么办？我们走又走不得，打又打不过，那我们只有被红军消灭。我们想活，就只有和红军在一起，共同打倒蒋介石，别无他路！这样一说，那几位军官都心悦诚服了，并且表示说：旅长，你放心，刀山火海我们也跟着你去。董旅长说：好！我放心了，但是你们回

去，要作好军官工作。最后旅长把他们送到门外。

十四号晚上，宁都城气氛十分紧张，七十三旅旅部的会议又开始了。参加会议的有赵博生、刘振亚、李青云、郭如岳、马金富、边章五，还有一位团长约十五人左右。这天，旅部小楼周围，全部是手枪警卫排荷枪实弹的战士。我和一个脸上有麻子的警卫员在会场里边。在这个会上，没有进行更多的讨论，董旅长简明地说：今晚要行动，我们把部队带到红军那边去，估计七十四旅和师部可能有点麻烦，我们要作好各种应急的准备。学兵连无论如何把东门和北门把好，万一发生情况要坚决顶住。特务连要加强巡逻，注意师部的电台，发现情况马上报告，李青云回学兵连去，郭如岳到特务连去。董旅长讲完话后，他请赵博生参谋长讲话。赵博生参谋长说：情况大家都知道了，各团任务大家都明白了，今晚关键在大家，成功与失败，是我们二十六路军的前途、命运大事，这全操在我们这些人的手中，万一出了差错，要有秩序地撤出东门，在南门外集合，白塔那边有部队接应。董旅长又向大家说，千万要注意联络信号，作好一切准备，等待命令。

深夜一点多钟，起义的枪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一次伟大的暴动开始了！

深夜两点多钟，从师部电台方向传来了激烈的枪声。当时董旅长留下我们五个警卫人员守住旅部，而他只带着那个麻子警卫员向枪声最激烈的师部电台方向奔去了。经过几小时的激战，清晨九点钟，宁都城里的战斗全部结束了。这时，太阳从东方升起，宁都城内的起义部队两万余人全部到城南的白塔下集合，赵博生、季振同、董振堂等首长站在高处。董振堂首长大声地向部队宣



布：“我们起义成功了！现在我们准备马上出发到红军那边去！”说着他把国民党的帽徽、胸章都从衣服上、帽子上撕了下来，又把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撕碎扔在地上，说：“从现在起，我们和这些东西永别了！我们再也不受国民党的气了！”这时，在队伍中立刻响起了震天动地的口号声，“打倒国民党！打倒蒋介石！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

起义队伍向瑞金出发，到了瑞金和宁都之间的尤岗圩一带，奉命驻下来进行整编。整编后，二十六路军就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下设十三、十四、十五军。任命军团长季振同，政委肖劲光，副军团长董振堂（季振同牺牲后，董振堂任军团长），参谋长赵博生，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十三军军长由董振堂兼，十四军军长由赵博生兼，十五军军长黄仲岳。整编后两个月时间左右，部队在尤岗圩一带活动，进行政治、军事、军纪等方面的教育训练。

**【编者后记】** 关于宁都起义的史料，我刊先后发表了苏进、高志忠两同志的文章，由于历史事件距今久远，当事人记忆难免有所出入，因此仅供历史研究者参考。如有其他了解情况的同志提供新的资料，我们将十分欢迎。

# 回忆东北地区的工人运动

唐 韵 超

## 大连最早的工人团体——华人工学会

我十六岁时到大连沙河口铁道工厂(现在是大连机车车辆厂)学徒。当时，这是日本在中国办的铁道工厂，是大连最大的工厂。我们在工厂学徒，待遇很低，一天挣三角五分钱，仅能维持个人的最低生活。后来，我成了技术工人，一天也只挣到六角钱。

一九二三年京汉铁路大罢工，对大连工人影响很大。从那时起，我们开始想这样一些问题：工人生活为什么这么苦？京汉工人为什么要罢工？我和一些青年工人通过讨论与思考，以为京汉铁路能罢工，我们也应该罢工。

一九二三年，大连有个国民党活动机关，叫中华青年会。会长叫傅立鱼，曾留学日本，在大连的社会声望很高。他的日本老师金子学斋到大连开办了《泰东日报》，傅立鱼担任该报主笔。傅立鱼与大连各界人士交往很广，他通过中华青年会搞募捐，还办了个中学。中华青年会在这一年十月十日，组织一些学校的青年搞提灯会。青年人提着灯笼穿过大街小巷，来到铁道工厂门前时，我们看到他们这种行动觉得很新鲜，就问学生这是怎么一回事。

学生们说，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是国庆节，每年“双十节”都要举办纪念活动。从这以后，我们便经常议论，自己也应该成立一个团体。团体的名称叫什么？众说不一。有的说叫工会；有的说叫工会日本人不答应；有的说成立团体，要挂牌子，需要到警察署立案；有的说，我们工人文化低，学技术有困难，要组织工人学文化，就叫工学会。经过大家讨论起草了组织章程，推选傅景阳、于景龙等为负责人，将章程和组织机构递交大连沙河口警察署。过了几个月，关东州警察厅批下来，认为这个组织只是求知识，学技术的工人团体，发了许可证，名称叫沙河口华人工学会。于是，我们就找了房子，挂起工学会筹备会的牌子。为了发展会员，寻找机会向工人动员，号召工人加入工学会，学习文化和技术。开始报名的不多，我在的那个车间有二百多人，入会的才有三十人。后来，经过串联，其他车间的工人加入工学会，全厂二千多人中发展了八百多个会员。每人每月交会费一角，共收会费八十多元。有了这笔钱，就可以开展工学会活动了。工学会办了夜校，请来教员，每晚给工人讲课。

当年，沙河口华人工学会正式成立，选举傅景阳为会长，于景龙为副会长，下设教育部、宣传部、财政部、福利部，各部的成员都是从工人中选出来的。我担任夜校干事。从此，大连工学会的活动，开始活跃起来。

### 大连早期工人运动和建党活动

这年七、八月间，为增加工人的知识，工学会聘请一些社会名流来讲演。我们请过李震瀛到夜校来给工人们讲演，他是党派到大连开辟工作的第一个人。我们还请过店员出身的青年会干事

杨志云和《秦东日报》印刷工人关向应（大连附近大官屯人）等来讲演。他们的讲演使工人得到不少新知识，很受工人们的欢迎。有一次李震瀛讲演以后，工人们提出要求，希望李先生常来讲。李震瀛说，只要你们大家不讨厌的话，我就来。

一九二四年工学会成立一周年的时候，工学会召集工人开庆祝会，并邀请大连的其他团体参加。这时工学会在党的指导下，工作有了新的起色。不久李震瀛和关向应离开了大连。秋天，党又派秦茂萱来大连指导工作。这个人有学问，生活很艰苦，他来大连之后就住在工学会里，很能接近工人群众。秦茂萱针对以往工学会发展的情况，指出工学会要开展经济斗争。工学会根据秦茂萱意见，分析了工人工资太低、住房困难的情况，组织工人积极开展经济斗争。工学会向铁道工厂的厂主提出四条要求：第一条，工人工资太低，要求增加工人工资；第二条，工人没有住宅，要求解决工人住房问题；第三条，铁道工厂的工人，回家还要买火车票，铁路工人应该发免票；第四条，工人治病困难，应该免费医疗。经过工学会向厂方说理斗争，最后除工资没有增加外，其他几项要求，都答应给以解决。住房问题，答应给工人发房租：带家属的工人，每月发房租五元，单身发二元；免票问题，根据申请可以给工人开出免票；治病问题，组织了一个医疗互助会，工厂每月给工人七角，每月从工人工资中扣除三角，扣满三年就不再扣了。这次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给工人以很大的鼓舞。会员迅速发展，全厂工人很快都加入了工学会。这次罢工的初步胜利，对整个大连工人运动起了推动作用，许多小厂也纷纷要求参加工学会。

这一年，傅景阳代表大连去郑州参加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开

会回来后，在一次干部会上，根据李震瀛过去的提议，认为沙河口工学会名称很狭隘，决定把它改为大连中华工学会。改选了新的领导机构，会长改叫委员长，并增加一名总干事。傅景阳继续当选为委员长。选举唐继先为总干事。又选了两个副委员长，一个是大连造船厂的齐鸣山，一个是沙河口机械厂的石传锦。这时工学会从组织机构到会员，都象个样子了，每月收会费二、三百元。改选后，我当了夜校部部长。

一九二五年上海爆发“五卅”运动以后，全国的工人运动起来了。傅立鱼组织工学会、青年会、政治学校、贫民学校、印刷职工联合会等七个团体成立大连团体友志联合会，坚决支援“五卅”运动，为“五卅”死难者开追悼会，发动募捐，并把募捐的几千元汇到上海，援助上海工人同志。

中华工学会成立后，大连党组织有很大发展。一九二五年，秦茂萱、傅景阳二人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入党后，才知道关向应还不是共产党党员。李震瀛是中共北方区委派来的，后来他把关向应带到别的地方工作去了。秦茂萱是由铁路总工会派到大连来的，也是北方区委委派的。他走后又派了邓鹤皋（邓洁）。一九二六年继续派来了张织、尹才一。在党的领导下，工学会工作进一步发展起来，党员也大大地增加了。当时大连有三、四十个支部，四百多党员，是北方区党员最多的地方之一。

一九二五年底，大连工学会第三次改选。傅景阳连任委员长。这时工人内部出现了派别斗争。唐继先不到会，闹派别。总干事改为高级三（高文元）。我被选为副委员长。

由于工人内部闹矛盾，分成两派。结果沙河口机械厂先搞起自发性的罢工，但很快复工。这时，石传锦等人跑到沈阳开工厂

去了。邓鹤皋认为大连党组织发展很快，北方区委不能及时给予领导，对工作有损失。为此，邓鹤皋到上海中央请示工作，要求大连直属中央领导。

一九二五年，周水子小野田洋灰厂和周水子纺纱厂，先后成立了工学会分会。一九二六年四月，周水子纺纱厂搞了一次罢工。当时工人对伙食很有意见，小米饭里砂子很多，没法吃；豆芽长有半尺，咬不动，象吃草似的。工人要求改善生活，便自动起来罢工。罢工后大连工学会负责人到该厂了解罢工情况，及时给以正确领导，帮助分会向厂方提出如下罢工条件：第一，长工资；第二，改善伙食；第三，星期日、节假日工资照发；第四，解决工人看病问题；第五，厂方不能随便开除工人、打骂工人。条件提出后，厂方不但不答应，而且把工会的负责人抓起来。为了叫他动员工人复工，很快又放回来。结果没有复工，第二次又抓走了。为此，铁道工厂和洋灰厂都进行了声援罢工。但工学会负责人几乎都被抓去。这时，党指示我们工学会的负责人赶快潜伏下来。于是，我就到大连市委工作，继续领导罢工斗争。

邓鹤皋回来后，对这次罢工进行了批评，主张马上复工。我们认为，既然工已罢起来，就要坚持下去。后来，沈阳国民党负责人李光忱从广东国民政府那里带来三千多元钱款救济罢工的工人。这次罢工一直坚持了两个月，使得厂方除增加工资外，不得不答应了其他大部分罢工条件。这样，又使这次的罢工最后取得了基本胜利，使工人得到了一些经济利益。

### 反动当局大举镇压工人运动

一九二六年，中共大连市委成立。分工情况是：书记邓鹤皋，

组织部长杨子云，宣传部长张织，职工运动委员长唐宏经（唐韵超），青年团市委书记尹才一。邓鹤皋从上海回到大连以后，大连市委改为直属中央领导。

纺纱厂罢工时被抓去的一些负责人，没有放出来，他们的家属要求工学会想办法援救。这时，工学会一方面请律师辩护，但没有效果；另一方面，用一部分救济款，给关在狱中的工人包饭，每人每天六角。

复工后，因工学会干部大部被抓，工学会有些散了，组织上决定由我具体负责整顿工会。九、十月间，一次开会时，我被日本刑警抓走了，被送到警察署审讯，两天后又被送到监狱。这时，我考虑到狱中的包饭花费太大，就向狱外发了一封信，建议停止包饭。这件事引起狱中同志很大的思想波动，我就向他们做解释工作，说外边没钱了，不能再继续包饭了。在狱中，通过洗澡和理发的机会，我们还能经常联系，交换意见。有一次提审我：“为什么发动罢工？”我说：“厂方对工人太苛刻，吃住待遇太差了。”又问：“工人罢工，你为什么不去劝阻，而且还要接济？”我说：“我没有去。”还问：“你们捐款救济工人干什么？”我说：“应该叫他们吃饱肚子。”一九二七年三月间，我和宋维翰、王明和三人被释放出来。

我出狱以后，又回到工厂。车间组长是个日本人，他对我说：“不要做工了，写个辞职书吧！这样可以拿退休金，不然厂里也要把你开除。”我请示了组织，得到批准。

我辞职后，正要准备回家乡，邓鹤皋找我谈话，叫我回家去住一段，四月底赶回来，代表大连工会去武汉出席劳动大会。等我从家里回来后，邓鹤皋又对我说，你不能去了，形势不好，蒋

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又说，我给你写个介绍信，你就到沈阳去工作吧！我同意组织这个决定，于是，我就回家做些必要的安置。这时，罢工时被抓走的人，以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每人罚了二十元，放了出来。

七月初，大连反动当局大举镇压工人运动，把党组织搞垮了，邓鹤皋被抓走了，工学会也解散了。在家乡，我也听到大连到处抓人的消息。我父亲听到这事更是着急。他叫我白天到庄稼地里躲藏，防备万一。一天中午，我妹妹从村里跑来，气喘喘地告诉我说，你快走吧！屯子来了十几个警察和巡捕。听到这个消息，我立即到了金县，遇到同事宋维汉，他告诉我说，邓鹤皋等人被抓去了。后来警察和巡捕知道我还没有走远，就把我父亲和哥哥抓去了。他们毒打我父亲，逼他交人。父亲回来给我借了二十元钱，让我赶快离开家。第二天早上四、五点钟，我离开家前往沈阳去了。

### 沈阳的工运情况

我到了沈阳，遇到许多从大连跑到沈阳的工人和工会负责人。我见到他们很高兴，向他们打听与党接关系的情况。有的人向我摆手，表示不敢再出面找组织活动。我来沈阳不久，到东北大学的工厂里做工。最初几个月，我始终没能找到组织。

一九二八年三月的一个星期天，我到沈阳南站租界地，碰上了原大连铁道工厂铸造厂的工人王立功。过了两天，王立功到东北大学工厂来找我。他通知我说，下班后到北市场，有人约见我。下班后，王立功带我到了北市场的一个小饭馆，原来是满洲省委组织部长吴丽石正在那里等着我。满洲省委是一九二七年秋天成



立的，书记是陈为人。吴丽石见到我说，你别在工厂干了，组织上决定让你到省委来工作。我说，家里依靠我生活，我在工厂做工，可以解决家庭的生活问题。又说，我没有文化，水平低，不能到机关工作。吴丽石向我解释说，咱们干这工作，就是为很多人能吃上饭才干的，水平低，可以在工作中学习锻炼。最后我服从了组织的调动。

过了两天，王立功又来找我，叫我立即办辞职手续。然后，他带我到了省委组织部。吴丽石，还有一个小王立功（与王立功同名）都住在这里。小王立功对我说，他去年就来了，知道我也来到沈阳，就是打听不到我在哪个工厂。吴丽石说，去年省委成立时，委员名单上就有你的名字，可就是找不到你的下落。小王立功在省委职工委员会工作，他因肺病严重不能干了。吴丽石又对我讲，你是省委委员，大连发生问题后，不知你跑到那里去了。这次把你找来，还是让你搞职工运动，接替小王立功的工作，他需要住院治疗。当时，省委书记是陈为人，秘书长是廖如源，妇女工作是韩惠芝（陈为人的爱人），团委负责人是张应光，农村工作是一个姓张的抓。省委成立不久，工作还没有开展起来，基层工作很薄弱。小王立功带着我到抚顺、辽宁、沟帮子三个地方同基层接头。后来，小王立功还带我到市内兵工厂联系工作。这是我到沈阳后遇到的工运情况。

### 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

一九二八年四月初，省委接到中央关于召开“六大”的通知，规定满洲省委出席代表名额是五人，并指出尽可能多选些工农分子参加。省委开会研究，认为当时情况比较复杂，党员又少，无

法搞选举，省委决定一下就算了。最后确定满洲省委出席“六大”的代表有：唐宏经、张仁光、王传碧（大连跑出来的工人）、于志勋（大连跑出来的工人）等五人。

因当时国内白色恐怖太厉害，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只好在莫斯科召开。四月底，我们五人一行从沈阳坐车到了哈尔滨。这里设有一个接待站。本来每省有一个代表团，到哈尔滨接待站后就把北方的代表同南方代表组合在一起。我们到接待站报到后，被分编到南方代表团那里去当“翻译”，因为许多南方代表不会说北方话，行动起来不方便。接待站把代表编成许多小组，五、六个人一组。我担任从哈尔滨到满洲里护送代表的工作。我来回共护送了三趟。我把代表送到满洲里，下车后，有人把他们接走。在我护送的三批代表中，记得第一批有江西代表夏曦，福建代表孟用潜；第二批有云南代表王茂亭，还有罗章龙，张国焘；第三批有广东代表甘作棠。

在满洲里国境线上有两驾马车等在那里，我记得车灯上写着号码，一个是77号，一个是79号。代表们见到这两个车号就上车，也不说话，实际上等于联络暗号。代表们分批坐上马车，等到晚上换乘开往赤塔的火。到赤塔等两天，再换上到莫斯科的火。沿途大站，卖吃的多，我们到赤塔那天，没有在火车站上买吃的，结果第二天是星期日，商店关门，我们挨了一天饿。从赤塔到莫斯科的火上有餐车。在伊尔库茨克的站台上，我们遇到苏联铁路员工，他们看到我们是中国人，很热情地向我们招手。

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是在离莫斯科十几里郊区的一个地主庄园里开的。我们到莫斯科下车后，还要坐上带蓬子的马车到开会的地点。这里是一所很大的宅子，到这里来开会的有一百多人，

其中代表七、八十人，还有不少在东方大学和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调来做接待工作。我们在这里等了近一个月，人还到不齐。有人建议不要再等了，于是六月才开会，直到会议结束还差几个人没有到齐。

参加大会的代表，除前面说的以外，我记得还有：向忠发、徐锡根、苏兆征、关向应、罗登贤、周恩来、蔡和森、项英、瞿秋白、李立三、邓中夏、周秀珠、张昆弟、王仲一、蔡畅、杨之华、王若飞、贺昌、邓颖超等。

大会开幕时，由大会秘书长周恩来宣布大会开始。首先全体起立向死难的同志默哀一分钟，大家都哭了起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以后一年中，在江西、湖南杀了二十万人。瞿秋白作了很长的政治报告，报告了一天。接着国际代表布哈林作了报告，王明作翻译。王明除给布哈林当翻译外，还给常驻大会的国际代表米夫作翻译。布哈林平时不来，米夫自始至终参加了大会。王明和米夫整天在一起，可以说是形影不离。

布哈林的报告主要讲了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他说中国革命失败是暂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完成。布哈林批判陈独秀关于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完成，现在进行议会斗争的观点。他讲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形式等问题，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必须由无产阶级来担负，资产阶级已不能承担这个任务。

大会分组讨论了这两个报告。讨论中，代表们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形势的看法有分歧，争论很激烈。如关于革命性质问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关于革命任务问题，资产阶级革命是否已经完成？要不要搞合法斗争、议会斗

争？关于革命形势问题，革命是处于高潮还是低潮？等等。

周恩来负责大会的一切工作，他经常到各组参加讨论，并对代表们提出的问题详细的解释工作。他还要找各代表团汇报讨论的情况。他对代表团情况摸得很透。当时我们的水平低，有些问题不懂，有时还出笑话。有的汇报说，我们那里没有机会主义，有的说，我们那里没有帝国主义。周恩来在大会上作了修改党章和军运报告。

大会由瞿秋白和布哈林分别作了总结报告。布哈林重申他在开幕时报告的观点，再次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指出中国革命是处在两个高潮之间。

这次代表大会开了一个多月。闭幕时，正值共产国际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宣布了中共出席国际“六大”的代表名单。

“六大”代表要求多给一些名额列席国际“六大”，最后又给了一些列席代表名额。

党的“六大”通过了决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我记得当选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有：向忠发、徐锡根、卢福坦、张金保、苏兆征、关向应、罗登贤、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项英、王藻文、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邓中夏、周秀珠、甘卓堂、罗章龙、史文彬、陈潭秋、彭湃、顾顺章、任弼时、唐宏经等。

大会结束后，代表们按照来的时候的形式与步骤，分批回国。

被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到莫斯科市区参加六届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项英、蔡和森、张国焘、罗登贤等。总书记向忠发，组织部长周恩来，政治局候补委员兼秘书长李立三。当时李立三掌握中

央的实权，故有“秘书长专政”之说。

中国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十一、二名，列席代表十六名。瞿秋白、苏兆征等是正式代表，张昆弟、王仲一、唐宏经等是列席代表。国际“六大”在莫斯科的圆柱大厦举行。由布哈林主持大会，他开始作报告是用俄语，总结报告时用德语。苏兆征在大会上致词。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作长篇报告。

当时，苏联的经济状况很好。国际“六大”代表每人每天是六块美金的伙食。大会闭幕后，组织代表到苏联各处去参观。我由邵力子的儿子陪同作翻译，参观了乌克兰。中国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当时在苏联仍享有很高的地位，中国代表所到之处均受到欢迎。

#### 周恩来在满洲省委传达“六大”精神

一九二八年九月底，我由莫斯科回到沈阳。回来后，省委认为我已当选为“六大”候补中委，应选我作省委书记。我不同意这样做，认为应从党的工作出发，我刚放下锤把不到一年，没有文化，怎么能当书记？我坚持书记还是陈为人，自己还作职工委员，维持原班人马。最后大家同意了我的意见。我把“六大”开会的情况，给大家说了说。省委决定召开一次省委扩大会议。由我传达“六大”的精神。

我回来不到一个月，周恩来同志也来到沈阳。周恩来的伯父在沈阳，他趁回国路过沈阳之便，到伯父家看看。这时，周恩来到了省委，我就请他把“六大”精神给省委讲一讲。于是，省委听了周恩来同志传达的“六大”精神。传达后，恩来同志就走了。当时是秘密工作，不能接送，也不能打听去向。

周恩来走后，省委决定于十二月份召开省委扩大会议，进一步传达“六大”精神，并责成秘书长廖如源去筹备扩大会议。当时，选择会址是件很困难的事情，经过研究决定，这次会议在大东门外黄土坑老牛大夫（共产党员）家开会。这里是个贫民住的地方，不易被人怀疑。但是，有一点我们却忽略了，就是参加会的十几个人着装打扮不一样，反倒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们刚开完会，正在老牛家吃饭，突然闯进来十二名警察，以查户口为名将会场包围起来。这时吴丽石机敏地将文件偷偷塞进床下一个小尿桶里，伪装倒尿叫老牛拿出会场。结果，参加会的十六人都被警察押送到警察局去，当大家被押送到人多的地方，我寻机逃跑了。这事由于事前大家没有商量，其他人都未动，碰巧我又跑进了死胡同，又被警察抓了回来。最后，只有张仁光一个人跑掉了。我们这些人大部分被关在警察厅，其中我同另两个人被送到宪兵司令部。住了一个多月后，又把我们送到军法处监狱。

军法处长是江苏人，和吴丽石有亲属关系。后经吴丽石的父亲花钱设法营救，于一九二九年七月底，我们都被保释出来。从此，我们这些人就再也没有见面，有的留在东北，有的分配到外地。

我出狱后，这时的满洲省委组织部长孟用潜找我谈话，说组织上让我到上海学习。我从营口乘船到了上海，比我早来上海三个月的王立功同我接头。我们有二十五、六个人集中住在一所三层楼上。开始学习时，周恩来到训练班讲话。以后他和李立三都来讲过课。原计划学习两个月，还未满期，因张学良要进攻苏联，怕张学良闹起来不好走，组织上通知我们东北来学习的人马上返回东北去。第二天，派来一个河南人姓马的学生送我们坐船

到营口。后来才知道，这个小马叫马尚德，就是杨靖宇同志。刚到沈阳，省委新组织部长丁群（丁君羊）对我说。组织上派你到哈尔滨工作。

### 刘少奇对东北工人运动的指导

根据省委指示，一九二九年十月，我到哈尔滨特委工作。当时的特委书记孟用潜（孟坚），组织部长张洛书，宣传部长“南杨”（南方人姓杨的，名字忘记了，大家都叫他“南杨”），青年团特委书记王立功，我还是担任职工运动委员会的书记，特委秘书是韩光。王立功得病后，先由李稔年，后由张浩然（山东人）接替。还有一个朝鲜人，叫金明哲，负责农村工作，后来“南杨”走了，他还兼宣传工作。搞职工运动的，还有王石秀，是我的副手，不久到中东路道班当工人，后来发现他是托派。

孟用潜和我接头后，召开了一次特委会。会上他向大家介绍我是省委派来做职工运动委员会的负责人。他说：“老唐来很好，对作中东路事件的工作有利。”这一般时间的职工运动主要是进行中东路的复工运动。

中东路事件，张学良反苏，打了败仗，东线司令梁东加被抓，西线司令韩光定被打死。苏联打了张学良一下，很快就撤出了。张学良也不敢追。双方进行和平谈判。中国派出蔡元升为代表去苏联伯力开会。会谈达成暂时协定：（1）停战；（2）恢复中东路原状；（3）有关重大问题由两国大使级谈判。张学良在同苏联打仗时，把苏俄的铁路职工，从局长到工人全部给关起来，又临时招了一批中国工人。中东路恢复正常以后，苏职工复职，这样一来，临时招的那批工人，又被开除。工人要求复工，反对路局开除工

人，这时，南岗铁路员工韩守本，带头组织了复工委员会。党派李梅五（李根起）到三十六蓬也组织起复工委员会。韩守本组织的复工委员会，叫黄色工会，有三百多人，李梅五组织的复工委员会，叫赤色工会，开始只有四十多人。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底，刘少奇同志到了哈尔滨，团省委书记饶漱石也来了。为了加强对黄色工会的工作，派李梅五、郭隆真扮作假夫妻，搞了一个联络点，在工人中开展工作，争取老工人的同情与支持。

少奇同志来到这里立即召集了特委会，针对当时工运情况，他指出，铁路工人自己闹复工没有什么大希望，要能得到更多的同情者，复工才有希望。我们要进行各界工人同盟罢工来达到目的。又说：光叫铁路工人同情还是不够的，要叫市民也同情复工，要扩大宣传工作，多印一些传单口号，造成舆论，动员市民来支持这一工作。我提出把我们的会员都加入南岗工会，一起进行斗争。开始少奇不同意，认为我们以小吃大，吃不消，恐怕人家以大吃小起作用。过一两天，我又提出这个问题，少奇最后同意我们这一主张，认为可以试试看。于是，叫我带领三十六蓬的工人加入南岗工会。少奇同志对这项工作十分关心，他指示我们要教育我们的会员，始终保持自己的立场。两个工会的会员组织起来有四百多人，这样我们的力量就大了。接着，我们向铁路局长请愿，同局长进行了谈判。局长是个苏联人，他说，你们是怎么召来的，又是怎样被开除的，我都不知道，我这里不能解决你们的问题，你们要找高一级的理事会去解决。于是，我们又去找铁路局理事会谈判。我们提出铁路上用工人时把我们找来，现在不用了，又把我们开除，等于把我们坑害了。他们说，铁路恢复



正常了，容纳不下你们三四百人，这涉及到国际问题，复工问题不好解决。我们又找铁路局长提出，对中国籍的工人不能随便裁，失业退职还得给点钱。局长说，我们没有这笔钱。他们推来推去，不予解决，我们领着工人回到南岗，准备进一步研究对策，再进行谈判。

正在这时，一天晚上，少奇同志来找我们。他问我们去和铁路局谈的怎样？我们把事情经过讲给他听。然后，他指示说，要广泛取得社会上的同情，要动员在业的铁路工人协助我们，否则不好办。

正当我们准备下一步行动的时候，南岗黄色工会的负责人韩守本等被抓起来，后来，韩守本在向吉林押送的路上逃跑了。

对于复工斗争，开始我们没能根据少奇的指示，把工作做好，使这次斗争失败了。三十六蓬的工会，在这一时期由原来的四、五十人发展到一百多人。但李梅五又被抓起来。从此，复工运动告一段落。

为了总结这次失败的教训，少奇又主持召开了特委会。他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总结了斗争经验教训，进一步指示说，铁路工人复工问题虽说没有结果，但也不能说是失败。因为有些工作没有做好，有些工作还要进行下去。他还指出，哈尔滨市形势很好，人民群众还要斗争。现在北满人民蔑视军阀统治，有一个学生讲，军阀就会在我们面前耀武扬威，结果被抓了起来，带一堆书走，到警察厅去审讯。说他有赤化思想。他反驳说，是你们要打苏联，被人家打垮了，你们没有什么了不起。少奇用这件事作实例，说明市民是有觉悟的。他针对这种情况说，我们要把这些人吸收到我们这方面来，要注意这方面的工作。饶漱石对这件

事却持相反态度，他说学生讲话欠涵养，乱说，少奇当时批评了他这样看法不对。

过了一段时间，少奇看到哈尔滨青年还没行动，叫我去了一趟，对我说：你是工人，你要懂得工运形势，搞工人运动，要有大工厂大企业的工人作主体，这样小厂子工人会跟着走。分散的手工业要组织联盟斗争，因为这种手工业工人的斗争。很不好条理，常常一轰而起，内部又有派别体系，容易分裂，一些单位的资本家能直接挑唆捣乱，就是利用这种派别关系，破坏罢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加强工人罢工运动的组织领导，要注意从他们当中挑选一些勇敢的有正确主张的人，组织工人纠察队，负责维持罢工队伍，加强工人队伍的组织性，防止队伍的分散和资本家的破坏。少奇同志还特别指示我们，要注意队伍中有没有已被资本家利用的人。他说，这种人对工运起破坏作用很大。又对我们说，在自己的队伍中，你要切记“留根”，不管斗争是胜利还是失败，要在内部把扎根工作搞好，如果罢工失败了，队伍里连根也没有了，这样失败后再恢复可就困难多了。少奇同志的这些指示，对我们领导下一次罢工斗争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

事过不久，我们领导哈尔滨皮鞋厂进行了一次罢工斗争。这次罢工，主要目的是增加工资。罢工一开始，我们组织了纠察队，注意加强组织工作。有的人喝了资本家的酒，就不干了。有一次资本家开会，叫工人去，我们发现有的工人开始讲得好，可是到了这个节骨眼，就变卦了，斗争不积极了，开会时有的一言不发。这证明少奇同志的话是正确的。资本家和我们谈判，越谈越激烈，资本家来硬的，说工厂关门也能吃上三年。可我们三天没有吃的都不行。于是，我们同工人们商量，资本家给我们来硬的，

我们也给他们来硬的，罢工一定要坚持下去。为了解决生活出路，我们组织工人上码头，扛大个。这时我们发现有些工人过去很积极，现在不说话了，说明工人内部有了动摇分子，有了破坏分子。我们决定要教训这些破坏分子，提出对他们要“下饺子”

（意思是要把他们往松花江里扔）。这样一来，资本家就害怕了。第二天，便答应给工人增加工资。这次有七百多人参加的皮鞋厂工人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是同少奇的指导有很重要的关系。罢工胜利后，刘少奇又指示我们说，现在革命形势很好，但是要注意，还有斗争。

### 立三路线对哈尔滨的影响

立三路线时期，我正在哈尔滨搞工人运动。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时不喜欢搞小的运动，喜欢搞大的运动，搞政治罢工、示威游行和飞行集会。

一九三〇年五月以后，满洲省委书记是林仲丹（张浩）。他在四月底到哈尔滨指导工作。他主张在“五一”节搞大的示威游行，要求轰轰烈烈。开会讨论时，我对他说，这个地方搞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没有基础，有许多工厂连党的支部都没有；有的有支部，可是党员很少。林仲丹批评我右倾。我说，不是我右倾，而是没有群众基础。林仲丹说，革命形势大好，这是客观的，完全可以搞。为了搞大的游行和飞行集会，林仲丹主张把东山里的朝鲜族青年人调来参加“五一”活动。最后调来了三、四十名朝鲜族青年。“五一”节前一天的晚上，召集十几个积极分子开会时，突然来了十几个警察，把我们堵在屋里，林仲丹拿起暖水瓶借口要出去打开水故意失手将暖水瓶摔在地上，大家趁机都跑了。警

察只抓走两个学生。

三十日在道里搞飞行集会，散发传单，高呼口号，警察抓走了一个姓李的学生。五月一日那天，又组织三十个朝鲜人去打日本在哈尔滨的领事馆。这些人一到领事馆。就用石头乱打一通，把玻璃打碎了，警察赶来，把三十个朝鲜青年全部抓了起来，幸好没抓其他人。五月二日开会总结“五一”节的行动，林仲丹很满意地说，这次“五一”节有成绩。林仲丹在“五一”以后回到沈阳，不久，由于叛徒告密，他也被抓走了。当时满洲省委设在沈阳。“九·一八”以后省委搬到哈尔滨。

事隔不久，满洲省委接到中央来信，通知省委派人去上海开会。哈尔滨特委孟坚和满洲省委杨一辰去了。这是贯彻立三路线的最高峰。他们回来后，在江岸给特委传达会议精神，大讲当时革命形势大好，一省数省胜利，要促进中国革命胜利和世界革命的胜利。指示下面要组织飞行集会，搞暴动兵变，夺取一省政权，推动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这是七、八月的事情。

九月，省委通知我到沈阳开省委扩大会议，传达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反对立三路线的错误。这时满洲省委书记是徐杰（陈潭秋）。我记得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反左防右，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会后，省委决定把我从哈尔滨特委调到省委工作，我回到哈尔滨以后，把这次会议的精神作了传达。我问孟坚，我走后谁来接替我的工作。孟坚说，把铁路大厂青年工人葛风明调上来接替你的工作。我很快交待了工作，到了沈阳。

我到沈阳后，继续搞工运工作。不久，省委书记陈潭秋、团省委书记王鹤寿到哈尔滨特委检查工作。一天傍晚。陈潭秋、王鹤寿和哈尔滨特委成员孟坚、葛风明、金明哲、陶敏共六人正在

一家旅馆开会，被全部抓去了。省委得此消息以后，立刻让我回到哈尔滨去处理这件事。我到哈尔滨后，召集支部开会，安慰大家一下，为了坚持特委的工作，由肖海田（皮鞋厂工人）、潘仁德（大连人）、黄玉珍（王鹤寿的爱人）、王同元组成临时特委。

### 六届四中全会前后

我正在哈尔滨组织临时特委的时候，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又接到省委的通知，叫我到上海开会。因时间紧迫，我在沈阳一下车，就有人把路费、关系转给了我，并告诉我到上海的联络地点。我很快转车来到上海，在接头地点四马路日升客栈住下。

我在这个客栈一直等了五天，没有人来接头，我心里有点慌，寻思是不是出了问题？第六天的早上，接头的人来了，说明自己是交通，负责同我联系。他说，是叫你来参加六届四中全会的。会前也没有宣布是什么会，会后才知道开的是六届四中全会，会已经开过了。我问他，为什么不来找我开会呢？他说，不参加这次会也好，会开得不好，出了两派，一派反对四中全会，一派赞成四中全会。我问反对四中全会的理由是什么？他告诉我说，赞成四中全会的人，认为反立三路线不彻底，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批评立三路线是右。这一派有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王明还写了一本《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判李立三是右倾。我想，我们过去批立三左，才把他撤了。硬说立三路线右，这样一来，四中全会的路线要比立三路线还要左。后来，中央发了九十六号通告，进一步批判立三路线是右的。当时，我还想，王明、博古、王稼祥、张闻天，都不是中央委员，他们怎么能参加这次会议呢？我又问，反对四中全会的

有谁？交通告诉我说，有罗章龙、李求实、林育南、何孟雄等。他临走时说，明天有人来再给你详细讲一讲。

第二天，罗章龙来了。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对我讲，王明耍了个阴谋，借反立三路线爬到中央，将来他比立三还左，书本理论比我们读得多一点，但他在莫斯科学习，对中国国情不了解，对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一点都没有。立三做了多年的革命工作，对中国革命的经验没有掌握，犯了错误。王明上台到处受到反对，上海，武汉都反对四中全会，苏区的毛泽东也反对四中全会，大家都认为王明上台，会比立三还左，中国革命将遭到更大损失。由于立三那套东西，在实际工作中我有体会，所以对王明这种作法更加不满。我对罗章龙表态，反对四中全会。罗章龙对我说，过两天再找你谈。

罗章龙第二次来找我时说，你已经表示同意反对四中全会，你在这里住我不放心，赶快搬到四马路新兴客栈去住。他还告诉我，反四中全会的一些人被捕了。我们认为很可能是王明一伙告密，抓了一些基层干部，上面的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也都被抓走了。他说：你不能在这里久留，我们要长期干下去。王明是在国际代表米夫支持下上台的。把王明拿下来不易。你回东北去，给你配备一个人。今后的斗争是长期而艰苦的。

我搬到新兴客栈后，罗章龙带着徐文亚、王仲一找我。罗章龙叫我先谈谈满洲的形势。王仲一对我大加赞扬一番，说工人体会问题大有进步。罗章龙让我和徐文亚今晚就回东北去，还交给我们二百元大洋做为活动经费。我们到沈阳时正好过春节。

我回到沈阳后，很快找到省委秘书处詹大权（湖北人）。我和詹大权讲，王明犯了左的错误，他批立三右，做实际工作的同志

认为王明更左，我也参加了反王明的斗争。詹大权没有表态。当时的省委书记同王明的观点一致。

### 陈潭秋在哈尔滨狱中

我从沈阳回到哈尔滨找到特委负责人，把王明的错误向他们传达了。徐文亚同我还合写了一个反王明路线的声明，用我的名义发的。这个反四中全会的声明，表示与四中全会分裂，声明四中全会开得不好，因为争论激烈桌子都打翻了，声明王明等不是中央委员，他们都参加会议，而且都有表决权，我们反对他们这些阴谋，坚决与他们分裂。

罗章龙反四中全会，成立了一个非常委员会，我是其中成员。东北反四中全会时间很长，在哈尔滨有不少人反对四中全会。哈尔滨宁安县有一个支部都是小学教师，我去宁安县找个知识分子来帮助写声明，走到阿城时，警察检查，我身上带着的两封信被查出来。我说，我是来阿城找朋友，两封信不是我的，是给别人捎的。警察不信，就把我送到南岗警察处，住了一个月，过了几次堂，我坚持说信是给别人带的。这时，陈潭秋、王鹤寿、孟坚、葛凤明、金明哲、陶敏从这里转到道外监狱。过了一段时间，陈潭秋、王鹤寿、葛凤明三人又转回来。

“九·一八”以后，把这些人又都送到道外监狱，把共产党人放在一起。这时我和陈潭秋等人关在一起。陈潭秋同志对我说，你把外面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于是，我把反王明成立非常委员会的事讲给他听。陈潭秋同志说，你谈的这些情况，只是一面之词，另一方面的情况我们不了解，你讲的这些，我们只能听一听，不好表态，不过对你有两句话：“党内斗争是必要的，分

裂党是不应该的。“陈潭秋是位老同志，水平高，修养好，这两句话对我帮助很大。在狱中，陈潭秋同志对我进行了多次帮助。经过大家的帮助，我认识到成立非常委员会是分裂党的行为。我说：你们说的有道理，你们的意见是正确的，我错了就改。

“九·一八”后，监狱实行大赦，把刑事犯都放了，四十多名共产党人不放。后来孟用潜的哥哥找到中东路理事会的李少更，疏通关系，才把我们这些党员放出来。从狱中出来，我找到杨一辰，他约定我在江岸见面，他要我写反省书，承认错误，写了几次也没有写成。听说王同元因反四中全会写了三次检讨，组织上找他谈话说，你真要改过就要有所表现，你把警察的枪夺过来，说明你真心改过，结果这个学生去抢警察的枪被抓起来，不知下落。因为我是反四中全会的领导者，在经济上得不到组织上的接济，生活上无着落。我找孟用潜，他不管，他拿出路费叫我到沈阳找党联系。我到沈阳找不到组织，从此与党脱离了关系。后来我到金州以北三十里铺开鲜货店为生，经营这种生意长达十五年之久，直到一九四五年“八·一五”以后，我才重新找到组织。

### 大连总工会和东北总工会的成立

一九四二年初，我在大连偶然碰上了张洛书，他原是哈尔滨特委组织部长，一九三〇年被派往大连开展党的工作，干了一年就被抓了起来，判了十年徒刑。一九四二年才被放出来。我们见面后，就到西岗公园（现改名为动物园）谈了半天。我把自己的情况和出狱后的一些事情告诉了他。他当时告诉了他的地址，但又不叫我去找他，因为他家里还受到日伪的监视。我问他生活有没有困难？他说没有困难。



“八·一五”日本投降后，苏联红军占领了大连。当时我想：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机开展工作了。八月二十二日，我又到了大连，寻找过去的老同志，我找到了朱秀春，他当时在大连治安维持会当翻译。我又去找张洛书。当时他家里有好多人开会，等人大部分走了，留下几个人，张洛书向在坐的人介绍，这就是我们正准备要找的唐宏经。

我问张怎么办？他说，我们给苏联领事馆写封信，让他们帮助我们找组织关系。我说，他们不会管这些事，我们自己先干起来再说。张说，不了解党的方针政策怎么干？我认为组织群众，组织工会，先把工人群众组织起来，党的这个方针什么时期也不会变。我们不能只是等着党来指示工作，我们先把工作干起来。这样我们商量先联络各大工厂的工人，组织工会。于是，我们从铁道工厂、造船厂、机械厂联络工人，准备成立大连市工会。经过同各厂工人联络，最初只找了十九人。我们又作动员，到八月二十九日，共有二十七、八个人。这时我们决定先把牌子挂出去，再去进一步发展组织，并决定九月三日召开大连市工会成立大会，要求各厂来参加联系会的人，回去多找些人来，参加市工会成立大会。

九月三日那天，我们在青年会（现改为学校）礼堂召开了大连市工会成立大会，来参加会的有五十二个工厂，共二百多人。我在会上作了报告。我说：今天请大家到这里来，成立市总工会。过去十几年前，大连有个工学会，在日本统治时期，不能叫工会，叫工学会，领导过罢工。日本垮台了，现在苏联来了。苏联是工人阶级的国家，会赞成我们成立工会，不会压迫我们的。会上，我建议每个工厂出一名代表，参加筹备委员会，共选出五十

二个委员，其中又推选十五名常务委员。我过去是工学会的副委员长，这次就成为当然的委员长。工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后，我们在大连西岗子原日本时期劳工协会的旧址挂起了牌子，成立了组织部、宣传部、教育部、纠察部，十五个常委都当了部长。为了进一步发展工会组织，加强了宣传工作。我叫张洛书起草了一个《告工人书》，提出了与他们切身利益有关的口号和八条要求，如复工、八小时工作制、劳动保护等，印发了三千多张，散发、张贴到工人区。这个宣传效果很好，许多工人都行动起来。

我们把工人组织起来后，要去找厂主解决问题，告诉各厂的工会负责人不要闹事，因为大连没有政府，不要使苏联红军为难。我们组织工人同厂主商量复工，解决生活问题。结果有的厂主给了工人一些钱。

我们常委在一起研究工会的经费问题。常委决定让我到治安维持会去要钱。我们到了维持会，大资本家张本政说，没有钱，还说，工人抢了他们的东西。我说，你说工人抢东西，家里一定有赃物，请你和我们一同去工人家里查看。他不敢去。

第二天，治安维持会派人请我们去，我和另一个人去了。到了维持会，社会部长把我们请到客厅里。他问我们需要多少钱？我说，需要十万。他说，一个月三万，三个月拿齐。我们同意了。他又让我们派一个人到维持会里担任委员，我们没有同意。我们知道维持会都是些厂主资本家，这个官不能当。

当时，我们只抓了成立工会，没有去抓学生运动。接着才又组织了学生会。

十月底，东北局派韩光来大连，召集了积极分子会议。我向他汇报了工作。他说，你们作的对，符合党的方针政策。他报告

了国内外形势，强调要准备与国民党斗争。会开过以后，他走了，过了大约一星期，韩光又回来了。决定成立大连市政府。

我带领工会的人，把日本市长哄走了。维持会副会长迟子祥当选为市长，原在青年会当教员的共产党员陈云涛为副市长。

十一月八日，大连市政府成立了。这时，我们有一万人，组织了四个大队。参加庆祝市政府成立活动，与治安会的武装形成紧张的对峙形势，但没有发生冲突。

一九四五年东北局书记是彭真。十一月，在沈阳召开了各界代表会议，成立东北行政委员会。林枫作政治报告。我是大连代表，在大会上讲了话。第二天，来了两个苏联军官，通知这个会不能开了，国民党要进沈阳。于是，大会停开，各界代表返回原地。

当天晚上，我到了铁西电机学院，林枫给我介绍彭真同志。彭真对刘云光讲，你是大连市委副书记，韩光是书记。明天带老唐回大连。我问彭真同志我的问题怎么办？他当场指示刘云光说，你回去告诉韩光同志，恢复老唐的组织关系，参加市委常委。

一九四六年春，国民党要接收大连。国民党派来一个姓董的中将视察大连。当时大连工人不摸国民党的底，心里有些恐慌，形势有些紧张，市委也搬迁了。

一九四七年春，召开工会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大连市总工会。组织工人成立了七千多人的纠察队，治安维持会还有一千人的武装。国民党中将到大连一看，我们的力量太大，就悄悄溜走了。

解放战争时期，大连对支援辽南战争起了重要作用。肖劲

光、肖华等都来过大连，要武器和各种物资，大连工人阶级给了大力支持。

一九四七年，苏联提出我和刘顺元等五人在大连工作不合适。十一月，我与刘顺元到了通化。辽南军区司令部和东北局辽南分局设在这里。我去哈尔滨，刘顺元被留下，一九四八年二月，他又回到大连。

一九四八年六月，在哈尔滨召开了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成立了东北总工会，我当选为常委兼劳动部长，同时又是全国总工会的劳动部长。东北解放后，我到了沈阳。

**(姜华宣 肖铤整理)**

# 出使东北军

王 英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毛主席率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苏区吴起镇。经过短期休整，毛主席直接指挥了直罗战役。仅用一天半时间，消灭了东北军牛元峰一〇九师和董英斌军一〇六师一个团。

当时，我在中宜县苏区政府任秘书长，由于戴季英执行左倾路线，将原县苏维埃主席张仲良逮捕。张走时把工作移交我承办，因为外地干部只有张仲良、郗成哉和我三人，其他干部都是从当地农民中选派的。从此我承担了中宜县苏区的党政军全部工作。

直罗战役结束后，为了补充部队，陕甘省委指示各县扩大红军，给中宜县分配五百人的任务。在深入的政治动员后，我们按期超额完成。省委副书记李富春同志在套涌塬东村总结扩红工作会议上，表扬了中宜县苏维埃政府。不久，我调到省委，接替张心余（即张德生），任陕甘省委巡视员。

一九三六年二月，我十五军团七十八师师长杨森率部去羊圈塬侦察，将东北军驻富县一〇七师（师长刘翰东）派出来的一个营全部消灭。被俘的一个营长经过教育后释放，让他带去我们省委军事部长兼二十九军军长肖劲光同志的一封信，说明红军主张

共同抗日、停止内战，希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并表示愿把俘获的官兵和枪枝全部归还他们。信中提到，如果他们同意，请富县驻军选派代表，前来谈判。不几天，这个营长又来了。带口信说他们师长同意谈判，请我们派一个代表去富县当面商谈。

我当时是省委巡视员兼省抗日救国会主任。我到甘泉县参加建立抗日救国会工作回来不久，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李富春和省委军事部长肖劲光找我谈话。李富春同志说：“有一件重要工作要你去，这事情和你工作也有关系。现在省委研究决定，要你代表红军去富县和东北军师长谈判，促成东北军官兵抗日，停止内战。我们考虑了，派你去比较合适，这自然会有许多困难和险阻，你有什么意见吗？”我说：“没有意见，就恐怕做不好。”他说：“我们事先商量过了，你能胜任的。”他又笑容可掬地说：“为了利于谈判，省委决定你以红二十九军参谋长的名义去谈判，主要是希望你去后，能和他们订立几条协定，比如说，不要侵犯苏区，不要在边区抢粮、抓壮丁……。能做到这几点也算是协作的第一步。如果他们缺粮食蔬菜，我们可以在苏区和白区的交界上设立集市，互相通商，进行贸易。总之，希望经过这次谈判有所收获。你到那里先探探他们的口气，然后再提具体意见和他们商量。在原则问题上必须讲清道理，如咱们消灭他们一个营，是因为他们破坏苏区、扰乱群众生活的缘故。但方法上要灵活机动，以达到我们要求的目的，希望你在谈判过程中，多用脑筋想一想。”肖劲光部长接着说：“你带去的六个警卫人员，都是保卫部门选的侦察干部。你到那里行动不便，其他人可能自由些，顺便了解一下他们驻军的情况，包括编制、驻地防御情况、武器以及城内市民商业情况等。”他让一位管总务的人员把早已准备好了的黄军

衣，发给我们每人一套。李富春同志又说：“咱们过去俘虏的那个营长，为了保密，他还在羊圈源住着，离这里有几十里路，你走时，这里派人引你去和他见面，你们一块进富县县城，他是东北人，有亡国之恨、抗日之心，路上要照顾他的生活，也要谈抗日的道理。你可以准备一天，明天早饭后起身，当天晚上可到富县，一路上要谨慎小心。”

第二天早饭后，随行人员牵马聚齐，引路的参谋也到了。我再向李富春同志请示，问还有什么吩咐，他说没有。我就由省委驻地东村出发，经过小源子、金渠河到羊圈源，和东北军营长会见，由参谋互相介绍后起程。又经上、下杜宜村、排家源、乔源、河家塔、白草坨，下川到洛河畔、瓦窑沟、进抵富县，至城门时，那个营长先去联系，然后我们进城。随行人员被安排在一个地方。我被领到一个大院落里，在一间宽敞的房子住下。门口站着卫兵，室内陈设讲究，床上放着缎被、毛毯，屋里摆着楠木桌椅、穿衣镜，墙上挂着孙中山先生和蒋介石的象，桌子上摆着《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四书五经之类。正屋外边是东西两排厢房，院里栽着许多花草树木，看得出，它是一个十足的财主庭院。

我休息后，那位和我一块来的营长，引进来几位军官。他指着一位上校军官介绍说：“这是参谋长”。只见那个参谋长身体健壮，笑容满面，他走过来和我握手，又招呼我们坐下。然后说：“我们刘师长今晚很忙，先让我来看你，明天上午他来。这城市条件很差，没有好房子，一切设备都简陋，你们如有不方便的地方，请不客气的提出来。”他指着一位军官说：“有什么不方便就向他说。”我们寒暄一番，即转入正题，我说：“我这次来是和你们商谈

如何归还你们一个营的人员、武器，我们知道你们的处境，东北三省沦陷后，人民遭到了悲惨的生活，目前马占山、丁超、李杜将军在东北坚持抗日收复失地。贵军是东北军队，家乡都在东北，父老妻子都盼望你们尽快打回老家去。蒋介石命令你们到陕北来进攻苏区，和红军作战，这是违反民意的。而且你们军队的消耗也很大，据说进关时你们有三十万人，经过几年的消耗损失，现在恐怕没有那么多人员了。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真正抗日的军队，愿意和一切军队联合起来抗日，更愿意和你们东北军停止内战，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在我说话当中，那位参谋长侧耳静听，不时点头，面部也露出一丝愁容。还有一个尉级军官专做记录。我接着说：“你们如果停止内战不进攻苏区，能做到这一步，我们就可以订立协议，互不侵犯，我们就是友军。如果你们希望在苏区买些蔬菜或土特产之类的东西，我们可以尽可能供给一些；如果你们愿意在白、苏区边界设立集市进行贸易，我们也很赞成。这些意见请参谋长转告贵师长，他如认为可以，咱们再具体商量。”参谋长站起来很客气地说：“咱们今晚谈得很好，你谈的情况我一定向刘师长报告，夜深了，你休息吧！”

第二天下午，那位营长来了，一见面他就说：“对不起，刘师长和参谋长有事，叫我来打个招呼，他们实在脱不开身，今天不能来了。”我说：“没关系。”我看到随同我前来的一个警卫也和他一块来了，在那个营长面前，他对我只说住在什么地方，招待得很好等闲话。当那位营长告辞出去后，他把了解到的情况，向我简要地作了汇报，说明师、团驻在什么地方以及布防情况。并说，东北军官兵在街上闲谈中，流露出他们不愿意开到陕北来打红军，想回东北老家去……。我说：“你们几个人出去各走一路，



在街上了解市民情况，并和接待的勤务兵闲谈，有意识地了解他们的编制、装备、供给情况及官长姓名等。但要注意方式，不能直接打听，只能引导他们自己说出来。如果谈得投机，他们知道你们是红军派来的，你们就借机会宣传我们的抗日主张，称他们为友军，让他们和我们联合起来打日本。”不一会，那位营长进来了。我们就把话题转了。我对这个营长说：“你这次引我们到富县来商量事情，是出了大力的，很有功劳。”他很客气的说：“我们全营官兵受到优待，你们还准备把枪和人马都归还回来，我们真是感激不尽了，今后决不会再打红军，即不得已时，也只能枪口朝天放了。”他说完笑了，我也笑着说：“今后咱们是友军了，还能再打架吗！请你向你们官兵多讲抗日救国道理，讲红军是真正抗日的，是你们真正的朋友，此外把你在苏区见到的情况向同事们说一说，叫他们不要害怕红军。”

我到富县的第一天，就和东北军参谋长谈到双方要绝对保密，所以我不能随便离开住处，只能在院子里活动，因此感到有些寂寞，又想到师长、参谋长不及时来商谈，其中变化很难预测，不过只要能达到口头协定也算不虚此行，至于自身的安危也在考虑如何应付，就在这心情十分焦急不安的情况下，渡过了三个昼夜。

一天早饭后，我正在思索问题，忽听到“敬礼”口令，随着脚步声只见那位营长已先进来向我说：“刘师长和参谋长都来了。”随后只见两位高级军官，带着几名军官和马弁进来了。那位营长把我与师长互相作了介绍。刘师长首先说：“我们全营官兵，受到贵军很好的优待，又准备全部送他们回来，我很感激。”我说：“这是我们共产党的政策，应该很好照顾他们，只是我们苏区条件很

差，让贵军官兵吃苦了。”在双方谈了些恭谦的词令以后，正式谈判就开始了。体格健壮操东北口音的刘翰东师长首先开腔，他说：“贵军提的条件，参谋长已经给我说了，今天我来就是专门商量这件事情。”我想摸摸他们的底，就说：“我们的意见已经谈过了，请刘师长谈谈吧！”刘师长说：“王参谋长提出要共同抗日，我们东北军那个不愿意呢！我们的官兵的家都在东北，谁不想回家去呢，可是我们是军人，要服从命令，因为给养困难，在陕北到处寻找粮食，骚扰了苏区老百姓，真对不起贵军，请原谅。”停了一下他接着说：“贵军提出双方订立互不侵犯、互相通商条约，我们已商量过了，可以写几条，至于怎样写，请王参谋长和我们这位参谋长商量起草，经过双方看过没意见就签字好了。”我看刘师长答应了我们的条件，我又带着对他们鼓励的口气对他说：“刘师长说的话完全是站在国家民族的角度上讲的，我表示十分欢迎，今后咱们打交道的时候还会更多，贵军需要粮食、猪羊请告诉我们，我们一定尽力帮助。”商量结果，决定由我起稿，然后再双方研究修改，他们就告辞走了。

他们走后，我考虑刘师长为人慷慨，有爱国之心，完全可能接受我带来的条件，我便把带来的条约草稿稍加改动，工整的誊清了两份。第五天师参谋长带着一个书记官来了。我就把写好的条约交给他，他仔细看了几遍，又给书记官看，他俩都没提出什么意见，参谋长说：“很好，我带回去请师长过目，如果没有什么意见，我们就复制两份，先盖印了，王参谋长你看怎样？”我说：“只要你们盖印了，我把条约带回去盖印，然后请你们营长带回来，你看怎样？”参谋长笑着说：“好！今后咱们就是朋友了。”

第六天，营长和参谋长把盖过印的条约高高兴兴地给我送来了，并且把公文也送来了。我想此来使命已完成该回去了，就握住参谋长的手说：“这件事你出力不小，请参谋长有机会能到苏区来看一看，我们是很欢迎的，我准备明天动身回去，请转告刘师长。以后在苏、白区交界处，贵军尽可能不去或少去，免得双方发生误会。今后贵军需要采购什么东西，请派代表来，我们尽量协助解决。”他们稍坐后便告辞走了。

由于我出使的任务顺利完成，心情很愉快。临走的那一天，他们为了欢送我们，摆了四桌很象样的宴席，并有许多高级军官作陪，由营长给我们一一作了介绍，这样的场面我还是从来没有经过的。饭后，为了保密，我请他们不要送。临走时他们还给我们军长送了一些礼物。刘师长仍叫那位营长陪我们回来，以便取回盖过章的条约。我们仍然走原路回到东村。一路上我和那位营长随便闲谈，似乎早已是一对熟人。回到东村天已经很晚了。

第二天早饭后，我到省委向书记朱理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李富春及军事部长兼二十九军军长肖劲光作了详细汇报，并将双方协议书两份呈上，请他们阅后盖章。几位首长传阅后，认为不但达到而且超过预期的目的。该协议除前言外，主要内容是东北军和红军互称友军，应在各自管辖区域内活动；如双方军队或武装人员相遇时，都应主动脱离，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如要开枪，枪口向上，不得瞄准目标伤人；其次在边境上设立集市进行贸易，双方人员不准携带武器。可以在市场上自由贸易交换购买所需物品，双方对通过集市进行贸易来往商人允许通行，负责保护，并成立集市贸易委员会，由双方派员组成等。

几位首长认为事情做得很好，很满意，并对我说了几句鼓励

的话，然后讨论今后如何具体实施这个协议。首先将盖印的协议交那位营长带回，又以二十九军军长名义写一封回信，表示感谢双方达成协议和他们送来的礼物（糕点、莲菜、香烟、茶叶等），并向他们回赠了些边区土特产，如核桃、木耳、蜂蜜等。李富春同志高兴地对我说：“你向省委曹秘书长说，要对他们好好招待，你很好的陪着那位营长。”

第三天送营长回去，他带走了回赠的礼物，对我们的招待，他也非常感激。我亲自把他送到白、苏区边境上，互道惜别之情，他依依不舍的上马去了。

不久，我们将东北军那个营的被俘官兵和装备全部归还他们了。

# 拿山一出“戏”

金 忠 藩

(成都军区副政委)

我多次到过拿山，其中一次是在一九四五年，我们以三五九旅为主组成的“南下支队”路过这里北返延安，因为演了一出“戏”，记忆很深。

那时，“南下支队”由广东南雄经井冈山地区往北返回，过长江和李先念率领的五师会合，接受军委新任务。一心“剿共”的蒋介石，妄图趁机把我们消灭于北返途中。为了争时间，争速度，支队昼夜兼行，绕大山，过深林，向北挺进。九月六日，支队抵达遂川的黄坳。虽然我们和延安相隔万水千山，可支队的行动，都是通过无线电请示军委的。到黄坳后，司令员王必谦（王震同志的化名）即和中央联系。军委情况通报：国民党已令其六十师两个主力团分别由永新和遂川两县出发，于第二天（七日）上午九点在我必经之地的拿山会合，设下埋伏，歼灭“南下支队”。情况严重，时不我待；王震同志决定马上出发，抢在敌人到达之前通过拿山。时为深夜四时许。

拿山，是井冈山地区的一个小镇，在永新以南，遂川以北的一个山道里。一条街，几十户人家。前面有条河，河上有木桥，

过桥不远处就是七溪岭，过了桥，就冲出敌人的合围了。七日上午八点四十分左右，“南下支队”的几个团队已通过拿山，我团是后卫，只有五个连，也到了拿山镇。谁知这时发现了一个意外情况。我们后卫团和前边部队相距约五、六里路程，当我们到拿山，先前部队已过去多时；但是，小街上怎么还有这么多人，有的在抽烟，有的在烧水，有的在躺着睡觉，丝毫没有敌情观念。当我走近一看，吃了一惊，街上的，全是国民党兵。显然是敌人插过来了，事情麻烦！这些兵是敌一七九团的，还没有觉察出我们是八路军。当时，我们的衣服又脏又烂，五花八门，有穿衬衣的，也有把战斗中缴获的敌人的军服穿在身上的；又没有标志，看不出是那支队伍。敌人的衣服也是“杂拌”，穿什么的都有，只是从军官的衣服上才看出他们是国民党部队。这当儿，我们通信班的一个同志也发现到情况，或许为了提醒我，他跑来大声向我喊道：“报告团长，这是另一支部队！”好机灵的小鬼！谁知他这一喊“团长”，一出“戏”就给喊出来了。不远处地上躺着一个敌军军官，连忙掐掉烟头，起身整装向我跑来，敬礼报告道：你是一八〇团团座吧，我是一七九团先遣连上尉连长，从遂川开来的，准备在此与贵团会合，同歼王震“奸匪”，请长官指示！报告完后，那家伙伸出手，还要和我握手。当时我穿了一件刚从敌人那缴获的衬衣，胸前挂有一架望远镜；那家伙又听通信员叫我“团长”，就把我当成他们由永新来的团长了。怎么办，打吧，先下了这家伙的枪！可是不行，眼下主要任务是甩开敌人，并且，永新的一八〇团是随时会赶到的，真赶到，就更纠缠不清。那就以假当真吧，混过拿山桥就行，如果他们发现了，咱就硬打！拿山是老革命根据地，三四年长征，我们就是从这儿出发的，这里的地

形地物，那时候就很熟悉，真打起来也没啥，指挥部队边打边迂回，从侧面越过七溪岭，再去追主力，无非就是多跑烂几双草鞋。想到这里，我将计就计地握了一下那个敌连长的手，对他说，我是到这儿来和你们会合的，现在没有敌情，叫部队原地休息。于是街上和敌人后续部队里一串“原地休息！”“原地休息！”的声音。敌传令兵这时给我端来了一洋瓷缸子开水。为了把“戏”做象，给敌人一个下马威，我呷一下水后就把洋瓷缸子“叭”的一声摔在地上，顺手给了那个传令兵一巴掌，骂道：妈的，这么烫，想把老子烫死？！这下子，敌连长给吓倒了，也狠狠打了传令兵两耳刮，转身向我立正哈腰，连声陪笑：团座息怒。看这出“戏”演成了，我就开始向他发号施令，叫他注意警戒，注意隐蔽，部队不要出来，小心暴露目标。敌连长又马上照办。这时，我的二连长一直跟在我身后，象是防备突然战斗似的，我走到那里，他就到那里，我明白战友的好心，可眼下主要是赶快带部队过河上山呀，趁敌人没有注意，我把他的衣服拖了拖。二连长很机智，马上离开，带着部队过桥了。为给部队争取过桥时间，再摸些情况，我又东问问西问问，敌连长都一一回答。末了，见只剩少数同志，我们就全部过桥了。我来到桥头，对敌连长说：我们的任务是占领七溪岭，你在桥头给我放个哨，不要叫别的部队跟我们，以免把我的部队掺乱了！敌连长一口一个“是！”“是！”“是！”就这样，我们在敌人的“掩护”下，安然地过了桥，上了山坡，而他们真正的一八〇团赶到了，发觉上当，可是已经太晚了。

# 初 显 神 通

——记中央苏区红军电台的建立

袁 光

(全国政协委员)

从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红军在江西东固开始反击作战，到五月三十日红三军团攻克福建建宁，十五天里，我们从西向东横扫七百里，一连打了五个大胜仗，消灭敌军三万多人，缴获枪支两万余支，敌人苦心策划的第二次“围剿”彻底失败了。我们无线电大队随同总部胜利开进了山清水秀的建宁城，喜讯一阵风似的传向了四面八方。

我们大队的同志和大家一样，尽情分享了胜利的喜悦。最使我们兴奋的，是在这次反“围剿”的战斗中，我们完好无损地缴获了三、四部电台。看着那一件件摆在面前的无线电器材，大家的高兴劲就象战士们第一次缴到新式武器一样。同志们一个个小心抚摸着这些器材，那神情仿佛是在观赏着稀世之宝：电台啊，我们想啊，盼啊，今天真把你盼来了。这下，我们终于能够建立红军自己的无线电通讯联络了。同志们这种心情，也包含着我们的自豪，因为在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我们虽然只有一部电



台，却为红军的胜利立过不小的功劳。

说起来，无线电队能够发挥作用，首先要归功于毛委员、朱总司令等首长对红军无线电通讯工作的重视。红军诞生以来，不但武器装备很简陋，通讯联络也很原始，一直靠通讯员传递消息。以后，近距离有时可以使用电话了，但稍远一些，还要靠人徒步或骑马联络。速度慢不说，又很不安全可靠。在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冈战役中，为了使一、三军团能实现总部的战役意图，不得不派出参谋长朱云卿同志亲自去同他们联络、部署。因为通讯联络不及时而贻误战机的事情，也时常发生。因此，总部首长一直急于建立红军自己的无线电通信联络，准备通过战争中俘获的敌军无线电器材和技术人员来为我们服务。

那时候，无线电对于我们这些从农村出来的战士，真要算是神秘的东西了。我也只是在帮工时，见过人家家里的收音机，只知道这玩艺能听到老远的声音，可无线电是怎么回事，就讲不上来了。在过去的战斗中，我们就缴获过敌人的电台器材，可是红军战士不认识无线电，不知道它有用，统统都给打碎了。总部知道这个情况后，曾经专门发过通知，要求各部队在战斗中无论缴获什么不认识的物品，一律不得破坏，妥善保管上交。这样，在龙冈战役中，从敌军张辉瓒师缴获的电台器材，才有一些被保护下来。对于俘虏张辉瓒部队中的电台人员，我们总部十分优待，把他们争取过来为红军服务。有了这些技术人员和电台器材，我们立刻组建起红军自己的无线电队，由冯文彬同志任政委，王诤同志任队长，并选调了十几个年轻同志开办了无线电报务训练班。以后，党中央又从上海派来曾三、伍永福（即伍云甫）、涂作潮等同志来加强红军无线电工作。记得第二次反“围剿”前，由于我们只

有一部电台，没有作报对象，大家都觉得有劲用不上。王诤队长却向冯文彬政委提出，可否对敌人电台之间的通报进行监听。冯政委很感兴趣，问道：“收到敌人的通报能不能译出来？”他表示：“没有敌人的密码，译电比较困难，但我至少可以判定敌人的电台在什么地方。”这一建议，立即得到了总部首长的赞同。从此，他每天都注意收听敌人的电台情况。我们那部十五瓦特的小收报机，收听范围很小，但是周围敌人之间的联络，却被置于我台的监视之下，这可以说是我军无线电侦察工作的开端。

无线电侦察的作用很快显示出来。在我们集结于东固之后，十几天里敌人一直没有动作。几万红军追敌而居，隐蔽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有人叫做“钻牛角”，这正是毛委员相信苏区群众的力量而采取的一个大胆决策，目的就是要等待敌人脱离阵地后，在运动中打歼灭战。因此，最紧迫的问题，是要迅速准确地侦察出敌人行动的时间和方向。

五月十三日，侦察员带来了敌王金钰部有出动迹象的消息。可是，敌人究竟要怎样行动，一时还判断不清。第二天，总部异常紧张，那些参谋们出出进进，忙着汇拢最新的情报。这时，富田一带的群众又报告，驻该地的敌二十八师公秉藩部也在拉伕，可能向我推进。情况严重起来，我们耐心地等了二十多天，敌人终于送上门来了。但是，只有准确地掌握敌人的行动，才能拟定完善的作战方案。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无线电队却截获了一个重要的情报。事情是这样的：

那天下午，王诤同志照例在收听敌人的电讯。直到快下班时，他突然收到了富田公秉藩部的电台与该敌吉安留守处的通报，在密码作报完毕后，漫不经心的敌人又用明码谈起话来，王诤同志

惊讶地获悉，富田之敌将于明晨向我进攻，行动的目标正是东固，他高兴而又紧张地抄收敌人的通话后，立即同冯政委一道，向总部首长报告了这个重要的消息。

我们截获的这个情报，和地面侦察到的情况印证后，终于判明：敌人王金钰的四十七师和公秉藩的二十八师将分两路向东固进攻。总部首长立即进行了战斗部署，以红三军团及红三军歼灭公秉藩，以红四军、红十二军迎击王金钰。

听说就要消灭公秉藩，我们可乐坏了。对无线电队来说，公秉藩是个“贵客”。当时其他敌人，都是十五瓦特的小电台，只有公秉藩有一部大电台。我们早就搞清楚他那部XN——FIVE型号的电台，是一百瓦特的功率，有了它，我们就可以同上海党中央、同鄂豫皖和湘鄂西等苏区联络了。可想而知，这部大电台多让人眼馋呀！

五月十六日清晨，我们无线电大队随同总部一起从坳上出发，到达白云山，在半山腰上架起无线电台，准备欢迎公秉藩。白云山真是名不虚传，一个上午，山头都是白云缭绕。中午当白云消散，激烈的枪声就响起来了。不一会儿，电台中传来公秉藩师部电台发出的求救呼号——<SOS>，王金钰那里的电台也连续发出了<SOS>，听到这种呼号，就说明敌人快完蛋了，胜利的消息首先从我们无线电队传了出去。

一共只用半天时间，两处的战斗都结束了。敌人公秉藩全师覆没，王金钰师被歼三千余人。我军首战告捷，揭开了第二次反“围剿”胜利的序幕。

我们日思夜想的那一部大电台，真的被完好地缴获了，遗憾的是当时我们都没有见到。记得我们从坳上出发时，参谋处长郭

化若同志就通知我们，总部决定曾三等几名同志留在后方不动，准备接收公秉藩师部的电台和技术人员，筹建后方办事处无线电队（后方电台）。仗一打完，公秉藩师部无线电器材和技术人员就被红三军特务连小心地押往后方。我们同曾三同志分手后，在中村、建宁等战役中又缴获到敌人几部电台，一下就阔气得多了。看着眼前的那些电台，我们多么希望早日和曾三同志联络上啊。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一九三一年六月二日，是我军无线电通讯史上值得记载的一天。我们在建宁收到了曾三同志从兴国发来的电报。在东固分开时，由于时间仓促，曾三同志和王诤、伍永福等同志只是商定了一些简单的密码，现在，就凭着这简单的密码，我们从嘈杂的太空中收到了曾三同志传来的电报。这是红军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无线电通信啊！顿时，我们激动地欢呼起来，那股高兴劲儿，真比得上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主力在闽西北转入了开辟新地区的工作，我们无线电大队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二次反“围剿”前夕，总部首长决定第一期无线电报务训练班的学员毕业，并把这些同志先后配属到后方办事处、红三军团、红四军等几个电台，无线电大队改称为总队，下属各台称为分队。同时，又从全军各单位选拔学员，开办了第二期报务训练班。李白同志就是这一期的学员。长征时，李白同志担任红五军团无线电队政委，后又被党派去上海做地下工作，于上海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要就是描写他的事迹的。象李白同志这样对革命忠心耿耿又精通无线电业务的好同志，是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红色通信战士的优秀代表。

我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迅速发展，完全出乎敌人的意料。愿

蠢的敌人作梦也想不到在短短的时间里，红军就能掌握复杂的无线电通信技术，也没有发觉他们的无线电联络，早已处在我们严密的监视中。敌人的通报，仍然相当麻痹大意，密码也很简单。每次作战，我们都能缴到敌人的密码本，监听起来，更加方便，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情报，都通过我们无线电台传到总部。

六月三十日，我们电台又截获到蒋介石指交何应钦译的一份急电，得悉蒋介石又在准备第三次“围剿”，并亲自出马担任了前敌总司令，他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已由南昌进到抚州，向所属各部转达蒋介石亲自决定的作战部署。这份重要的情报真是来得太及时了。当时，我军主力在建宁、黎川、泰宁、宁化一带分散发动群众，准备在七、八两个月完成分田、建立地方政权和党的机构等项任务，显然，敌人是要趁我军主力远离赣南之机向我发动进攻。总部首长看了我们截获敌人的这份通报，毛委员当即指出，敌人将很快向我军进攻，这一点已毫无疑义。在同朱总司令和其他首长商议后，毛委员立刻草拟电报，指示我们发往红三军团和红四军等单位，要部队立即抓紧筹款，一俟敌军进攻，立刻在宁化、石城一带集中。准备打破敌人第三次“围剿”的命令，通过我们这部电台传达到红军各部。运用无线电通信这个迅速传递的工具，第三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飞快地完成了。

七月初，我们收到赣南后方台的来电，敌人主力已向赣南逼进。这时，局势十分明朗了。根据各方面得到的情报，总部首长断定：蒋介石已开始了对我的第三次围攻。于是，我们从闽西绕了一个大圈子，避开敌军，回到了根据地内。有了无线电台，部队的行动大大加快了。一些过去对电台持怀疑态度的同志，这时，也对我们竖起了大拇指，表示赞扬。

然而，随着无线电通信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不大不小的问题。在建宁城中，我们电台内部，就曾经发生过一场因为充电机而引起的风波。那时，我们电台都带一部充电机，到个地方停下后，就要发动起来为电瓶充电。这个家伙不仅笨重，发动起来“突突”的也响得很厉害，常常招来很多观众。许多红军指战员都没有见过，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老百姓见了更是新奇。有天充电机一响，群众纷纷围过来看热闹，有的同志看见来的人很多，便去制止群众，向群众发了火。这个问题，引起了领导的重视，我记得毛委员还专门来参加过我们的支部大会，解决这个问题。从那以后，我们就很注意和驻地群众的关系了，群众来看电台，我们不但不阻拦，反而利用这个机会向群众进行宣传，使群众也知道电台对于红军的重要性。这样，电台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做群众工作的有利条件。

在此之后，我们无线电队内部发生过另一件事情。那是第二次反“围剿”中在龙冈发生的。一天晚上，轮到见习报务员李建华随机跟班，值班的是一个在第一次反“围剿”后争取过来的白军报务员。在值班中，李建华发现这个报务员擅自发报，就问他是怎么回事。因为那时没有政委签字，任何人都不准发报的，可这个报务员不肯说。李建华同志警惕性很高，第二天早上，立刻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我们两人都是支部委员）。我想，这还得了，谁知道他在搞什么名堂，便把这件事报告给冯文彬同志。冯政委听了也很紧张，立刻让人把这个报务员捉起来，一边让王诤队长去和那个报务员谈话，搞清是怎么回事；一边用电话向王稼祥同志作了汇报。经王队长调查了解，那个报务员的确和驻吉安敌人联络过，暴露了我们的驻地，但经过审查，他没有暴露更多秘密。

冯政委又把这个情况，及时报告给王稼祥。经过研究，领导认为我们在龙岗是敌人已经知道的，通报没有造成什么损害，加上本人认识还好，对于这样刚刚争取过来的同志，应该以教育为主，就把他放了出来。这个报务员明白，此事如果发生在白军，早就掉脑袋了；在红军中犯了错误却这样宽大，更加感到革命队伍的温暖。我们大家也没有因此歧视他，相反，更注意团结他。后来，使他认识了我们党的政策，这位同志进步很快，不仅成为一名忠诚的报务人员，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尽管发生过这样一些小插曲，我们的无线电通信事业却在战斗中发展起来。不久，曾三同志凭着记在脑子里的密码，用那部大电台同上海党中央建立了联络。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除总部、红一、三军团已有电台外，江西军区、福建军区和十二军相继成立了无线电队。一个完整的无线电通讯网，在中央苏区诞生了。

(信生 施兵整理)

# 地 下 航 道

曹 达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在上海地下党领导下，秘密从事运输工作，曾通过中国福利基金会领到大量物资，并获得运输便利，完成了党交给的一些任务。现在回忆若干片段，供有关方面参考。

## 一、与中福会挂钩

一九四五年年底，中国福利基金会刚从重庆迁到上海，组织上派我去联系，任务是要求该会支援药品器械，并动员一部分医务人员前去新四军参加工作，同时把捐赠和采购的大批药品、医疗器械等物资运送到解放区，支援解放战争。当时我由张承宗同志单线领导，确定我的身份是新四军卫生部驻沪代表，在社会上活动则以商人作掩护。

当时中福会设在苏州南路一七五号外商颐中烟草公司大楼内，办公室面积较小，安放了三张双人写字台，比较拥挤。宋庆龄、廖梦醒两同志合在一张双人写字台办公，有时我们大家同宋庆龄同志一起就在这张写字台上共进午餐。旁边一张坐的是谭宁邦（男，美国人，该会秘书主任）与另一个外国人。专管救济物



资的王安娜（女，德国人）则另坐一张台子办公。我先去找了廖梦醒同志，然后由她介绍给宋庆龄同志。

其实，我一进门就见到了宋庆龄同志，她面外端坐，神态庄重。我简单地汇报了解放区的医药卫生工作和妇女、儿童组织活动情况，她频频含笑点头，认为满意。她听了我的口音，亲切地问：“你也是宁波人？”我答：“是的。”她热情和蔼，平易近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经常去联系后，除廖梦醒同志外，与谭宁邦、王安娜相处渐熟，还认识了其他一些外国朋友。我同他们讲的是“洋泾浜英语”，词不达意以手势辅助，勉强可以应付。该会因来沪不久，一切从简，没有仓库，而联合国救济总署经常有物资可领。为此，王安娜问我有什么办法解决，我提出只要有救济物资可领，希望她不要放弃，拿下来交给我，没有仓库由我解决，提货无人由我设法，运往解放区也由我负责，她表示同意。开始时，王安娜带我去联总领了一批剩余物资呢军服，共十多麻袋，恰巧江苏海门游击支队有人在上海搞运输，我就将这批军服交给他们雇帆船秘密运往海门。还有一次王安娜通知我，联总有二、三十箱剩余物资衣服可领，内有呢大衣、呢裤、绒线衫等。我就利用一家酒行的关系，借了一辆卡车前去提取，堆放在公平路这家酒行仓库里。后来根据组织指示，将一部分衣服按地下党系统分发给党员和积极分子使用，其余送往解放区。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设有庞大的运输机构，陆上有汽车大队，海上有万字号海轮（船名都带有一个“万”字），经常运载物资往来于国民党统治区，而对分配给解放区的物资，则强调种种困难，不予运送，把这些物资堆在虹口公和祥码头上，任其日晒夜

露，被人偷窃调换，一概不予追查。我们亲眼目睹，实在心痛。后来我们好容易将这些物资运往解放区，发现有的整箱被人偷换，全是垃圾石子，令人愤怒。

有次，王安娜问我羊角沟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她高兴地对我说，那是华北沿海解放区，万字轮要试航到那里去。我听了非常高兴，回来查看地图，羊角沟是在天津附近渤海地区，距苏北根据地较远，但万字轮能去，总可以带些东西到苏北。万字轮启航经常在夜里，提货装箱也要在晚上进行。有一天，我接到中福会通知，说在杨树浦底茂昌仓库内有五官科器械五箱可领，需要自己装箱，当晚下船。时间紧迫，我立即动员地下党员钱乃正、程功章、赵天佑和积极分子龚道贤和我一起，每人负责各装一箱，要求既要装得多，又要装得好。大家忘我地劳动，一直工作到东方欲晓，大家虽很疲劳，但精神上非常愉快，觉得有机会为解放区贡献一分力量，无限光荣。

这年年底，宋庆龄同志邀请一些人在她家吃饭，廖梦醒同志告诉我，客人名单上有我。当时我听了，心里忐忑不安，因为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上层社会的宴会，要是有失礼貌，难以向组织交代。后来廖对我说，这次是“家宴”，主要请中福会的同志，为了工作需要，还请了联总专管药品分配的一位主要人员鲍契契（美国人），我是作为中福会职员参加宴会的。这样，我心里比较踏实，但还是担心失礼。当时宋庆龄同志住在靖江路一号，大门口设岗亭，有警察站岗。当天下午，我由廖梦醒同志带领，进入客所，旋即入席。吃饭前按照西方习惯，各人选戴一顶纸制的帽子。廖给我开玩笑，拿一顶尖头纸帽给我戴上，吃起来非常不便。席上，大家讲的是英语，我只好似懂非懂地听着。宋庆龄

同志侃侃而谈，特别是对联总的鲍契契讲话比较多，要求他主持公道，对解放区的药品分配数量要多些，质量要好些。此情此景，说明她对中国革命和解放区建设，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使我深受感动。

## 二、赶运战备物资

一九四六年三月，有一天，承宗同志按期与我联系，我还没有来得及汇报工作，他就说新四军军部来电报，要求上海地下党在两周内无论如何要将医药用品运到淮安华中卫生部，因为那时国民党疯狂备战，企图进犯我苏中地区，而过去一些贩药商人采取观望态度，不再向我卫生部送药，这个任务必须由上海地下党担当下来。他命令我坚决执行，不得贻误。

任务下达后，我即邀集高延年、唐国裕和龚道贤等商量，首先是搞药品，然后设法运往淮南根据地边沿地区，再护送至华中卫生部。第二天，我去中福会将军部急需药品的情况，告知廖梦醒、谭宁邦和王安娜等，经他们商量决定由谭、王赴联总申请分配药品，要我在两天后向王领取，廖并介绍我去江西路汉弥登大楼（现福州大楼）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国际协会办公室，找英国人彼得请其支援。

两天后，从以上两处共领到磺胺类战备药品几十箱，在唐国裕家里分别改装成数十个蒲包，以便秘密运输。同时为了尽可能多搞些药品送往华中卫生部，我和高延年、唐国裕三人，每人拿出黄金一两，连同组织上交给的一两，在市场上采购了一批战备药品，一并委托抗日战争时期经常代我们秘密运货的那些人，运往边沿地区徐家集集中。随后，由高延年率领龚道贤、茅以庭、

王铸农，还有从上海撤退去新四军工作的史文美同志等一行六人，赶往接运。他们到达镇江后，适逢大风，住了两天才过江。到达徐家集后，药品被雨所阻，尚未运到，他们怕久住徐家集，目标太大，有危险，于是冒雨前进，于次日中午到达刘家集。这里也是边沿地区，往来商贩较多，市面热闹，基本上已由新四军控制，但时有小股敌人窜扰。这时老高即去离刘家集五里外的小刘家集，找到华中城工部前沿联络站何志仪同志，向他说明情况，他同意大家住在刘家集候货，一面由他派人去华中城工部报告，并给老高等一支驳壳枪，由王铸农保管，准备自卫。

老高等人住在刘家集，等了一个星期，还不见货到，大家都很焦急。有一天，天气转晴，他们在刘家集高坡上瞭望，发现从徐家集方向有独轮车十多辆，不管道路泥泞，急急赶来。走近一看，带头的第一辆车是老车工老王，他和我们的同志都很熟，因为过去我们经常进出，总请他推车，万无一失。这时全部药品安全运到，大家如释重负，非常高兴。

次日，高延年等随同十多辆独轮车出发，雨后泥泞，大家穿的是皮鞋，一脚下去提起来有三、四斤重，只好一步一拐，慢慢前进，黄昏时才到菱塘桥。在休息时，来了两位新四军同志查询情况，经老高一讲，这两位说是奉华中城工部田辛同志之命来接运药品的，已经等候了两天。当即由他们带领老高等到招待所去住，大家舒舒服服睡了一夜。

第二天清晨在湖边上船，由两位新四军护送。湖面上本来就不平静，自从军调小组到淮阴后，小股特务活动频繁，抢掠事件更常发生，所以田辛同志要派人前来接护。那天刚遇顶风，船工勉强航行，走了一天，不过前进两三里，大家只好仍回菱塘桥招

待所，并由高延年、王铸农和两位新四军同志睡在船上，保护药品。第二天船到中途，忽然芦苇丛里出来一只小船，要我们的船靠过去，两位新四军同志拔枪上膛，指向对方问话，这只小船掉头远去，化险为夷。

过了两天，他们从高邮到达淮安，由华中卫生部齐仲桓部长亲自接待，安排在卫生部招待所休息。老高将全部药品点交给材料科，其中凡是中福会及工会捐赠的，一律按百分之四十付给运输费，由我们出资采购的则按上海原价另加运费结算。那时华中卫生部无现款支付，由军卫生部留守处薛和同志给了一部分汇票交龚道贤、王铸农、茅以庭至上海兑换，老高则仍留淮安等候款项。待我到淮安时，龚等已回上海。

我到淮安后，先去华中城工部田辛同志那里，由他陪同去见曾山同志，报告中福会已决定赠送一所医院的全部设备给苏皖边区政府（主席李一氓同志），希望做好准备，由边区政府派员沿途保护。后来这所医院称国际和平医院，设在淮安湖心寺。

辞别曾山同志后，我找到老高，商议卫生部货款的处理问题，当时“外汇”（指国民党区货币）很紧，药价不断上涨，我们急于返沪继续采购药品，不宜久等，想起有位思想进步的老朋友孔庆增同志闲居在高邮，于是在当地日报上登了广告找寻。不久，老孔来信，我们相会后，决定请其在淮阴开设药房，经常与华中卫生部和孙冶方同志主持的货物管理与联系，开展业务。这样，我们就可在解放区以药房的公开名义，与国民党统治区进行贸易。安排妥当后，我和老高即回上海。

### 三、开设同建西药行

上述运药任务完成后，经领导同意，决定利用这次运药所得的运输费作为资本，在上海租赁湖北路迎春坊十二号楼上统厢房开设同建西药行，以合法手续登记，经营西药买卖，实际上作为进行秘密工作的一个固定联络地点。

我们一面继续与中福会接触，一面与解放区联系。当时的人事安排是：龚道贤任经理，我任副经理，各支生活费壹百元，杜文鼎任会计，孔庆增、韩尚义负责押运，另雇工友一人，开支力求节省。并规定行内不存放物资和秘密文件，以便发生情况时，随时可以转移。

同建行的任务主要是团结一部分进步的医药业职工，代新四军采购药品与医疗器械，设法运往解放区，同时动员一些倾向我党的医务工作者去解放区参加工作。因此经营药品只购进不卖出，有些在国内市场不易买到的药品如高单位青霉素针剂、破伤风血清以及黑热病特效药等则向国外订货。业务对象除了一般药房和医疗器械行外，还与杨延修同志主持的广大药房建立关系，凡是该药房从国外运进的磺胺类及其他药品，首先满足同建西药行的需要。这是通过广大药房的地下党员俞敦华、程功章同志秘密进行的，当时他们没有告诉杨延修同志。

一九四六年六月上旬，经过解放区善后救济总署交涉，联总决定派万字轮驶往山东沿海石臼所口岸，运送解总在沪救济物资。当时中福会分配去解决区的物资是先向联总提取，然后送外商平治明洋行仓库堆放，按件付栈租。开始时堆放数量不多，后来整个仓库都归中福会使用。按照联总规定，开船日期确定后，即由

联总车队派车去中福会提货装船，押车人员由中福会负责。由于待运物资数量较多，有的还要在仓库内整理装箱，时间紧迫，中福会人手不够，我们就动员了一部分同志由龚道贤带领去平治明仓库帮助装箱，并负责刷上中国福利基金会标志，然后押运装船。由于工作量大，而装船时间往往在夜里，因此经常是通宵达旦的工作。

有一天下午四时左右，我们正在仓库里紧张地工作，忽然宋庆龄同志出现在我们中间，当时她身披短大衣，和我们一起劳动，笑容满面地向我们进行慰问，直到五时以后才离开。临走时，再三叮嘱我们，一定要重视装箱质量，并注意身体，确保安全，还要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破坏。她的出现和亲切关怀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大家对每箱物资都经过详细检查，然后装车，每车都派人押运，并要求押运人员亲眼看到全部物资下船后，方才回家。

上述救济物资交万字轮运出后不久，蒋介石在美国政府支持下，以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内战。从七月到九月，国民党军队先后向我苏皖、山东等解放区进犯。当时我们在苏皖边区政府所在地淮阴，开设了永生药房，由孔庆增同志主持，备货较多，淮阴以北和宿迁、沭阳、海州甚至山东临沂等地的部队和医疗卫生机关都来采购药品。到一九四六年七月初，苏皖边区局势日趋紧张，当地区委召集商店和居民开会，宣布为了战略需要，暂时撤退。孔庆增同志参加了会议，听了报告，即将药房结束，回到自己家乡高邮临泽，正拟与上海联系，恰好韩尚义同志从上海通过封锁线安全返家，将我托他带的口信告诉了老孔，要老孔赶往山东石臼所接运同建行托联总万字轮运去的药品，并设法开辟海上运输线。于

是孔、韩两人在各地紧张备战的情况下，不避危险，不辞艰苦，从家乡出发，经过阜宁、益林等地，赶往山东地界，在莒县一带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军卫生部材料科负责人胡山、张树芹同志，将万字轮运到石臼所的全部物资交给军卫生部，供应了部队急需。

#### 四、药品空运延安

同建行成立后，我有公开的社会职业作掩护，通过同建行与中福会的联系日益增强。当时廖梦醒同志因中福会任务紧张，人手不够，要我介绍可靠人员参加工作，经向领导请示，决定派赵天佑同志前往，组织关系，由我联系。他在中福会的名义是练习生（BOY），实际上信件的收发传递、本市文化界救济物资的分发，乃至打扫办公室等事务，都由他经办。当时宋庆龄同志发给郭沫若、陶行知、金仲华以及英、美领事馆和苏联领事馆等处的信件很多，都由赵天佑同志负责递送，任务是很艰巨的。他除机警勇敢、勤恳工作外，还学习英语，深得领导信任。

当时廖梦醒同志兼任中福会会计工作，任务繁重，不易兼顾。不久，谭宁邦对我说，上海新华银行孙瑞璜和严景耀介绍一位会计给他，名叫汪海清，要我调查一下是否可靠。我知道汪是地下党员，但不便明说，立即笑了笑回答说：“汪海清是进步人物，我很熟悉，是可靠的。”后来汪即入中福会任会计。隔了一些时，我去中福会联系工作，看见余志英（地下党员）在协助廖做秘书工作，后来余志英同志去别处，由顾正新同志（地下党员）继任。他们两人通过什么关系参加中福会工作，我不知道。此时，中福会工作人员中，我们同志所占的比重大大增加，但组织关系保持各自的系统，互不往来（廖梦醒同志由总理办公室和张执一同志



亲自联系)。中福会内没有中共支部，但是，大家在工作上配合得很好。

赵天佑进中福会后，对我的工作大有帮助，本来我每天要去中福会同王安娜联系，现在可以由他代替，王安娜有时要找我，或者用电话直接通知我，或者告诉老赵转告，因为老赵白天在中福会工作，晚上在同建行住宿，总会碰到我的。这样，我可以抽出时间多考虑些运输问题。有一天，老赵来同建行告诉我，王安娜说日内延安有架军调小组的飞机来上海，只耽搁一下就回延安，延安卫生部门要中福会支援一些战备药品及化验试剂，开有清单，要我做思想准备。当时的延安处于国民党重重封锁之下，药品来源非常困难，亟须争取空运以济眉急，但军调小组飞机往返时间捉摸不定，而且按他们的性质来说，是不会同意我们托带药品的。可是机组里也有倾向进步的美国人，比较同情我们，愿意利用工作方便给我们半公开地带些药品，我们要考虑他们的处境，巧妙地进行工作。当时王安娜等四出奔走，既要找到飞机，又要找到肯带药品的对象，工作极度紧张。

隔了两天，王安娜要老赵把延安带来的药品清单送给我。此时已在下午五时以后，按照常规，次日上午配货，下午取货，算是最快不过的事，去延安的飞机决定次日晨六时起飞，时间极其紧迫。好在同建行经常备了晚饭，邀请一些医药业的积极分子聚会，彼此交流思想和业务情况，所以一到晚上门庭若市，市区较大药房都有人到场。当我接到王安娜通知延安有飞机来上海要带药品回去的消息后，就在积极分子中传达，要求各大药房的货栈在这几天内都有人通宵值班，听候通知，随时发货。

那天晚上，我把药单向大家公开，要求全部配齐，在当夜十

二时左右送到同建行。大家看了单子后，个个表态，有的当场敲定，有的回去查货，一时同建行空气紧张，电话频繁，送货收货，忙碌异常。时钟刚敲十二点，各药房的货物，包括战备药品和化验试剂全部送齐。由同建行同志验收打包，次日凌晨三时左右，由我和老龚雇了两辆三轮车送往香港路颐中烟草公司仓库。但机组人员还未来。呆了一会，由王安娜事先联系好的几个美国人到来，立即将我们送去的药品过磅验收，我向他们表示感谢后告别，随即去中福会向王安娜汇报情况，她听了非常高兴。

### 五、解放区送来“黄鱼”

万字轮北驶，起初在山东石臼所卸货，不久烟台解放，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烟台设立办事处，几艘万字轮即在烟台靠岸。这时我同高延年、唐国裕、龚道贤等除了帮助中福会装运救济物资下船外，还动员和输送了几批医务人员随船去烟台，现在记得的有章映芬医生、胡鸿慈夫妇等，其他许多人的姓名，早已忘记。

当时，万字轮到岸情况如何，音讯杳无，我经常到中福会和工会向王安娜和彼得探问，他们双手一摊，也不知道，实在使人耿耿。

有一天，突然接到彼得通知，要我到他的宿舍去一趟。工会的集体宿舍在提篮桥附近，是一幢三层楼洋房，我接到通知，非常兴奋，第二天清早赶去，刚进门，遇见王逸民同志，他是地下党员，抗日战争期间我们一起在华中城工部跑交通。此时我知道他在工会当司机，驾驶一辆中吉普车，但按照地下党纪律，没有组织介绍，不能发生横的关系，因此只得装做不认识，问他彼得

在那里？他说在三层楼亭子间吃饭。我上去一看，除了彼得外，还有一个外国人，两人正吃得起劲，谈笑风生。彼得看到我出现在门口，站起来向那位外国人使了一下眼色，似乎暗示你要找的人来了。于是那位外国人呆呆地盯着我，后经彼得介绍，原来这位外国人是万字轮上的海员（姓名、职位已忘记），倾向进步，但政治上比较天真，所以用神秘的眼光对待中共地下党员。我去时已在家里吃过早饭，但为了方便谈话，很自然地参加他们一起，共进早餐。

这顿早餐很别致，餐桌上除炒蛋、面包外，摆满烟台苹果和张裕白兰地酒。那位海员介绍说，他是用烟台苹果和张裕白兰地当早餐的，要我按他的办法用一次别致的早餐，我当然奉陪。谈话从他以一个外国人怀着好奇心情进入解放区开始，谈到他在解放区的所见所闻，用活生生的事实，粉碎了国民党对共产党、解放区的一切诽谤和污蔑。同时还说到新四军卫生部宫乃泉副部长招待他吃饭时，他向宫表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愿意为军卫生部效力。最后宫副部长要他回上海时，到中福会或工会找我，并交给他一张字条和五条“大黄鱼”（五十两黄金），再三叮嘱一定要亲手交给曹达，不能讹误。当我由他手里接到宫副部长的字条和五根金条时，内心非常激动，向他表示了由衷的感谢，随即相互紧紧握手道别，以后再没有和他会面。

王安娜和她的儿子王利民住在长乐路陕西南路附近一幢朝北小型洋房的二楼（楼下系余志英夫妇居住）。因为我一向同她接触，认为总是一本正经地只谈工作不及其他，不符合人情，所以有时也谈谈家常、谈谈生活。有次，我谈起只有一个儿子，同利民一样已经十岁了，本是随便说说，她却记在心里。有一天，她

忽然邀请我和儿子一齐到她家里去参加利民十周岁生日的聚会。我不懂西方风俗，硬着头皮带着儿子同去，以为到了安娜家里，礼节一定很隆重，会有许多外国朋友到场道贺。不料除了她们母子两人外，客人只有我们父子两人。礼节开始，主客四人围坐在圆桌旁，桌上放了一只很大的圆型蛋糕，还有两大盆烟台苹果。蛋糕上有十枝小蜡烛，于是安娜将蜡烛燃起，为利民祝福。待蜡烛熄灭后，安娜将蛋糕瓜分，每人一碟，还有咖啡、苹果一只。我们边吃边谈，十岁的利民除中国话外，能讲英语和德语，很活跃。席间安娜告诉我，上次去延安的飞机已安全到达，延安卫生部要的药品、试剂，全都送到。同时还说，有一艘万字轮从烟台回来，船长是外国人，军卫生部官副部长托他带了“大黄鱼”五条，要安娜转交给我。当场她在抽斗里把金条取出给我，还有官副部长的亲笔信，说这些“大黄鱼”除了结清同建行的贷款和运输外，余数继续采购，还说军卫生部考虑特派员来上海采购药品和医疗器械，要我多加照料。当时，我对安娜不辞劳苦，甘冒风险为我们党操心办事，表示感谢和钦佩。

后来张承宗同志按期来同建行和我联系，问我经营情况如何，我汇报经营顺利。他说组织上要四条半“大黄鱼”派用场，我当场请会计拿出交给他。后来他说雁荡路永业大楼有间公寓房子，组织上决定让我去住，要我注意这两天《新闻报》上的出让广告。过后，我根据报上的广告前去联系，原来出让者是浦作同志，我就办妥手续，搬进新居。当时同志中除龚道贤外，其他人都不知道我的这个住所。

## 六、十几麻袋法币和两筐水果

先后北驶的万字轮将载去的物资运到，纷纷返航回沪，最后一艘万字轮去烟台是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以后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撤出烟台，胶东地区战斗激烈，物资疏散，大部分干部暂去大连，万字轮的航行中断，当时大部分船只停泊在上海杨树浦外黄浦江中，什么时候再航，谁也不知道，根据当时形势估计，可能遥遥无期。

万字轮的海员们返沪后比较活跃，他们把到达解放区后的见闻，奔走相告，突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一些倾向进步的船长或海员常去中福会和工会，找安娜和彼得聊天。这些情况被国民党特务发觉，对从解放区回来的万字轮非常注意，千方百计，进行探索，想抓住把柄，加以打击。

有天，王安娜通知我去，说有紧急事商量。我在当天下午四时左右到中福会，她非常紧张，一见我就说，有位万字轮船长，倾向进步，在山东解放区接受了新四军卫生部的委托，带来国民党法币十几麻袋，放在船长室。按照国际惯例，各国政府对外国船只的船长室是不许搜查的，可是国民党特务这次坚持要搜查船长室，几经交涉，均无效果。他们通知这位船长，定于第二天下午派员下船检查，船长急得没有办法，一定要王安娜在第二天上午将十几麻袋法币提走，免得发生麻烦。于是王安娜将这个任务交我去完成。

时间紧迫，来不及向领导请示，我思索了一下，要求王安娜通过工会的彼得借一辆中吉普车，插上联总旗子，指定由王逸民驾驶，在第二天清早去杨树浦江边，将万字轮上的麻袋包卸在车

上开到中福会，再由我接应，同时要求她和赵天佑一起上车帮忙。当时我们的计划是次日早晨车到杨树浦江边后，由王逸民、赵天佑下船搬麻袋，王安娜在岸上望风，全部麻袋搬齐后，开车就走，一分钟也不停留。但那时正当一九四六年夏秋之间，上海人民奋起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其呼声之高，声势之大，前所未见，国民党反动派妄图镇压，在重要马路都派有便衣特务巡逻，每条桥梁派兵把守。因此，情况是严重的，任务是比较艰巨的。

当天晚上，我和赵天佑进一步商量，估计国民党特务未必已探得这艘万字轮船长室内有解放区带来的法币，但这些特务也不是傻瓜，他们对那些倾向进步的外国海员，早有怀疑，总想以突击搜索来发现问题。此外，这些特务对革命群众穷凶极恶，而对外国人则卑躬屈膝，又是一付面孔。因此，我们认为采取兵贵神速，出奇制胜的办法，完成任务还是有把握的。最后，我对老赵说：“明天你要上战场了，必须头脑冷静，见机行事。工会的司机老王是有斗争经验的老同志，要多与他商量。王安娜的作用，你也应该知道。明天上午九时许，我设法搞一辆卡车，在苏州南路中福会门口等候你们，接运这批麻袋包。”于是，两人互相勉励，握手告别。

第二天早晨七时许，一辆插有联总(UNNRA)旗子的中吉普车开到中福会门口，王安娜、赵天佑随即上车，直驶杨树浦黄浦江边。当时江边虽有几个人，但见是外国人办事，谁也不来过问。于是王逸民、赵天佑雇了舢板摇向万字轮，由于事前已联系好，舢板刚靠拢轮船，轮上即将麻袋包抛下，顺利摇回码头上岸。两人快手快脚地将麻袋包搬上汽车，不料麻袋包刚搬完，江边有人大声叫喊：“钞票！钞票！”准备阻拦。此时王逸民态度镇定，立即脚

踏油门，飞驰而去。一路上为了避开尾随，绕道而行，过白渡桥时，开足马力一闪而过，从福州路联总大门进去，又从边门驶出，直达苏州南路中福会门口。此时，我已从一家酒行借来卡车等在那里，于是一面从吉普车上将麻袋包卸下，一面装上卡车，开往湖北路同建行卸货，任务完成。

同建行的同志们忙将麻袋打开，拿出一叠叠法币来，仔细端详，不禁大吃一惊：“啊呀！”原来许多钞票上写着或用戳子盖着“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等等口号。这一惊非同小可，大家七手八脚，忙将麻袋包缝好，要我迅速处理。我不敢怠慢，立即要龚道贤打电话叫了一辆祥生轻便汽车，将全部麻袋包运至唐国裕家中暂存，他住重庆南路复兴公园对面，在他父亲开设的大商行当职员，岳母笃信天主教，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以此家庭掩护革命工作，比较有利。当晚动员了同建行的同志去唐家整理法币。

那时同建行与一家小钱庄有往来，为了替解放区采购物资，透支了不少款项亟待清还。此小钱庄为了我们亦有周转不灵的困难。眼下大宗法币到手，却不能派用场，怎么办？我一面和钱庄的负责人商量，请他们撑持几天，共度难关，一面和同志们紧张地在唐家整理。由于事关政治安全，我们必须一张张地反复检查，不能留下丝毫破绽，因此开始时进度缓慢，头天晚上只整理了两袋。接着连夜奋战，主人热情招待，供给上等咖啡，美味蛋糕，大家虽然疲劳，但内心兴奋，有说有笑，也就把疲劳丢到九霄云外去了。这样，后来速度加快，每整理出一批，次日就解往钱庄。花了一个星期，才基本上整理完毕。剩下来一些有字迹的法币，有的是大票面五元、十元一张的，就用退色药水处理，小

票面一元一张的暂存唐家。一九四七年秋，我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谍报组特务追捕，深恐连累唐家，由唐的爱人将这些法币全部秘密烧毁。

解放区运来的十几麻袋法币总算顺利解决了。后来又有一次（可能是一九四七年万字轮最后一次从烟台返航后的几天内，具体时间记不清了），王安娜要我去中福会领取新四军卫生部托外国海员带来的一份“礼物”：烟台洋梨和莱阳梨各一筐，说是专程送给我的。我拿回家里，打开笨重、密封的包裹一看，原来是五两重的黄金壹百条，附有字条，要我继续采购药品并扩大地下航道。

## 七、开辟地下航道

浏河镇距上海市区七十华里，属江苏省管辖，是长江口上的一个大集镇，人口稠密，市面繁荣，出镇两华里，登堤远眺，一望无际，江水滔滔，奔向大海。只见海上风帆，来往不绝，有的是当地渔民出海捕鱼鱼船，有的是各地商贩来此进行贸易的货船。当时苏北和山东解放区与江南一带蒋管区秘密进行交易，有相当一部分就在此进出。镇上设有很多鱼行和棉花行，在鱼汛和花汛季节，各地帆船到埠，客来客往，十分热闹。我认识一家义丰花行，系钟百川合资经营，职工吴宽梁、张阿发等，也很熟悉。

一九四六年秋，有一天，张阿发来上海找我，事先约好在天主堂街（现四川南路）吉美咖啡馆见面，他告诉我刚从山东解放区涛雒（日照县境内沿海的口岸）回来，陈春宣同志在那里当国营贸易商店经理，要他带口信给我，希望装货去进行交易。陈是浏河人，抗战前在上海天主堂街钟百川与人合夥开设的吉丰花行当职员，业



业余时间参加革命工作，担任过益友社的党支部书记，我在益友社认识他，在他的启发教育下，介绍我入党。一九四二年他从上海撤退去淮南根据地搞贸易工作。当时我听了这个消息，非常高兴，经与同建行同志商量，大家觉得可以利用这个关系开辟地下航道。当时，张阿发等筹划为货放船去涛雒，要同建行合作，我们同意了。于是以张为主，在浏河雇了一只熟悉的帆船，由他去设法放出浏河口，再由他负责押运，结果同建行分到了一些利润。

不久，孔庆增、韩尚义在山东与新四军卫生部取得联系，经军卫生部派在涛雒的同志安排了两只帆船，内装生油、碱猪肉等土产，由他们各乘一船来吴淞口，同船来的有卫生部材料科胡山、郝奎、王川三位同志。后来党支部书记张树芹也决定来沪，为转组织关系一事，由宫乃泉介绍他去司令部请示陈毅司令员。那天清晨，老张去了，陈老总正在吃早餐，桌旁坐着参谋长陈士榘，陈老总看到张树芹，叫他一同吃早饭，老张汇报了组织上决定派他和几位同志到上海采购药品，请示党的组织关系是否要转去？陈老总严肃地对他说：“你们到上海后，应该多听上海地下党的意见并请他们照料。组织关系不必转去，由军部打电报给刘长胜同志。”当老张起身向首长告别时，陈老总再三叮嘱要小心谨慎，胜利完成任务，早日回来。

当时山东的战局非常紧张，莱芜战役即将打响，孟良崮战役正在酝酿，战备物资需要急迫。孔庆增到达吴淞口后，当天即来同建行，由我安排在唐国裕家住宿，比较安全，胡山住在石门一路附近他的岳父家里，其余两人暂住十六铺一家同解放区有贸易关系的油行里。根据军卫生部指示，两船货物，一船由胡山负责，另一船归同建行处理。我将货物很快处理妥当，老胡的一条

船开至十六铺由那家油行处理。过了两天，我去老胡住处联系，说明今后在工作上有什么问题可到同建行商量，但采购运输各自单独进行，事后各向军卫生部结算。

我将上述情况，向上级领导汇报后，即组织力量，采购药品，接洽雇船，几路并进，不到一个星期，雇定帆船两艘，装满货物，仍由孔庆增、韩尚义押运。工作中比较辣手的是运出港和雇船问题。为此，我去拜访了钟百川先生，他是浏河镇上的开明士绅，倾向进步，参加益友社被选为常务理事。当时他一口答应支持，并为我们代雇了周襄兄弟的帆船两艘，约定货物由浏河派卡车来上海运去，在浏河口外装船，限日起程，直放连云港，孔、韩和周襄三人则乘轮船去青岛转连云港，然后上帆船直驶涛雒口岸。这次出航，一切顺利，除运输药品等货物外，还带去地下党从上海撤退至解放区的黎隆木等同志。

老孔这次去解放区，又和华东财委孙冶方同志挂上了钩，他要老孔在上海采购药品的同时，兼办其他一些战备物资。当时由孙安排了两只帆船，装满食油等土产，仍由孔、韩押运，并派沙杰同志同船来沪。他们在一九四七年二月离开山东，其时莱芜战役已经结束。

## 八、两次事故

我们在解放区的关系日益增多，服务范围相应扩大，除药品外还兼营其他物资，其中绝大部分进行顺利，但也出过一次事故。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次，华东财委孙冶方同志派了一位同志来上海找我，说国民党反动派出动大批坦克向我防地进犯，

我们正在发动群众布置地雷阵，迫使这些坦克寸步难行，但制造土地雷需要硝酸、雄黄和洋铁罐等原材料，他在上海可以弄到一些洋铁罐，但硝酸和硫黄难以买到，因为一般商人虽给以高价，也不愿承受此项买卖，要我帮助设法。他的要求是采购硝酸数吨、雄黄几百斤，办妥后立即雇船运出，我当时也无把握，只答应试试再说。后来通过一些关系，硝酸和雄黄总算办到，问题是必须包装妥善，保证安全。因为在装运过程中，我们不能向卡车和帆船上的人说明是危险品，只能含糊其词，请他们多注意，而且这两种东西不能放在同一卡车或船上，特别是硝酸更要包装结实。当时我们将原包装加固，然后借了一家酒行的仓库堆放，候船装运。过了两天，这家酒行来电话，说是我们存放的物资中有一箱正在冒烟，要我们迅速去处理。我们去后，发现有一箱硝酸倒放，因此在坛口上冒出烟来，幸好我们曾用橡皮在坛口上扎好，所以问题不大，否则可能燃烧，引起大祸。

硝酸和硫黄顺利运出后，我们松了口气。隔了不久，这位同志又来同建行，说这次来上海还有一个任务是采购电讯器材，他到处打听，国民党反动派对这类物资管制较严，没有相当熟悉的人，决难买到，要同建行帮忙。恰巧龚道贤有位堂弟在南京路华美电料行当职员，通过这个关系将所需电讯器材全部配齐。我们并代他雇了船，要他将电讯器材运往浏河上船。不料，就在从上海运往浏河途中出了事，原来他随便雇了一辆卡车去浏河，经过大桥有两个守桥的浏阳自卫队员前来查问，因为事先没有打好招呼，自卫队员将车上的木箱打开一看，发现是电讯器材，当场扣下。那位同志急得没法，找我想办法，我即去请钟百川亲自出马交涉，他一口答应，立即去浏河，向自卫大队说，这批东西是我的

朋友的，既然被查到，应该怎么办？谈判结果，由同建行出资赠送跑鞋一百双了事，货物发还，照常出海。

### 九、输送干部的惊险场面

一九四七年五月间，因国统区的货币不断贬值，物价上涨不已，上海市面萧条，我们虽然利用木帆船运货出海，但周转太慢，去解放区一趟往往需要两三个月时间。为了开展业务和保持地下交通，同建行酝酿租用机帆船往来于上海和解放区之间，经营货运。恰好这时浏河一带有艘余姚的机帆船，因业务清淡，需要找寻出路，经浏河熟人介绍，船主愿与我们合作，他提出要签订合同，载明租用期限和租金，条件比较苛刻。此时同建行内部意见不一，龚道贤认为条件过高，租费太贵，不宜订约。孔庆增顾虑这只机帆船载重一百吨左右，租期固定后，如果解放区一时没有足够的土产装回，势必停船待货，增加租费，造成亏损。当时我也决定不下，于是请示张执一同志（此时我的组织关系由张执一同志单线领导），他处事果断，一口同意，并指示我如有适当机会再购买一只机帆船，以便开辟上海与长江沿岸（原新四军五师地区）的地下交通。这样，就由浏河镇伪镇长莫杞蕃作保，与船主正式签订合同。

合同签订后，船只立即驶往浏河口，装货待航。这时地下党经营的富通印刷厂已经暴露，国民党反动派派了大批军宪、警察和坦克去富通搜捕，经理胡国成被通缉。张执一同志命我将胡国成同志随船撤往山东解放区。我将这个任务交老孔执行，并要龚道贤同志协助护送。

时值端午节后不久，海面上风平浪静，航行顺利。当机帆船

行至水灵山附近时，见远处有只机动船在巡逻，大家不明真相，心中忐忑不安，待该船逼近，一看船上人员穿着农民服装，虽个别人持有枪枝，但非正式武装，并口称是“自己人”，老孔等即不再猜疑，任其上船检查。不料，在检查中胡国成被指有“老八路”嫌疑。这时，才知道原来是敌人的游弋船，上当受骗了。敌人将全船人员连同货物一并带至水灵山进行审讯。老孔和莫妃蕃一道被审，其他船上工作人员另外审讯，胡国成单独审讯。当时相互之间无法联系，只好听天由命，各说各的。老孔和莫妃蕃一再申明是去解放区做生意的，胡国成是搭客。当敌人押送孔、莫两人由审讯处去拘留处时，途中看到胡国成已被敌人五花大绑并戴上手铐。过了几天，水灵山敌人决定将此案解往青岛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处理。

全船被押去青岛，进入青岛小港时，已经傍晚，来不及解送。夜间胡国成与孔、莫两人同住一个舱内，正值守卫敌人不在，老胡推了老孔一下，暗示要跳海逃跑，老孔即点头示意，当时他认为要是老胡不在船上，次日解往青岛警备司令部时，事情比较容易处理，否则事态扩大，难以收拾。转瞬间，听到“扑通”一响，老胡已跳入水中，守卫的敌人四出搜查，在船上未曾找到，老孔不知究竟，心里担忧。其实，老胡在跳海前已将手铐挣脱，他擅长游泳，水性很好，跳入海中就潜伏在水里，然后游到对岸，趁行人稀少之时，爬上岸去，投奔附近亲戚家躲藏起来。敌人认为他已葬身海底，不了了之。

次日，敌人将船只扣押在小港，将孔庆增、莫妃蕃和船员两人解往，他们被关押一个多月，审讯了好几次。后来两个船员被释放，立即打电报给上海的船主和浏河镇镇公所，浏河方面立即

派人去青岛找恒盛昌商行设法解决。船主持电报来找我，我的意见是要想法把人和货物、船只都弄回来，所需费用由同建行负责。后来由青岛恒盛昌商行通过青岛警备司令部的关系，进行贿赂，同时船主也通过上海中国银行一位副经理的关系，向青岛警备司令部副官长行贿。不久，孔庆增、莫妃蕃交保释放，船只发还，全部货物则被没收。

此事以后，不论在吴淞口和浏河口，国民党反动派控制益加严密，海面上也经常出现国民党海军小汽艇巡逻。在这种情况下，设法找帆船去解放区逐渐困难。为此，我向张执一同志提出，是否可将同建行暂时歇业，他没有同意，要我们振作起来，继续干下去，在任何环境下，都不能使地下航道中断。

## 十、特务上门，出走香港

一九四七年六月间，张执一同志命我去香港与万景光同志联系，共同研究如何开展上海与香港的贸易问题。

我第一次到香港，一切都感到新鲜。上岸后住六国饭店，次日即去一家进口行找老万。行主是他的亲戚，他在该行设有四人写字台一张，作为通讯联络地点，实际上，就是上海地下党在香港的联络站。当时，老万忙于党内联络工作，没有正式职业，也不经常在该行办公，但每天必到一次，处理信件、电报及来访者留言，有时还去码头接人，安排住宿。这些工作只有一个人担任，相当忙碌。此时上海与苏北解放区的地下交通比较困难，原因是大军北撤后，苏北已成游击地带，去山东解放区也不方便。因此上海地下党在香港设立了联络站，并在那里秘密举办整风学习班，对上海地下党的领导骨干进行轮训，学习完毕仍返上海坚

持斗争。必须撤退的干部则绕道朝鲜仁川港输送到东北大连或山东石岛，转往各地工作。

当时张执一同志的意图是要我们开辟港沪贸易作为掩护，同时藉此赚些钱弥补在香港的开支。我在香港与老万谈了这件事，一时想不出做些什么生意。正等候间，接到上海电报，要我立即乘飞机回上海。到了上海，才知道同建行在浏河准备运出的物资出了问题。原来我们曾通过浏河义丰花行找到一只帆船，答应装货去解放区，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在浏河口外派有海军小汽艇巡逻，已经不能在口外停船装货，只得将船放进浏河，停在义丰花行附近，选定夜晚偷偷摸摸装货下船，然后一面等候风向，一面探听口外有没有巡逻哨，才能伺机出口北驶。这些货物装船后等了很久，没有机会。忽有消息传来，国民党将派海军小汽艇封锁浏河口岸，我们虽然着急，但别无良策，只得观望一时再说。不料有一天国民党的海军小汽艇突然开进浏河口，对停泊在内河的帆船逐只进行搜查。义丰花行听到风声，通知同建行已来不及，即由该行吴宽梁、张阿发等同志趁当晚月色阴暗，与船家联系，将船上货物悄悄搬至该行，一面通知同建行派人前往处理。我到上海后，立即前往，将全部货物委托义丰花行妥为保存，避免了一场灾难。这批货物一直存放到上海解放后，才由龚道贤前往提运，上交给张承宗同志销账。

浏河事务处理完毕后，张执一同志为了不使地下交通中断，向我布置了三项任务：一是要我用一切办法，寻找关系设法购买机帆船一艘，以便使用；二是介绍由汉口来上海的张鸣皋（即张翼）等同志给我，要我代他们设法租赁一幢店面房子，开设商行，准备与解放区进行贸易；三是介绍陈祥生给我，当时他已在

宁波租了房子，设立字号，准备雇船去山东解放区，要我帮同他解决由上海输送物资去宁波，然后运山东解放区。对这三项任务，我逐一办理，只陈祥生在宁波因雇船关系，引起船帮争吵，被国民党警察局得悉内情，将其逮捕，后来出卖革命，堕落为可耻的叛徒。新四军浙东支部地下交通线遭到了严重破坏。

我在同建行除了特殊约会或处理重要问题外，一般不出头露面。一九四七年九月的一天上午十时左右，我正在同建行外室同一些西药商人谈生意，突然来了两个不速之客，一进门就东张西望，问“这里是同建行么？”我看苗头不对，在座的一些西药商人也觉得有问题，沉默观望，我不得不挺身而出，回答说：“是的。”他们又问：“这里有个曹柏年么？”（曹柏年是我过去在上海使用的姓名）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有的，最近没有来。”这两个家伙又问：“曹柏年是做什么的？”我答：“他是西药掮客，有时来这里购买西药，有时不来。”他们说：“喔！同建行是谁负责？你是什么人，叫什么名字？”我说：“我也是西药掮客，叫王松年，这几年靠买卖西药混点饭吃。同建行负责人是龚道贤，他到市场上去了，吃中饭时才回来。你们有什么事情，我可以转告。”当时我态度从容，随口对答，没有引起怀疑。他们随即拿出两张名片，说要龚明晨九时在同建行等候，有要事面谈，说完扬长而去。两人走后，我将名片详细一看，原来是上海警备司令部谍报组的人员，在座的一些西药商人一见名片，面色苍白，纷纷逃散。我考虑到事态严重，立即嘱咐会计杜文鼎准备结束，应付突变，并要他转告龚下午来我家面商。我离开同建行时，向周围环境观察了一下，感觉情况还不紧急，估计这两个特务对我的活动还没有掌握确证，为了防止可能有尾巴，只得绕道回家。



当天下午老龚来我家，共同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国民党反动派在战场上到处挨打，“六·二三”上海各界人民示威游行，声势浩大，他们接连遭到失败，可能狗急跳墙，下毒手镇压。近来对我们出海的地下运输加紧海军巡查，控制甚严，这点我们已有觉察。同时，我们对这两个特务也进行研究，看来对同建行和曹柏年的情况还不够了解，可能是藉此敲诈。当时我们决定找关系摸底，设法销案，于是同去看望钟百川先生，他当场答应找人去联系，要我们听他的回音。我这次离家出门，还是穿着西装，但换上了一根黑色领带，这是组织上约好的危险信号，地下同志看到我带上黑色领带，就会知道我已出事，大家回避。实际，我是在早上十时左右发生问题的，地下组织在下午三时以前已将我的情况通知了和我有关系的同志。当晚我没有回家，睡在亲戚家里。

第二天中午，老龚同我在预先约定的地方会面，告诉我钟百川先生方面已与警备司令部谍报组特务接触过，对方表示可以谈判，我方坚持只出钱，不具保，以免日后麻烦，当时正在进一步谈判，事态暂告和缓。这时张承宗同志派浦作同志同我联系，他预先在我家附近等候，待我儿子去学校读书时，尾随其后，行至冷僻处即向其询问我是否在家。这个孩子本来是认识浦叔叔的，但当时他撒了个谎说，“爸爸已去杭州。”浦作同志听了不相信，对他做了思想工作，于是约我在第二天早晨碰面。次日我们碰面，老浦通知我，张执一同志约我在淡水路关帝庙内谈话。

在约定时间，我到了淡水路关帝庙，一进庙门就见到赵朴初同志（当时是居士身份）合掌相迎，口念“阿弥陀佛”，随即陪我去方丈室坐下。稍顷，张执一同志来到，我们三人就在方丈室

内点了几个素菜，共进晚餐。我将两个特务来同建行的情况，详细作了汇报，并请老张指示。他要我将所有经手的事迅速处理妥当，转移到香港万景光同志处暂住，并说他不久也将去香港，约定在那里碰面。

次日，我将解放区送来藏在我家的一百根五两重的金条转移到张执一同志指定的地点，妥为保存。此时，恰巧去宁波跑单帮的人将我们托运的汽车零件全部送回，我即将这些零件，还有从中福会领来放在同建行准备运往解放区的电影放映机一台，安全地转移到组织上指定的地点保存。接着将同建行和南市大成油行结束，同建行的房子顶出，所得顶费交粪办理善后，他俟一切处理停当后回宁波乡下暂息。我把各事安排好后，即乘飞机去香港，开始另一阶段的斗争。

**编者注：**曹达同志还写了一篇地下航道续记，将在本刊第九期发表。

# “行总”烟台办事处斗争散记

张 沈 川

(全国政协委员)

## (一)

美帝国主义为了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在我国抗日战争时期，明目张胆地用很多精锐武器，装备了几百万蒋介石的反动军队，支持和帮助蒋介石进行内战的部署。并且利用《国际救济协定》中，“凡受战争灾难的地区，均应予以救济，不能因政治和种族有所歧视”的条文，借口救济我国被日寇沦陷地区的灾民，把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分署（以下简称联总）的大批救济物资，运交蒋介石反动政府，作为大举进攻解放区的资本。很明显，当时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受害的灾民，在华北各省已经建立了有人民政权的解放区。例如，山东解放区的灾民，就有三千五百多万人。论理，联总的救济物资应当大部运交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以下简称解总），转发各解放区的人民政府，分配给各地真正的灾民。再如，黄河复堤工作是为挽救河南泛区而进行的，但复堤工作尚未完成即中止，黄河故道河床居民尚未迁完，

国民党政府居然于一九四六年底在花园口实行堵口，致使山东解放区居民，遭受水灾威胁。为此，解总驻国民党南京政府代表周恩来和董必武同志，多次向联总和国民党政府据理力争，美蒋置之不理。到一九四六年夏，狼狈为奸的联总和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以下简称行总）才同意分配一部分救济物资和继拨部分黄河复堤与河床居民迁移费给解放区。由解总、联总和行总三方议定，在山东解放区的烟台设立行总的办事处（以下简称行总烟办处）。

当时，烟台是华北各解放区唯一的海港。行总和联总之所以同意分配一部分救济物资给解放区，是有其政治阴谋的。他们妄图借运救济物资到烟台的机会，搜集解放区有关政治、经济，尤其是军事的情报。为此，行总设立“调查处”，“专管”分配解放区救济物资事宜。里边有处长向景云（和蒋廷黻在清华大学同学），骨干铁明（军统特务，上海解放后被逮捕）等。联总驻烟台代表小组组长为美籍李普尔，行总烟办处主任王思量。

王思量和我在山东青岛大学同学，一九二七年，他转到武汉大学时入党，二八年同在上海作地下工作。由于白色恐怖严重，二九年秋，王去新加坡后脱党。后去菲律宾，任华侨中学校长，和在菲岛的军统特务机关有联系。日军占领菲律宾期间，王为美军搜集日军的情报。美军再度占领菲律宾后，美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麦克阿瑟给王以海军少将的官职，充当美国间谍。一九四五年秋，王以菲律宾华侨代表身份到重庆，借口向国民党政府请求拨款，救济美、日军在菲岛作战时受害的华侨灾民，进行政治活动。

王思量到重庆后，在国民党外事局招待美军的胜利大厦舞厅

内，遇见我的高小同学王厚荃，知道了我的住址，找到了我。王思量在新加坡时，知道我在南京国民党监狱坐牢。这次见面时，我在经商，是信义棉织厂的经理，他不知道我有没有党的组织关系。但他还是对我吐露了一些他到重庆后的活动情况。如：戴笠、毛庆祥（军统局主任秘书，蒋介石的亲戚）等请他吃饭，和王耀武往来，等等。我随时都向组织上反映了。王还到上清寺中共代表团住所会见过董老。

行总烟办处成立时，王思量企图利用我作为他在烟台和中共方面接触的桥梁，管接运救济物资等具体工作，他好在上海吃喝玩乐。因此，他向解总方面提议，要我任行总烟办处副主任。周恩来同志决定让我利用这种社会关系，到该处去工作。一天晚上，董老在梅园新村通知我时说：“恩来同志此时正在接待外宾，没空和你面谈”。我对董老说：“王思量的政治面貌，特务活动，在重庆时，我都向组织汇报了，你们知道。此人招摇撞骗，吹牛拍马，反复无常，翻脸不认人，很难共事。请转告恩来同志再考虑一下，最好我不去”。说话时，钱之光同志在座。第二天上午，恩来同志继续接待外宾，没空和我谈。董老告我：“昨晚我向恩来同志转达了你的意见，恩来同志还是决定你去该处工作”。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在这个问题上，我和王彼此心照不宣。但我对他随时提高警惕的。

这时，行总在南京召开全国善后救济工作会议，各省、市善后救济分署署长均出席，王思量亦出席，解总驻行总代表小组组长伍云甫同志列席了会议。董老要我去大会会场和王思量联系。我到会场大门口，遇见王和伍走出大门。王介绍我认识伍，我和伍装作不认识，寒暄了一番。其实，一九二九年，我曾在上

海帮助伍学习过无线电通讯技术。这种关系王始终不知道。会议结束后，王和我开始进行行总烟办处的筹备工作。草拟该处组织规程，呈文备案等。

行总机关设在上海福州路，靠近外滩。行总全国善后救济工作会议结束后，行总烟办处和解总驻行总代表小组（组长林仲、成润、纪锋、祝华、朱友学等）在行总机关内占一办公室。解总代表小组是公开的，合法的，但国民党反动派暗地派人注视他们。他们进出机关，照常工作，不去理睬。烟办处没有宿舍，王和我住靠近国际饭店的金门饭店。

同年九月初，周恩来同志从南京到上海后，在马斯南路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就解总、联总和行总三方的关系、到烟台如何开展工作，对我作了说明和指示，后我依照《关于烟台办事处具体问题协商解决办法》的内容，草拟了《蒋周协定》。记得有下列几条：

1. 行总烟办处应用的两部电台，由行总拨给。报务员由中共派定。
2. 凡由沪运救济物资到烟台的船只，回沪时，一律放空，不得载运解放区的商货和搭乘旅客。
3. 行总配给烟办处十轮大卡车五十六辆。凡由烟台运救济物资到胶东各县及其他解放区的车辆，回烟台时一律放空，不准载运商货和旅客。
4. 凡在解放区卸、装、运救济物资的费用，由行总担负三分之二，中共担负三分之一。
5. 烟台地区使用解放区人民政府发行的“北海币”与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交换的比价，暂定为一比十五，以后按当时

的币值折算。

6. 烟台地方现尚安静，倘一旦进入战争状态，烟办处员工的安全，全由中共方面负责。

7. 救济物资发给山东等省各管战争灾难地区的医院、慈善团体和广大灾民，以期恢复生产和改善生活。

8. 行总烟办处和联总驻烟台代表小组全体人员所需房屋、家具及伙食费，由中共供给。

行总烟办处共三十多名员工，是王思量秉承行总的意旨组成的。这些人中，有的政治质量较好（通过解总介绍的），有的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军、战干团、特务等反动组织，情况比较复杂。我到烟台大致了解后，即向朱友学和解总烟办处主任李澄之等反映过，促使大家提高警惕。

去烟台前夕，周恩来同志在马斯南路办事处还指示：我同烟台地方党不发生关系，党组织关系保留在上海，和吴克坚同志联系；关于救济工作，暗中与伍云甫同志联系。

一九四六年九月末，行总烟办处二十多人，联总代表小组二十多人（其中多数是美国人，还有英、印尼等国的人）同乘运救济物资的“万善号”（即美国送给南京政府的十艘登陆艇之一），从上海驶往烟台。

船经青岛，停泊一昼夜。当时，山东全省大片土地已经解放，济南、青岛还是国统区。所以，山东省善后救济分署分为济南、青岛两个分署。王等会见联总驻青岛分署代表、英人齐贺福，商谈有关救济工作的联系问题。行总配给烟办处的两部电台，由青岛分署调拨。由于当时山东解放区缺乏无线电机务人员，经解总、行总双方商定，由该处调姚善莖和杨某（名已忘）

两名机务员到行总烟办处工作。

船继续北驶烟台。

## (二)

我们到烟台后，按解总烟办处的安排，联总代表小组住招待所，靠近海滨，房屋整洁，每顿西餐，质量很好，不付分文，外国人皆大欢喜。行总烟办处住东山区田家巷一号交际处（原英国领事馆），靠近海滨，庭院幽静，绿树成荫。烟办处管行政、生活的韩科长、公务员、炊事员等都是解总烟办处派去的。大门有专人日夜轮流守卫。烟办处人员都佩戴符号，伙食质量很好，超过解放区干部的伙食标准好几倍，不收分文，大家都很高兴。

由于烟办处人员的政治关系比较复杂，除与解总烟办处及烟台市人民政府有关人员暗商密切注意防范外，还规定：无论装卸、运救济物资，行总烟办处人员和解总烟办处人员共同工作，不单独出差。本处人员平时不准进报房、电台由王清生（共产党员）、谭子纲（共青团员）严格管理。同时，对全体人员进行正面教育。如：请烟台市人民政府行政、经济等部门负责人，理论联系实际，给他们讲解有关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政策，学习有关法令等。一天，我同几个思想进步的人员，在赶集时买到一九四四年第一次出版发行的《毛泽东选集》，分别进行阅读。人们亲眼看到了解放区广大群众对人民政府的忠诚爱护，人民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全体干部艰苦朴素、努力奋斗的革命精神等。在这种最现实的教育启发下，使大部分人员和联总的某些人员过去对解放区的某些误解，或者所受到的某些反动宣



传，在认识上都或多或少地有所认识，有了新的看法。

但是，改造反动思想，确实很不容易。例如：会计谢家相（国民党员），借口要求改善伙食，播弄是非，企图挑起其他人员对共产党对人民政府的不满。他还同总务科长舒真光勾结，利用我处借用解放区“北海币”，偿还“法币”时，两种币值兑换比率的结算中，贪污“北海币”若干元，通过奸商，套购黄金二两。经本处其他人员揭发，查对核实后，只好退回赃款，谢、舒两人一并撤销职务，送回上海。尤其是反革命分子更不甘心灭亡，蠢蠢欲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中旬的一天清早，在办事处大门外附近墙缝中，发现一张盖有“铁血锄奸团”红印图章的反革命传单，当即经解总烟办处报烟台市公安机关进行侦破。

一九四七年春，王思量从上海派吕某来烟办处工作。当时，未即向王了解吕的政治面貌。两周后，烟台市有人发现吕是福山县人，外出经商，几年未回，忽然出现，改了姓名，很值得怀疑。报告市公安局侦察，并予拘留，一个多月后，驱逐出境。此人显然是王派去烟台搞情报的，但一经发现，即采取了措施，王的阴谋未能得逞。

根据“蒋周协定”，行总分配解放区的救济物资，应有农、工、矿及交通运输器材，“以期恢复生产，改善生活”。可是，行总却一意孤行，不予分配。为此，解总驻行总代表小组组长伍云甫，曾函请行总召集有解总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讨论并商定分配救济物资的适当比例，并提出具体数字。如：分配给解放区的农业物资，应占联总运华农业物资总吨数的百分之二十点四，工矿设备百分之二十三点五，交通运输器材百分之十四。尽管解总方面为此理直气壮地力争，行总仍置若罔闻。

从一九四六年十月到四七年五月的七个月中，烟办处接收行总分配给解放区的救济物资共七万三千吨，加上黄河复堤、运河修堤工程粮一万另二百吨，还不到联总运华救济物资总吨数的百分之二。而且其中有些是不适用的女高跟鞋、香烟、糖果和一些破烂的东西。这些物资很零碎，有一千多种，一百多万件（以箱或包为单位）。但解放区灾民，还是忍气吞声地接收了，并且加以认真管理。仓库所存物资数额，按期报核，领导常常视察。车库汽油消耗规定严格，如看戏，不准坐汽车。全部救济物资没有贪污、盗窃、浪费、占小便宜的，可以说是点滴归公。尤其是解放区的广大人民群众，热情支持救济工作。例如：一次，分配给烟台码头工人若干袋救济面粉，他们运回清点，多了两袋，即刻退还。原在上海被割窃了的衣包，运到烟台后，没空缝包，即运存乡间村前树下，衣服露出包外，无专人看管，过两三天，仍无遗失。一次，由烟台运大衣包往莱阳，在山道上震落一大包，正寻找时，两个农民抬着衣包，送交当地救委会等等。这是解放区人民的美德，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教育出来的优良作风。

另一方面，行总分配给各省、市分署的救济物资，被贪污、盗窃、侵占、浪费的不少。联总方面对此意见很大。他们把解放区和蒋管区的救济工作对照一看，两个地区，两种政权，本质不同，有天壤之别。联总人员对烟办处的工作表示赞许，解总烟办处人员也很了解，很愿意合作和帮助。

胶东、鲁南、苏北一带，有一种黑热病，其症状是患者消瘦、常发烧、腹肿胀、不思饮食、易传染、难医治。联总的刁医生（印尼人）认真诊断，进行研究，疗效渐著，还培训了一批当地的医生，深受群众欢迎。刁医生对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解放区，很气

愤。

在卸、装、运救济物资时，尽管车辆、船只上设有标志，但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经常派飞机从青岛起飞，在胶东和烟台港口一带开枪扫射，投弹轰炸。有时还伪装运救济物资，进攻解放区。例如：一九四六年十月底，一艘伪装运救济物资标志的舰只，驶近烟台港外芝罘岛时，向岛上开炮，驻守该岛的解放军即予反击，该舰速向东南方向逃窜。又如：同年十一月十三日下午三时，由上海运救济物资的“万敬”、“万慈”轮驶入烟台港后，蒋机两架飞来投弹四枚，俱落船侧，并用机枪扫射码头，一装卸工受伤，卡车一辆被毁。因之“万敬”轮卸完物资，即驶往营口躲避。“万慈”轮物资尚未卸完，即驶往渤海羊角沟躲避。而继由上海运救济物资驶往烟台的“万刚”、“庆龄”轮，则停泊海中待命，不敢进口。为了避免轰炸，烟办处屋顶平台上，用白漆写着“行总烟办处”缩写英文字样。一天，我去车库时，蒋机低空掠过，不断扫射。我招呼一位带小孩的妇女，火速倒卧墙下，听到子弹叱叱的响声，从头上飞过。行驶在胶东一带的车辆，几次受到蒋机的扫射，司机受伤，物资受损，车辆打坏。在这种情况下，卸、装、运救济物资工作，处于停顿状态。解总烟办处主任李澄之急电上海解总驻行总代表小组组长伍云甫，请将上述情况，转达联总、行总，并向有关方面提出严重抗议，终止对救济工作的破坏阻挠行动。可是，蒋机还是不断骚扰。不得已，卸、装、运救济物资工作，全在夜晚进行。冬季，寒风凛冽，冰天雪地，从未间断，十分艰苦。

国民党反动派还造谣，说分配给解放区的救济物资，都作军用了，没有发给灾民。为了揭露敌人的造谣诬蔑，我们在烟台市

附近和胶东各县分发和灾民领取救济物资时，拍了部分照片。一九四七年九月，我从烟台带回两套大小照片各二百多张，交行总和解总驻行总代表小组各一套备查。

一年中，蒋介石集团在美帝国主义的积极支持下，表面上继续和我谈判，实际上，他悍然推翻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于一九四六年六月进攻中原解放区，七月进攻苏皖解放区，十一月单方面召开伪国民大会。周恩来同志对美蒋破坏和平谈判，发动反革命内战，全面进攻解放区的严重罪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回到延安，对国民党反动派表示抗议。

一九四七年一月，山东人民解放军准备进攻莱芜地区蒋军李仙洲部。胶东军区军运紧迫，车辆不够。解总烟办处与我处密商，借我处十轮大卡车二十多辆，由储运组负责人张扬同志于深夜在烟台市外三十里的车门镇交给胶东军区司机，三、四天后交还。国民党用大量的救济物资进攻解放军，解放军借几辆汽车有什么不可？莱芜之役，于二月下旬结束，消灭李仙洲部六万余人，李被俘，打了个大胜仗。当然借车搞军运事如被蒋匪帮查悉，张扬同志和我是有生命危险的。由于王思量常住上海，不知道此事。我处知道这事的几个人，也未告密，才平安无事。

同年二月，以需要较好纸张印报表为名，在上海购来印钞票纸一批，交解总烟办处转山东解放区北海银行印“北海币”。后来，上海市政府主管部门向我处问到这批纸的用途，经应付过去了事。

国民党反动派抛掉了和平谈判的假面具，于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下令中共代表团驻上海、重庆、南京三地的全部工作

人员于五天内撤离。三月七日董必武同志离开南京。接着，解总驻行总代表小组组长伍云甫同志离开了上海。

一九四七年三月，我同解总烟办处主任李澄之等到福山、栖霞、牟平等县视察救济物资分配情况。接着，我们又乘运救济物资的登陆艇到渤海区羊角沟，视察物资分配工作。羊角沟位于流经济南的小清河口，靠近黄河故道入海处。黄河改道后，原河口到渤海淤沙一百多里，运救济物资的登陆艇，停泊海中，候涨潮时，用小机船和帆船，将物资转运到羊角沟。一天下午，我同秘书汤姆森（女，澳大利亚人，向联总借用）由登陆艇坐小汽船回羊角沟，适值退潮，在沙滩上搁浅，由船夫供给晚餐。第二天涨潮时，才回到羊角沟。为了便于和烟台通讯联系，携带一部无线电台（手摇发电机）到羊角沟。当机务员姚善堃试机时，他不叫烟台电台，而叫青岛电台，一经发现，立即停止他的工作，并把他监视起来，进行教育，让他写书面检讨。以后未再发生类似事件。

由于我和烟台地方党不发生关系，市党委和市人民政府的领导同志等对我不了解。一九四七年二月，石光同志（一九三〇年在上海一同被捕坐牢）去大连休养，过烟台时，知道了我在当地工作，便向烟台市委书记滕京禄同志讲了我过去的情况。通过烟台市长姚仲明同志，密约滕、石和我在姚家见面并晚餐，我对他们说了行总、联总人员的政治情况很复杂，不去看他们的原因。滕说因不了解，未招呼我，表示歉意。不久，陈家康同志过烟台去大连休养时，姚仲明同志密约我到他家，陈、姚、我三人在姚的寝室内，陈把周恩来同志在上海对我的指示，转达给仲明同志后，市委也了解了。

一九四七年五月，我因公乘登陆艇回上海，王思量乘另一登陆艇从上海去烟台，未碰到。王到烟台后，与烟台市商会会长隋石卿等商议，利用运救济物资回沪放空的登陆艇，载运商货——龙口粉丝、干对虾、苹果等四千多吨。船停吴淞口外，由若干只帆船运走。这样作，对解放区的商货找到了销路，是好事。但王却从中私收不少运费，烟办处人员知道后，意见很大。连王亲自安排在本处工作的丁士权（青年军）等，都联名向行总控告了他。

这时，王思量将行总配给烟办处使用的一辆吉普车，由烟台悄运回沪，与司机谢某勾结企图隐瞒，据为私有。后被行总查获，勒令交还。

一九四七年五月初，我回上海后，蒋的海军封锁烟台，我隔在上海，不能回去；王思量隔在烟台，不能回来。我在上海期间，仍和吴克坚同志联系地下工作，转信和碰头的地点，仍在开源银行。

这时，我送几瓶烟台“白兰地”和对虾等给行总调查处长向景云。一天，向约我到他家午餐后，对我说：“我已收到三封密信，控告王思量玩忽职守，私收运费等。国防部二厅厅长郑介民派人在国际饭店盯他的梢，看他在上海究竟干些什么？”我立即对向表态：“唉呀！王是郑介民那边的人，住在上海，不去烟台工作，要我在哪里负责，如果有人诬我通共，怎么得了！”向说：“你是我们行总派去的，行总当负完全责任，怕什么。”联总人员对王不去烟台工作，意见很大。烟办处秘书汤姆森在烟台就对我吐露过，我劝她不要讲这些话。

由于王思量私收运费，企图隐瞒吉普车和玩忽职守等行为，行总对他很不满意。一天，副署长李卓敏、调查处长向景云等约我谈话。李对我说：“行总如果继续搞下去，就撤王思量的职，

由你负责。”向说：“王应法办。”我说：“不能这样，还是让王继续搞下去，这个责任我负不了。”从这时起，美蒋准备大举进攻解放区，不分配和运送救济物资给解放区了。王的问题，行总以后也未再提了。

同年五月，我从烟台回上海前，由解总烟办处向烟台市人民政府索取一部分有关人民政府政治、经济、文教卫生等方针、政策的对外宣传材料。五月底，行总署长蒋廷黻要我汇报行总烟办处的工作。我讲了以下一些情况：

我们按照“蒋周协定”的条款，老老实实地在烟台工作，但遇到很大的困难，白天，政府飞机从青岛起飞，轰炸扫射从烟台运救济物资到胶东各县的车辆和烟台港内外的舰只。尽管车上、船上有明显的标志，还是几次打坏了车辆，打伤了司机。所以卸、装、运救济物资的工作，都在夜晚进行。冬季，冰天雪地，也未停顿，十分艰苦。全部救济物资，没有贪污、盗窃、浪费、占小便宜等情事。解总、联总人员都很满意。我们同解总烟办处合作得很好，工作也很顺利。蒋氏问到解放区人民政府关于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的方针、政策，就我半年中在烟台亲眼看到的有关上述方面的发展情况，对他说了，带来的那部分材料也给他了。还讲了联总代表小组人员史鲁域祺五月中旬在烟台市街上驾驶汽车、压死了黄包车夫杨禄奎，市人民公安机关立即将史逮捕法办。联总代表小组组长李普尔等到追悼会上吊唁，抚恤死者家属。另一方面，美军在距烟台几百里的青岛，一年中发生车祸一百四十多起，压死我国同胞数人，都没听说依法惩办肇事者。蒋氏听了这些情况后说：“听来很感兴趣！”又说，他就要出国主持远东经济会议，回来后，再约时间和我谈一次。不久，行政院长

宋子文，对蒋廷黻批拨六十亿元法币给解放区作修筑黄河堤的经费等，表示不满，蒋被迫辞职，由宋子文的亲信霍宝树继任署长。

同年八月中旬，王思量从烟台到天津，乘客轮回沪。

美蒋匪帮准备大举进攻解放区，九月十日，行总决定派我、联总也派一美国人乘“万毅”号轮去烟台，将该地和河北省衡水县的工作人员全部撤回上海。由于战争形势十分紧张，我到烟台时，市人民政府的某些单位已经撤退到内地去了。解总烟办处主任马保之、市长姚仲明和因事去烟台的钱之光等同志，密约我到姚家谈话。我要求把行总烟办处和联总代表小组人员撤离烟台后，去延安或山东解放区学习，不回上海了。他们都不同意。当时，周恩来同志在延安，我要求发电报请示恩来同志，他们的一致意见：目前形势这样紧张，战事一触即发。电报要由胶东军区转，不知何时才能到达。可以肯定，即或恩来同志收到你的电报，他一定还是要你回上海的。而且三天以内，联总、行总全体人员必须撤离烟台。我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当晚，召集烟办处人员开会，和联总代表小组联系，加速进行撤离工作。结算接收的救济物资帐目，五十六辆大卡车交解总烟办处接收，等等。还要张扬同志等仔细清查书籍，以防书内夹有信件、字条，小心谨慎，提高警惕。我们于九月十六日离烟，十九日到沪。

当时，胶东地区住有俘虏的国民党军官一千多人，马保之同志将被俘军官（南方人）的一百多封家信给我，要我带到上海付邮。又将解放区卸、装、运救济物资运费单据一大包给我，要我到上海向行总结付这笔运费。

这时，鲁南日照县行总石臼所办事处主任李国干（军统特务）等数人，因上海早已无船运救济物资去石臼所，他们就到烟台办



事处，候船回沪。我到烟台时，听说李国干和张扬同志等在下列问题上有着激烈的争论：张等决定，如烟台发生战争，就随市人民政府撤往解放区；李等反对，决定留在烟台，等国民党军队打来了，找机会回上海。我到后，一走进办公室，第一次见面的李国干就对我说：“你来了，我们就放心了！”这句话，我当然有所警惕。

烟办处和联总人员乘“万毅”号登陆艇离烟回沪途中，一天傍晚，停泊吴淞口外，李国干伏在甲板上写了一阵后，对我说：

“回到上海，要好好教育张扬一番”。我说：“张扬年轻，缺乏修养，能原谅的就原谅吧”。第二天早上，船进吴淞口时，李对我说：“昨晚谈要教育张扬的问题就算了吧”。我说：“这样就好”。上午十时左右，船靠十六铺码头，布有军警，顿时戒严，只向景云和联总一人上船。接着，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检查组一班人，在组长赵广禄率领下上了船。一上船，李国干就赶上去和赵密谈。很明显，李在搞鬼了。检查组在甲板上摆起桌、椅，俨然“法庭”，对我处人员，一面逐一讯问，一面检查行李、书籍。一开始，就在张扬的书籍中，搜到一张解总烟办处向行总烟办处借用吉普车的借条。张扬管汽车队，这是违反“蒋周协定”的。又搜到一封解放区临沂山东大学教授李仲容同志回吕虹同志（张扬的爱人）的信，同意她去山大学。在这种紧张情况下，我把俘虏军官们的家信，吕虹为曹孟君向烟台市人民政府索取有关解放区妇运的材料等放在皮包里，抱在怀中。我想：我是副主任，大概不会检查我的皮包吧。

这时，我招呼站在码头上的王思量设法上船，要他立即去警备司令部找他的熟人——稽查处罗科长（名已忘）。王回来说没找到，拿着一张罗的名片。大概是王和赵打了交道，才没再讯，

问人员，停止检查行李、书籍。下午三点多钟，我们才下船。当晚，张扬夫妇逃离上海。过几天，王思量说：“李国干写材料，向南京军统局密告张扬等四人，材料是行总总务处长毕镐奎（军统特务）转去的。”其他三人是谁？王没说。军统局批交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查复。我劝王请罗科长在国际饭店吃饭，讲好话，把被搜去的借条和信抽回来，免再纠缠。三天后，王说，他请罗科长吃了饭，提出要求，罗拒绝了。究竟王和罗交涉了没有，情况怎样，不清楚。以后，也没再追查张扬了。张扬夫妇匿居南京时，利用社会关系，找到一本《国民党军政人员训练计划》，我从南京带回上海，交给吴克坚同志了。

一九四七年九月中旬，行总烟办处人员从烟台撤回上海后，机构撤销，每人发给三个月工资的遣散费，我留办结束事项。九、十月间，蒋匪帮即将大举进攻解放区，战争形势日益紧张。行总应结付解总几十亿之法币的运费，必须赶快弄到手。我要两个会计办理，王思量不同意，他企图从中捞一把，我反对。不得已，我背着王，一个人住在西藏路大中华旅馆内清理运费单据。可是，单据很不齐全。如渤海区一笔运费五亿元法币，只有一份电报，一张单据也没有。行总会计手续繁琐，我没学过会计。一面勉强按行总会计规程作帐，一面送些烟台土特产“白兰地”、对虾等给行总会计科长，请他帮助。幸得到把最后一关的总稽核室稽核张勉之先生（民主建国会会员）热情、积极的协助，核准付给解总的运费六十多亿元法币，不胜感激。我取得这笔款项，交给解总驻行总的留守同志收讫。他们离开上海了。一年来的救济工作，就此结束。这场十分尖锐复杂的斗争也告一段落。我仍隐蔽在上海，在吴克坚同志领导下，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 中央苏区第一任粮食 部长陈潭秋

钱 希 均

(全国政协委员)

一九三四年初，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军事上的冒险主义，使得红军在反“围剿”的斗争中，仗越打越艰苦，根据地越打越小，人力、物力消耗也越来越大。当时，军粮问题，成为红军所面临必须解决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为此，全苏中央政府决定：把粮食调剂局改为粮食部，由陈潭秋同志任部长。

陈潭秋同志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是我们党一、三、四、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曾在安源煤矿做过工运工作，理论水平和组织才能很高。他任粮食部长，是完全胜任的。有一天，我和毛泽民同志到毛泽东同志的住处，正巧碰上了陈潭秋同志在毛主席办公室商谈工作。

潭秋同志说，根据目前情况来看，要依靠战斗部队到边沿地带和白区活动，打土豪、打胜仗等筹粮筹款的可能性不大了，粮食问题要全部在苏区内解决。这一工作，还须请政府各部特别是财政部、土地部密切配合。

主席边点头边回答说：“是的，目前我们整个苏维埃政府都

应围绕我们的主要任务，发动群众，争取物质条件，保障红军的供给和给养。尤其是粮食问题，这是关系到能否坚持和敌人作战的大事。所以，搞其它工作的要尽力协助你们。搞粮食工作的不仅要筹集粮食供给红军，还要把今年的春耕工作搞好。潭秋同志，你的担子是很重的啊！……”

的确，潭秋同志的担子是很重的。那个时候，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不顾根据地的具体条件，盲目地无限制地扩大红军，超过了根据地人民所能承担的经济负荷。另一方面，在军事上与敌人硬拼硬打，丧失了主力红军外线作战的灵活性，从而也就断绝了外线筹粮筹款这一取之于敌的重要财源，造成了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和红军粮草的供给严重不足。解决部队吃饭问题，成了保障供给的突出任务。为此，中央及第二次全苏大会号召马上掀起筹集粮食的突击运动。

潭秋同志一上任，就率领粮食部全体工作人员，积极地投入到筹集粮食的突击运动中去。

江西的二、三月份还是比较冷的，刮起西北风来也感寒风刺骨，一些同志的脚都被冻肿了或冻裂了口。在寒冷的初春，潭秋同志脚穿草鞋，头戴竹叶斗笠，身着单薄而有补丁的棉衣，时常出现在东村西乡，为筹集粮食而亲自奔跑。深夜，仍可看见他屋里的小油灯，在微风中摇摆，潭秋同志冻红了的手，拿着小楷毛笔，还在全神贯注地批写报告或起草文件。

那时候，我是中央政府机关总支部副书记，谢觉哉同志是政府秘书长兼总支书记。我们总支分了工，由我负责联系内务部、粮食部、司法部等机关支部的工作。记得在潭秋同志任粮食部长不久的一次支部会上，主持会议的同志请潭秋同志给同志们讲粮

食工作的问题。潭秋同志笑了笑说：“在坐的同志，好些是原来粮食调剂局的，工作经验丰富，还是先请同志们谈谈吧。”于是会场就活跃起来，大家七嘴八舌，各抒己见，提出了不少办法。潭秋同志也参加了大家热烈的讨论。我看到这种场面，心里顿时感到潭秋同志真行呀！来这么几天，就与同志们相处得这么热乎，谁也不显得拘束。

最后，潭秋同志作了总结发言，他认为同志们提出了一些可行的办法，一定要抓紧实施，在工作中要注意各县和区、乡的实际情况不同，筹粮筹款应区别对待。要耐心细致地做说服动员，坚决反对粗暴简单的作风。他还严肃认真地说：“目前粮食问题成了红军供给中的主要任务，我们工作的好坏，是关系我们苏区的巩固，红军的存亡的大问题。现在外线筹粮已被敌人的封锁完全卡断了，全部粮食要在苏区内部解决，要把这一工作做好，我们的困难还是很多的，往后，我们的任务还会加重，希望同志们多出主意，搞好工作，完成中央预定的筹粮计划，掀起筹粮借谷的高潮。”

在筹粮借谷的突击运动中，老百姓虽然存粮不多，又不是小春作物收割季节，但为了支援红军，他们宁愿自己吃野菜，也把粮食省下来交给苏维埃政府。

尽管根据地的人民如此节衣省食，支援红军，但因根据地的缩小，所能筹集到的粮食始终不能满足迅速扩军和战争的需要。为了进一步解决这一问题，中央和中央政府发出通知：各级政府、企业、学校，每人每天减发二两米。为了推动这一节约运动，潭秋同志及时发表了《把节省运动开展到群众中去》的文章，号召大家珍惜老百姓支援的粮食，并且积极开荒种菜，响应毛泽东同志

提出的“粮不够、瓜菜代”的口号。把节约下来的粮食支援前方红军。潭秋同志，不仅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参加机关的开荒种菜，还在节约粮食上也为同志们做出了表率。

为了节省粮食，我们那时每天只吃两顿饭，吃的饭都是用蒲草编织的小蒲包包着米按定量一份一份地蒸熟的，蒲包上挂着小布条，写着每个人的名字。按饭量大小，分成三两、四两、五两不等。饭量大的同志，根本不够吃，潭秋同志经常把自己的一份饭分一部分给饭量大的同志吃。同志们都知道，潭秋同志工作很繁重，体格又魁梧，他那份饭，实际上连他自己也不够吃，所以，他省下来的米饭，谁也不忍心吃。这个时候，潭秋同志总是说：“我现在饭量减少了，确实吃不了这么多。你要不吃，剩下就浪费了，那怎么行呢？”硬是让同志们把饭吃下去。

那时候，我们红军工作人员根本没有津贴费，就连菜金每人每天也只是一角钱。零用钱是伙食尾子节约下来的一点，有时到月底能分几角钱。就是这几角钱，潭秋同志也拿出来待客了，而他自己为了给红军筹粮筹款，经常爬山涉水赶不上吃饭，饿着肚子，从来也没听他说过什么。

这次初春筹集粮食的突击运动，由于潭秋同志的周密规划，同志们的一道努力，以及苏区人民的大力支持，只用了短短的一个半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任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收集到谷子百分之六十以上，现款约百分之四十，解决了粮食问题的大部分困难，保证了红军及后方机关的给养。

第一次筹集粮食突击运动虽然结束了，但战争仍在继续，粮食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这时，正是春耕农忙季节，粮食部不仅担负着有继续筹集粮食的任务，而且为了秋季筹到更多的粮食，

还必须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春耕生产中去。

记得有个星期天，我们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到附近村庄帮助红军家属插秧，在插秧的时候，我看见潭秋同志也在对面田里。他只穿了一件单衣，袖子挽得高高的，裤脚卷到了大腿上，躬着腰，一个劲地插，把警卫员和另外一位同志也甩在了后面。他回头插时，警卫员取下毛巾递给了他，只见他擦了两把汗又开始了紧张而熟练的劳动。

春耕生产的高潮刚一过，猛烈的扩军运动又开始了，仅五、六两个月（红五月运动），就扩大红军近五万人。红军的粮食本来就不多，这一下就更加困难了。这时，中央和中央政府又一次通知，紧急动员，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和粮食部尽快筹粮借谷二十四万担，以保证红军继续作战。

那时，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各级苏维埃的粮仓早已空空的。一下子要筹集二十多万担粮食，困难是很大的。对于这些困难，潭秋同志早有思想准备，在抓春耕生产时，他就开始为继续筹粮调查第一手资料。他每到一地，就利用下田参加劳动的机会，用谈家常、聊天的方式，了解了农村粮食分布的情况，哪个县粮食多，哪个县粮食少；哪些家庭有余粮，哪样的家庭有困难，都做到心中有数。同时，他还要求粮食部的同志都这样做了。他把这些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并提出一些具体可行的办法，对各县筹粮数字也作了计划。他象二、三月筹粮那样，广泛地发动群众，很快掀起了第二次筹粮借谷的突击运动高潮。

在实际工作中，潭秋同志坚决执行了中央政府对筹粮借谷的几项原则，抵制了王明路线要全部没收富农粮食的错误作法。这一筹集粮食的突击运动，在七月就取得了伟大成绩，一些县还超

超额完成了任务。接着，在秋收时，潭秋同志又亲自领导了第三次筹集粮食的突击运动，很快就超额完成了中央和中央政府预定的六十万担的任务。

为了完成任务，潭秋同志宽宽的脸庞消瘦了许多，眼睛也凹了下去。不知道他走了多少路，跑了多少个村庄，有时鞋底都磨破了，然而穿破了的草鞋也舍不得丢。因为，红军经费困难，我们苏维埃政府好久没有发草鞋了。会打草鞋的和有时间的同志都自己打，不会打的和忙不过来的同志，一是学习打，一是靠别的同志送一双、两双地穿，潭秋同志哪有打草鞋的时间哪！所以他总是把草鞋穿得烂烂的。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总是把别人送给他的草鞋又送给新同志穿。粮食部新来的通讯员，工作忙，跑路多，又不会打草鞋，穿的草鞋也老是破破烂烂的。一天，我见他穿一双新草鞋，低着头，匆匆地走，我就问他：“小鬼，什么事呀？这么急。”他急忙说：“部长见我草鞋破了，硬把别人送给他的这双唯一的新草鞋送给我穿。”说着，还指指脚，“可他自己的鞋又快穿破了，他经常要出远门，没有鞋怎么行呢？！我得赶快给他找一双鞋去。”从他说话时的样子可以看出，他是既感动，又着急，深怕首长没有鞋穿要磨坏脚。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在那种艰苦时期，是多么高尚的革命情操啊！

潭秋同志任粮食部长仅仅是八个月时间，然而是在红军最艰难困苦的时刻，他为保障红军的粮食供给，日夜操劳、勤奋工作，三次完成了艰巨的筹粮借谷的突击任务，在军事战线上一再失利的情况下，仍能保障红军吃饱肚皮，坚持战斗达一年之久，起到了重大作用。这些功绩，中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怀的。他关心同志，严于律己的崇高的共产主义品德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红二十四军的片断回忆

陈 子 毅

## 打入旧军队

一九二五年，胡景翼任河南省督军兼省长。他的独立骑兵第一旅长郑庠到处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就在这时，我党号召打入旧军队中隐蔽活动，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九月，我响应党的号召，在汲县打入了郑庠部队，当了一名译电员。

十二月，郑庠的队伍由河南汲县开赴河北邢台、南宫，投靠山东军阀张宗昌和河北军阀褚玉璞，改编为直鲁联军，驻河北省河间府。一九二七年队伍扩充到十多个团，因与驻山东德州的弓富魁部发生冲突，收缴弓的武器，触怒了张宗昌、褚玉璞，张褚两面夹击郑庠部于邢台。在混战中郑庠内弟高桂滋率兵突围，我党同志随突围部队南渡黄河到河南淮阳。经过休整，到安徽太和，高桂滋又投到武汉革命政府。

一九二八年，高桂滋再投靠新军阀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七军军长，并派其心腹康心之（后高建白）驻南京，为蒋效劳。是年三月，高奉蒋命参加北伐战争。队伍由安徽阜阳

经亳县到河南归德、朱集，后到山东金乡时，军心动荡不安，不知为谁当兵打仗。我党这时乘机在金乡羊山集发动革命起义，不幸被高桂滋发觉，逮捕了我党领导人老张（代号）。张在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中慷慨就义。革命士兵深表同情，为之泪下。这次起义，虽告失败，但党的工作仍继续进行。

高桂滋的队伍到河北遵化县后，蒋介石把四十七军缩编为独立第十旅，高由军长降为旅长，并调到山东临沂、诸城驻防。高桂滋怀恨在心，因而倒蒋，投靠阎冯，阎冯任高为第十路军总指挥，并与驻青岛的刘珍年，驻徐州的马鸿逵呼应，计划三路进攻驻济南蒋军陈调元，蒋以范熙绩、陈耀汉等部围困高桂滋部于莒县、诸城两地达九个月之久。

一九三〇年八月，高桂滋突围到山西平定县驻防，归晋军孙楚指挥。这时，我党经过长期艰苦工作，在士兵群众中已有较大发展，有的连、营长都是共产党员，有的连队已控制到我党手里。这就为举行革命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发动起义，建立红军

一九三一年七月三日下午四时，部队党支部书记赵澍生通知晚八时召集党员会议，地点在平定南城墙外的小坟场，不得有误。会议开始，首先传达山西省委关于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报告，简略说明江西工农红军冲破了敌人第三次“围剿”与其他苏区红军的胜利。江西红军主力经一个多月的英勇战斗，击溃了国民党十一个师以上的兵力，消灭了五个师以上的部队，敌人左、中、右三路全线溃退，第三次“围剿”计划完全失败，迫使蒋介石不得

不从前线逃回南京，宣告军事行动已告一段落。此外，鄂豫皖苏区除巩固原有苏区外，占领了广济、圻水、英山等县，击败与消灭了敌人进攻的部队。湘鄂西苏区除巩固原有地区外，还占领了潜江、天门等县。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在工农红军步步胜利中，无异将有更广大的发展前途。山西军阀、土皇帝阎锡山盘踞山西多年，弄得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在军阀混战中吃了败仗，退回老巢，晋钞跌落，民怨沸腾，士气消沉，形势对革命极为有利。

这个传达对与会同志鼓舞很大。

次日（四日）晚上继续开会，传达山西省委关于在高桂滋部举行起义的行动计划和中央批准的指示，根据指示与计划，要在当晚十二时打响，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到会同志作了具体分工，组织领导这场起义的记得是赫光、肖谷、刘明德、艾捷三、王天宝等同志。为了防止在战斗中遭到敌人包围，已在东南城脚下挖通了突围地道。会议还提出，高桂滋的表弟、营长袁某是高的亲信，打响以后，他一定拼命反扑，要派得力人员及时消灭。完成任务后，到东关庙前集合，统一行动。我的任务是打响后率通信队及时破坏敌人电话联络。

我们的行动十一时半被敌发觉，就提前行动起来，到十二时战斗结束，总计拉出来一千一百多人。在预定地点——平定县东关庙前集合后，北上经马鞍桥绕过阳泉到盂县的清城休整。同时宣布中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任命赫光（即万锡福）同志为军长，肖谷（即谷雄一）同志为政治委员，刘明德同志为参谋长。部队暂编为两个团，王天宝同志为第一团团长，张××同志为第二团团长。

## 创立阜平县苏维埃政权

当月八日到十一日，红二十四军经过五台柏兰镇到孟县的上社镇。在上社镇解决了国民党的武装警察队，缴获了一批枪枝。于十三日到达了河北平山县蛟潭庄、柳木园、洪子店等地。十四日先头部队进入灵寿县境，经过漫山、南营、陈庄等地。沿途没有迁到抵抗，顺利地阜平县进发。

阜平县是太行山区。太行山山峦起伏，群岭环绕，山势陡峭挺拔，绵亘于河北、山西两省之间。山间有太行八径，为穿越太行山脉的八条通道，也是河北省平原进入山西高原的交通要道。当地官僚地主凶恶残暴，派款逼租，农民卖儿卖女，逃荒要饭，妻离子散，真是民有饥色，野有饿莩。但是，阜平人民革命意志坚强。一九一九年，他们会同师范讲习所五十名学生联合全县小学教员，曾打倒了豪绅李谭先。一九二六年各村农民响应湖南农民运动，成立了农民协会。这个地方的群众基础是很好的。

红军挺进的消息传到阜平县城，县官、士绅慌作一团，马上集合了保卫团和警察，督修了武器，准备出击。财主们都找了佃户往山里坚壁东西，全家老小都逃进城去。县官左谦和警官袁玉田更是害怕，迅速把家属和财物都坚壁起来。穷汉们既无东西可藏，更没有预先逃跑的必要，但由于有些人对红军不了解，一时也要躲一下，看看动静。十七日县保卫团在南边白石岭打了败仗，溃散回来，情况更紧张了。十八日下午知了在树上叫着，没有听到一声枪响，红军就渡过了沙河，进入阜平县城。群众见到这些脖子上围着红巾的军队不伤人骂人，不象土匪样子，也就都走了出来。有几位上了年岁的人自动组织了支应局，为红军做饭、找

房子，殷勤招待。红军也当即集合群众开会，向大家着重讲明公买公卖，不打骂群众，让大家安居生产。并张贴布告安民。开始人们有些半信半疑，后来见到红军确实说到做到，军纪严明，大家就完全消除了疑惧。

红军到后，很快开了粮仓，把粮食分给了劳苦人民。当时的反动报纸《益世报》登载消息说：这一天分得粮食者约二千人。到第三天县仓库所有的谷米三百余担全部分完了。穷人欢天喜地，大声欢呼：“我们的救星到了！”并报告某人是土豪劣绅，某家是地主，某家私藏枪支若干（见一九三一年八月五日《益世报》）。当时城里的一家大财主袁保初仓皇逃去的时候，把来不及带走的一批银元倒在厕所粪坑里，也被群众挖了出来。

红军和老百姓相处如亲兄弟一样，一个姓冯的家里住着十几个红军战士，由于他们和房东和睦相处，人们把他们看成自家人，什么话都说。有位姓马的，大家叫他马班长，向冯家宣传说：“我们叫红军，是共产党的军队，是为穷人谋利益的。共产党是穷人的党。天下穷人占绝大多数，如果齐心团结起来，就能把土豪劣绅、恶霸地主打倒。红军来到阜平就不走了，要打土豪分田地，实现‘耕者有其田’，让劳苦大众自己起来当家作主，再不受压迫和剥削。”冯家人听了高兴地说：“那才好哩。”

经过红军宣传，逃出去的老百姓也都回来了，买卖铺子都开了门，集市照常。张来子是个卖西瓜的，开始不敢卖，怕是和从前过奉军一样，给东北奉票，后来听红军使用的是白洋，才敢进城卖。红军买卖公平，说话和气，对人态度好，赶集的人一天天多起来了。

红军来到的第三天就把监狱打开，释放了所有的犯人。罗小

虎的父亲因欠下地主的租子还不起，就被押在监狱里。小虎看到父亲出狱，对父亲说：“爹，红军不来你怎能出来呢？”老罗兴奋地说：“对，咱们去看看红军去。”只见一个军官，大个儿，白净脸儿，在人群里讲话，声音洪亮清晰，陕北口音。他说：“旧衙门监狱里关押的尽是咱穷人，穷人就是我们的亲兄弟。”老罗听的句句入耳，一打听才知道讲话的人是红军的赫光军长。赫光军长接着说：“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党，是保护地主资本家的财产的。”大家听了高呼“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地主恶霸！”后来肖谷政委也对大家讲了话，他说：“我们穷苦大众应当团结起来，大家一条心，消灭地主阶级，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黑暗制度，大家共同努力，人人平等、自由，有吃有穿。为了这个目的，必须起来干革命。今天我们就是来干革命的。革命本是大家的事，几百人、几千人是不行的。孙中山武昌起义，全国响应，全国人民都起来了，清朝政府就被打倒了。”肖政委还号召：“愿意革命的请到红军队伍中来。”小伙子们一齐拥上来争着报名。罗小虎也报名参了军。

阜平县的几个地下党员这时已参加了红军工作，其中有刘应融、李英兰、王德修、张元仁、赵绍培等。一些进步群众也积极参加了工作，经过几天的宣传酝酿，二十六日，由中共阜平县委和二十四军政治部联合召开了群众代表大会。

会议地点在县政府的大院里，与会者除二十四军的战士外，各乡镇推举的代表和城里的群众纷纷拥进了这个向来不敢轻易进入的县衙门里，这里已没有那般吆吆喝喝的衙役了。红军战士们，一面维持秩序，一面热情招待群众。小孩子们也聚集了不少。这一天开会的群众，比起前两天赶大集的人还多，热闹空前。当红

二十四军政治委员肖谷同志登台讲话时，台下鸦雀无声，虽然有些道理还未完全听懂，但不少人只是一见这位年轻政委的风度，就啧啧称赞起来了。

这次大会上，阜平县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会上选举刘应融同志任苏维埃政府主席，牛青山同志任副主席，委员有张元仁、刘维廉、李英兰、王德修等同志，有一位非党群众石德义同志也被选为委员，委员中还有一位军队的代表。这几位委员的出身成分，有农民，有城市贫民，也有小学教员。他们当场宣誓就职，开始办公，包括立刻进行土地调查登记，准备发动农民平分土地。

接着，第一次委员会上讨论决议：开仓济贫。当时正值青黄不接之际，老百姓短吃少穿的时候，开仓放粮很得群众的拥护，大伙成群结队地往城里跑。

城里共两个仓库，南仓十几间，北仓九间，三、四天功夫，仓谷就放完了，但群众还不满足，政府根据要求打开了地主财东的粮仓。大财主袁保初的粮食比南仓还多，而且硬粮食（不带皮的）不少。赵义生、郑老清几家地主的仓库也打开了。在放粮的同时，地主家里的衣服及其它珍贵物品也分给了穷人。

通过放囚分粮，群众发动起来了，参军人数已达到五、六百人，比原来人数扩大了许多，城里更热闹了。当时人们唱了个顺口溜：“当兵当红军，红军最革命，到处打土豪，事事为穷人。穷人有武装，不怕国民党，分了地主田，谁种谁吃粮。实行苏维埃，反对白眼狼（指富农），打倒蒋介石，拥护共产党”。红军工作得到阜平广大人民的信任，群众基础也就一天天巩固起来。宣传队伍深入到附近农村（他们到一、二十里远的沙沟柳树底，还

到过石苍山)。为了执行苏维埃政府的决议，实行耕者有其田，他们留在苍山村登记土地产量、人口牲畜等。

红二十四军的活动，曾向中共山西省委写过报告，为防止敌人的检查，这个报告是用普通信寄的。以一个暑假回家的学生向老师报告他的见闻的口气写的。信中首先描写了阜平县的风景（说明这里的形势），又说在街上看到群众集会分粮，并说县政府门口换了一块苏维埃政府的牌子等等。很明显，这是正式报告他们的行踪活动和在这里安住脚建立根据地的决心，并向党请示。山西省委完全同意了他们的计划。

### 中 敌 奸 计

阜平县第一个苏维埃政府的出现，给敌人以很大的震动，当时的《益世报》，还曾专为此事发表一篇社论，忧心忡忡地说：

“太行山脉。蜿蜒千里。北可经蔚县入宣大。横截平绥一线。南可出井陘。掠石邑。折断平绥要衡。下临则易定可取。远征则平蓟可窥。沿山城邑。均系殷富之区。土匪兼可利用。假使有共军千人。则不久即能满万。俟其羽翼养成。则包围无所施。窜扰不及防。较之江西。有过之。无不及也。”最后呼吁反动当局：“迅派大军相机剿灭”。这个以宗教牌子出面的报纸所呼叫的，恰好代表了当时反动派的惊恐心理。

这时的华北局面是：蒋介石的副总司令张学良坐镇北平，那里是东北军的天下。山东是韩复榘的地盘。在豫北、冀南出现了石友三的一股队伍，他以两广（当时两广正在反蒋）委任的名义，率领四路军队向北平进攻。一时平汉线上大军云集，国民党中央军大批集结到河南，堵住石友三的后路。石友三腹背受敌，出兵



没有几天就弄得乱七八糟，一败而不可收拾，狼狈逃到山东，在韩复榘的庇护下暂时躲藏起来。

石友三部下原有四路指挥，米文和、孙光兰被东北军生俘，有的随石友三逃往山东，剩下一个沈克带了一个师被挤到平汉线以西曲阳一带。这个沈克是个刁猾奸诈的土匪。他看到大势已去，为保存实力，便投向东北军。张学良答应给以新编第一师的称号，要他归庞炳勋指挥。沈克为向张学良表功，心生一计。

一天，他派了以便衣支队赵海清旅长为首的一支部队，由曲阳开到阜平的王块镇。沿途声称是向红军投诚的。到了王块镇后，还派了代表正式向红二十四军接洽，申述他们走投无路，向往红军，要求收容改编。红军脖子上围红布，他们自称绿军，脖子上围绿布，其用意一方面区别于红军，另一方面表明和红军一样也是脱离了国民党军队的。

红二十四军的领导研究了这件事，由于受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对国内革命形势，存在着错误的认识，对白军士兵中对革命的要求作了过高的估计。只看到沈克部队是一个杂牌军队，他的主子石友三已经失败，他前有东北军，后有中央军，在石家庄一带，还有以商震为首的晋军，他确实走投无路。又主观地估计广大士兵的革命要求，认为沈克部队投奔红军，自找出路，是形势逼迫，出于真心。据说，当时还有过争论，但上述分析占了多数，相信敌人不敢轻易捣鬼。并决定接受他们的要求，进行收编，作了受降准备。

军部当即下了命令，令沈克前来的部队，分别拉到阜平城附近的村庄听候改编。敌一部分队伍，沿五丈湾、方太口过沙河开到高阜口、高街等村，分成两股，一股住王块镇，一股住城西的

法华村。

八月十日，天气晴朗。军部组织了以军长、政治委员为领导的受降慰问团，率副军长豆宗融、政治部主任刘子祥和苏维埃政府委员刘维廉、李英兰等干部、武装人员数十人，分两路前往法华村与王块镇慰问沈部，并洽商受降事宜。

据闻，政治委员肖谷以及慰问人员二十四人到达王块镇之后，敌人列队伪装欢迎，当我全体人员鱼贯进入敌队伍行列中时，即全部被扣留。

据说，军长赫光带着其他军政人员，骑着战马携带慰问品前往城西八里地之法华村慰问并受降时，即和旅长赵海清商量如何开会。会场设在法华村后街一棵槐树下。八点钟左右，赵旅长陪同赫光军长到达会场。赫光军长扫视了一下四周，只见绿军全副武装，村口、房上连后坡上也有持枪的士兵，这时才觉察到是进了虎穴。但是他沉着地走到了讲台，向伪装受降的绿军官兵讲话。他说：“绿军到此起义，咱们是一家人了，今后共同对付敌人，打土豪、分田地，解放受压迫的劳苦大众”。他说到谁家也有老子，谁家也是老百姓，劳苦人受地主剥削，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我们要起来革命，打倒地主，打倒军阀，建设新社会……。绿军士兵听了很受感动，都直盯着赫军长。这时，丧尽天良的赵旅长按预定的信号直捋胡子，暗示他的士兵动手，可是士兵们却一个个都低下了头，谁也不动。急得赵匪不断地捋胡子，用狡猾的眼睛扫视他的士兵，心神很不安。机智的赫军长早就看穿了敌人的诡计，在讲话中提出了警告。赵匪着了急，命令他准备的特务连动手，一声吼叫，会场上枪声四起，喊杀声响成一片。赵匪抱住了赫军长，赫军长拔手枪打伤了赵匪。英勇的红军战士顽强地和

敌人搏斗了近一个小时之久。终因寡不敌众，赫军长和随行人员均壮烈牺牲。

当日下午六时，沈克部队逼近城郊，诡称我军长、政委均留在王块镇商讨军情未回。我驻阜平县城的部队有所警惕，一方面让他们在城外住下，一方面作了戒备。十一日拂晓，一千多绿军包围了县城，开始攻击。敌人企图全歼我军，我军沉着应战，狠狠予敌人以打击，并突破重围，主动撤出了阜平县城。据闻，我军走后，敌人蜂拥进了县城，砸开群众的门，逢人打人，大肆抢掠，无恶不作。还逐户搜查，抓了二百多名老百姓，在县苏维埃政府大院里逐一审讯。还让老百姓孙国义等人抬着两桶半酒，跟着十几个匪兵到法华村。

法华村经昨天的战斗，老百姓都逃光了，全村阴森森的，令人毛骨悚然。他们走到大槐树下，地上还横着几具尸体，有的瞪着眼睛，有的握着拳头，其中也有赫光军长。几个敌人砸开了老百姓家的门拿来一把菜刀，逼着孙国义去砍赫光军长的头。热爱红军的劳苦人，怎会去干这等事，绿军又打又骂，端起枪来对准孙国义威逼他，老孙死也不干。后来两个匪兵找到口铡刀，铡下了赫光军长和另一个同志的头，装入酒桶抬着走了。匪徒走后的当天下午，法华村的人民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将八位烈士的尸体埋葬在村东北角的山脚下。

肖谷同志等二十五名英勇战士，则被沈克这个匪徒作为向他主子献的“礼”，解到了北平，全都光荣就义了。我从邢肇棠同志处得悉，沈克把他们解到北平后，高桂滋还曾当场对证。以后又回平定捕杀了一批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

## 转 移

红二十四军由于突然事变失去了两位首脑指挥，主动撤出阜平，顺着史家寨、段庄向灵丘转移了。县苏维埃政府人员和城关一批青壮年也跟着红军一齐撤走。在参谋长刘明德的率领下，他们经繁峙、代县、朔县、平鲁、右玉，出杀虎口，到绥远省的清水河县。经过休整，在晋绥敌军的围攻中由河曲强渡了黄河，经陕西省府谷、神木蛟窟窿窝到榆林。这一部分红军后来就成为刘志丹、谢子长同志领导的陕北红军的一部分坚强骨干了。

党中央对红二十四军一直是非常重视和关怀的，曾指示河北、山西、陕西的党组织必须派遣十个到二十个干部到晋绥边新成立的二十四军中去，加强政治上军事上的领导，使之成为推动华北红军苏维埃运动的强大力量。中共山西省委按照中央指示，多次派联络员到晋绥地区联系，均未联系上，最后联络员到榆林才联系上。红二十四军即派陈子毅随联络员到太原向山西省委汇报了情况。由于当时在太原有人认识陈子毅，情况很紧，省委就决定让陈子毅同志回河南原籍找原组织关系去了。

阜平县苏维埃政府，成立虽然只有近一个月时间。但是，烈士们的鲜血没有白流，它在劳动人民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为后来阜平地区党组织的活动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九八〇年七月六日）

# 确山暴动

林 壮 志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了，它震撼了世界，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壮丽的一页。其后不久，河南省确山县农民在杨靖宇（即马尚德）等同志领导下，也于清明节（四月四日）举行了武装起义，攻占县城一个多月，并仿照苏维埃形式建立了县政权。这次起义，也是在周恩来同志预先指示下举行的。两处起义日期相近，任务性质相同，都是为了响应北伐而举行的暴动，也都是周恩来同志的历史功绩。但是，确山暴动不详见于当时报刊<sup>①</sup>，并不广泛为人所知。直到解放后，因著名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生前谈过他曾参加领导确山暴动，才见于有关杨靖宇事迹的书刊和河南地方报刊。但都简略不详，更不曾提到周恩来同志事前指示的作用。当时，我亲自接受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并参与这次暴动的组织领导工作。半个世纪后回忆往事，仍记得当时一些情况。

---

<sup>①</sup> 一九二七年四月三十日、五月五日，汉口《民国日报》刊登过总政治部宣传列车、中央农民部罗绍德给后方的信，其中简单提到确山农民曾杀死魏益三部二百多人，在马庄为攻打确山城内牺牲的工友一人、农友一人开追悼大会，确山县民代表大会开幕和选举的情况。没有专题报道。

## 河南的农民运动——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军和红枪会

确山暴动胜利，是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河南农民运动的成果。谈论确山暴动，首先须从河南的农民运动谈起。

河南的农民运动，始于一九二五年。当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杞、睢、汲、汤阴、安阳、修武、许昌、长葛、信阳各地成立了一批农民协会，初步展开宣传活动，尚未进入斗争行动。没有打下坚实基础。一九二六年春，河南重归直系军阀统治，城市中工人运动转入地下。豫陕区委书记王若飞在调往中央以前，定下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农村的方针。三、四月间，成立了河南省农民协会筹备处，准备大规模开展农民运动的活动。豫陕区委委员肖人鹤（肖寅谷）亲到荥阳试点，公开成立荥阳农民协会。有邻近各县群众两万多人参加大会，搞得轰轰烈烈。它引起了当地封建反动势力的仇视，勾结土匪杀害了荥阳县农民协会委员长张某全家（一子在开封上学，独免其难）。

豫陕区委根据河南农村封建意识浓厚，反动势力猖獗的客观情况，决定改变策略，采取利用普遍存在于当时河南农村的红枪会作掩护，以开展农民运动。红枪会是一种迷信落后组织，名目繁多，原是农民群众为了反抗兵匪衙役的勒索骚扰而建立起来的武装自卫组织。群众叫做办红学。多数掌握在地主富农及迷信道首手中。他们利用群众要自卫的愿望办起红枪会，转而成为维护并扩充他们本身利益的工具，性质反动。但有部分红枪会，是由自耕农或佃农领导的，虽然也带迷信色彩，终究是群众自卫组织，性质与前者不同，是一种可以争取的力量。因此，各地党团员打入红枪会内部进行活动。对于反动头人掌握的红枪会，进行

分化，争取贫苦群众；对于自耕农、佃农领导的红枪会，争取他们接受革命思想和共产党的领导；有条件的地方，就以红枪会名义作掩护，直接组织农民协会。从而打开了农民运动的新局面。同年十月，河南省立各中学停课，学生被迫回乡，河南省委（豫陕区委于八月撤销，改为河南省委及陕甘区委）于是乘机命令回乡学生党团员全力去搞农民运动。全省农民运动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十一月，省委遵照周恩来同志“要建立农民自卫军”的指示，把各地农民协会和接受我们领导的红枪会，用农民自卫军名称统一起来，成立了河南省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由肖人鹄任总指挥，刻制关防，委任支队、分队司令。自卫军的建制是秘密的，只有骨干人员知道。支队、分队以下并无正式编制，也没正规训练。除少数步枪、驳壳枪、鸟枪、土炮外，主要武器是红缨枪。名为“军”，实际只能说是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农民协会；一种松散的农民武装组织；也可说是带有革命倾向的红枪会。到年终，全省发展到十万人左右。虽然顶不上正式军队的作用，但因它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在北伐军进入河南时，仍能作出一定贡献。

河南的农民运动，与湘鄂赣三省的农民运动是在同一时期蓬勃发展起来的。但是，由于客观环境和领导水平的不同，两者的组织形式、斗争方式方法和产生的效果，也不是都相同的。湘鄂赣三省的农民运动，是在北伐军占领下蓬勃发展起来的，它可以公开组织，公开发动贫苦农民与地主豪绅进行旗帜鲜明的激烈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湖南省农民运动，更是气势磅礴，对中国革命产生过巨大影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河南的农民运动，是在北洋军阀统治下进行的，它的组织和活动是隐

蔽的，主要斗争对象是北洋军阀和土豪劣绅，对中小地主还采取联合策略。虽然也提出“耕者有其田”、“减租减息”等口号，但尚未见于行动。贫苦农民与地主阶级的斗争不鲜明、不激烈，农民运动还处在初步的低级的阶段。北伐军到河南后，农民运动刚要进入新阶段，就因政局突变，遭受摧残。它在响应北伐斗争中虽然有过一些贡献，它在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的紧要关头，不起大作用。所以，河南的农民运动是不能和湘鄂赣诸省的农民运动相提并论的。

### 会见周恩来同志并接受指示

一九二六年冬，河南省委向中央的汇报请示，都是由周恩来同志接见处理的。

豫陕区委与上级的联络，向来由区委书记或委员亲自前往。有时也由中央来人联络。一九二六年秋，北伐军逼近湖北，北洋军阀加紧在交通要道搜捕革命党人。湖北区委负责人林佛庄被孙传芳杀害于南京下关，河南省委委员兼共青团书记张霁帆被张宗昌扣押于徐州，病故狱中，开封至上海路上气氛紧张。我当时在河南省委担任技术书记，列席省委会议。会中讨论省委与中央联络人选时，我自荐担任这项工作。因此，有机会五次见到周恩来同志，三次详聆他的教诲。经过情况如下。

我第一次去上海，是一九二六年十月（记不清是阳历还是阴历）。中央通讯处是商务印书馆编译部沈雁冰、杨贤江两同志转。我到编译部门口问“沈雁冰、杨贤江先生在吗？”室内一人问明我是开封来的，就出来到另一屋内找来一位同志，他看了介绍信，递给一张字条，叫我按上面的地址去找，再无别话。我始终



不知道这两位同志的姓名。我找到了狄思威路斜转弯处路东一排二层楼房，有十多间，自成小弄堂。中央办公处靠弄堂口。一位同志接介绍信上楼，下来说：“周恩来同志就下来。”并说恩来同志刚到中央，负责组织部工作。至此，我才知道即将接见我的是久负盛名的周恩来。我虽不曾见过他，但早就听说他在广东的革命事迹，并听在法国当过华工回来的开封市委书记范易谈过恩来同志在法的一些情况，所以很高兴能见到他。

不一会儿，周恩来同志下楼来了。他中上身材，穿藏青色旧长衫，西装裤，黑皮鞋。器宇轩昂，体态自然。使人一见就被他坚毅、智慧、亲切的神态所吸引。而自己并不感到拘束。我跟他进入东房，他拉开桌旁椅子不坐，坐在长凳上和我隔桌谈话。我面交河南省委的书面报告他没有马上看，而是亲切地问我的年龄、籍贯、学历、家庭、过去职业、入党年月和党内经历，而后询问河南省委工作近况。我们谈话中间，进来一位青年，说：“恩来同志，我来啦，派什么工作？”周问他什么时候到的，青年回答是前天到的。周叫他等一下。我们谈话结束时，恩来同志问我以前有没有到过上海？我答：“曾路过，没停留”。他于是喊进那位青年，说：“陈赓同志，你先休息两天。这位河南同志初次到上海，你带他玩两天。”恩来同志这样关心同志的生活小事，使我感到温暖。

陈赓只带我逛了先施、永安两公司和大世界，其余时间都在几位工人同志家中度过。他刚从广州来，对我谈了黄埔军校和广东革命活动的一些情况，并谈到他参加革命以前的经历。他家庭贫寒，只读四年书，就在村里放牛。平时爱活动，动作敏捷，善爬树、游泳。十四岁时，去给赵恒惕部下一个团长当小勤务兵。

因在一次战斗中背受伤的团长游泳过河，救了团长，团长转败为胜，升任旅长，因而保送他到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他在那里接受革命真理，加入了共产党。由党保送上黄埔军校第一期。年纪小、个子矮、是排尾。

我第三次去上海在一九二七年元旦前后。中央正在从上海迁往武汉途中。周恩来同志留在上海，担任江浙区军委书记，仍代表中央处理各省区同志前来请示的工作（因各省区党委尚未接到中央迁移的通知）。有一天，恩来同志正在楼下东房接见我，因东京支部来人，中断和我的谈话，接见他们。没有叫我离开，我默坐旁边静听。东京支部来的两位同志是庆应大学经济系和法律系学生。一位是直隶省保定附近人，年约二十六、七，貌苍老，看去象是四十来岁的人。一位是山西省人，初进庆应大学，年约二十一、二岁，貌白皙清秀。他俩汇报：前年有从北京到东京上学的党员，在东京中国留学生中发展党员，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东京支部，现有党员十七人。和北京同志有私人联系，没有正式组织关系。他俩这次趁寒假机会，取道上海，专为要求建立正式组织关系来找中央的。当他俩汇报到东京支部提出“把东京成为中国二次革命的策源地”的口号时，恩来同志插话说：“这个口号提的不恰当，容易使人产生错觉。孙中山当年领导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策源地是在东京。现在，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策源地在莫斯科，不会再是东京了。”他还对其他问题作了指示，并约定以后联络方法。

东京支部同志走后，恩来同志和我继续谈话。他对河南省委以前报告的各地党团员数、农民自卫军人数和枪枝数，以及各地相距里程等，都记得清清楚楚，一一询问近来进展情况。我回答

不出他的全部提问。他对工作的细致认真和惊人的记忆力，实在令人钦佩。

我将回河南时，恩来同志再次接见，交给我一封给省委的回信，并作了口头指示。大意是：

北伐军不久就要进军河南。河南目前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积极做好响应北伐军和北伐军到达后扩大革命活动的准备。要把民众发动起来帮助北伐胜利；在斗争中壮大我们的力量，扩大我们的影响，为下阶段革命打下基础。特别要在北伐军进军沿途加强党团组织和武装力量。北伐军进入河南，将是分三路进军。中路进武胜关后直攻郑州；东路进武胜关后转向东北，攻取开封、商邱；西路经襄阳、樊城、南阳到漯河，与中路军会合。从目前党团员分布情况来看，南阳、赊旗店至漯河一段，我们的力量太薄弱。方城、舞阳都只有一、二个党团员，将来北伐军进入河南时，这一路传递情报有困难。必须立即在这两县加快发展党团员，至少要能建立起情报站，以便战时联络。京汉路南段信阳至郑州一带，党团员比较多，应当加强领导力量，扩大党团组织和武装力量。有条件的地方，就举行武装暴动响应北伐军。他并着重指出，暴动要注意掌握时机，应在北伐军将要到达时举行。我们的武器不如敌人，不可过早盲目发动，免得孤军作战，招致失败损失，挫伤了士气。又说，武装暴动是革命斗争的最高艺术，领导者必须认真研究掌握，才能取得胜利。他最后说明，这些意见都已写在回信里，对你再说一遍，希望你回去转告省委同志特别重视。

我当时提问：北伐军东路为什么不从鄂东经光山、潢川一带直攻开封、商邱，而取道武胜关？西路为什么不从南阳直取洛

阳，而转向漯河？恩来同志回答说：鄂东到光山一带有大别山阻隔，不便军队运动；而且那里驻的是地方杂牌军队，对战局作用不大。至于陇海路西段，将由冯玉祥西北军负责，与北伐军会师郑州。

后来北伐军进军河南的作战计划，和恩来同志所说的完全相同。但是，北伐军的实际行动并未按原计划进行。西路军没有进入河南，中路军到漯河后迟迟不前，完全靠东路军内共产党人率领的部队英勇善战、不怕牺牲，在上蔡、临颖两地击败了奉军，才取得和西北军会师郑州的胜利。蒋先云等许多烈士献出了生命，但被国民党反动派攫取了胜利果实。

河南省委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立即对全省工作做了新的部署。派省委农运委员肖人鹤负责领导豫东一带战时工作；派省委工运委员王克新（王开馨）兼郑州市委书记，领导京汉路南段战时工作；另派赵宗润为许昌县委书记，林壮志为驻马店特别支部书记，加强当地党的领导力量，积极从事响应北伐军的准备，而终于取得了确山暴动的胜利。

### 驻马店特支的成立与确山农民的武装斗争

一九二六年十月，河南省委把原归信阳地委领导的驻马店镇（确山县辖）及汝南、遂平两县的七个党小组划出，成立驻马店特别支部，由省委直接领导。上海大学学生张家铎担任书记，开封工人张绍曾（张绍堂）和一位许昌姓王的学生同志任委员。张家铎并兼新由回乡学生党员组成的确山党小组组长，领导回乡党团员在确山组织农民运动。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取得显著成绩。首先，由张耀昶、马尚德争取了东北乡红枪会头人、自耕农张广

汉接受革命思想和我们的领导，作为我们的基本武装力量。另有张智才接管了他叔父的红枪会，成为我们在南乡的基本武装力量。在这种实力基础上联络各乡红枪会。一些小绅士出于政治投机，也愿跟我们走。其中以张立三、欧阳炳炎最积极。到年终，我们基本掌握了全县农民武装，控制了大部分农村。使得驻军衙役不敢轻易下乡，土匪不敢入境。

一九二七年一月，驻马店特支改组，由林壮志担任书记兼士兵运动工作，张绍曾任组织兼工人运动委员，张家铎改任宣传兼农民运动委员，仍具体负责确山的农民运动。特支利用阴历正月十四日东北乡玉皇庙庙会时机，在玉皇庙成立了确山县农民协会。进一步密切了各乡武装农民的关系，促进了对驻军和衙役的反抗。驻军和县署是靠就地摊派生活的，他们给养来源断绝，不甘坐困孤城，不时出动一连以上兵力下乡摊派勒索。武装农民奋起反抗，发生了多次冲突。南乡群众不愿再受勒索骚扰，在一次小冲突以后集合全部武装向县城出发，要攻打县城。张智才临时派人到驻马店，要求特支发动各乡武装农民协同攻城。

特支原打算在北伐军将要到达时举行暴动，对南乡群众的自发攻城行动感到突然。当时，驻马店火车不通车，邮政中断，特支与上级失去联络，听不到北伐军行动的消息。考虑到县城驻有魏益三军的一个旅部和团部留守处并一营步兵，士气虽低落，估计他们尚可守住县城。而我们火力不足，难以强攻取胜。如果旷日持久，信阳魏军前来援助守军，农民军背腹受敌，可能遭受失败。于是立即由张家铎前往阻止了这次攻城行动。

## 确山暴动的主要情节

为了打听北伐军行动消息，特支两次派人去汉口与党中央联系。第二次去人见到了中央总会计任作民同志，报告知北伐军即将进入河南。于是立即赶回。因张家铎等已在确山和红枪会头人约定于阴历三月初三日举行武装示威（红枪会叫做“亮牌”），就按他们原定日期由张家铎、马尚德、张耀昶三人负责布置指挥。

三月初三日（阳历四月四日），各乡武装农民两万多人集合在东关大操场，举行示威。由张耀昶担任大会总指挥，提出：惩办四大劣绅（魏程典、楚本固、何鸣一、田斐卿），取消苛捐杂税，反对拉夫拉车等几项条件。会上群众情绪激昂，呼喊声震撼山城，县长王少渠迫于声势，当场表示接受，回城后拒不执行。农民军随即占领了火车站，割断城内对外电讯交通，进而包围了确山城。

第二、三天，邻近各县红枪会闻讯，纷纷前来支援。围城人数增至三、四万人（有些农民来来去去，去了又来。始终坚持者约二万人），共有长短枪二百多支，土炮十余门。火力加强，声势更盛。敌人惊恐万分，派人求和，以“军队衙役不再下乡，由各乡定期送给养”为条件。农民军要他们交枪并交出县政权。敌人不愿。农民军在南山用威力较大的土炮九节龙轰击城内东南角，击中了敌军旅部，又在西城门积叠薪柴火烧城门，引起敌人一片慌乱，乘夜突围，分逃信阳、驻马店等地。农民军乘势拦击，毙敌二百多人，随即占领了县城，并活捉了县长王少渠，勒令退出赃款两千元，交公赎罪（后来没有交足）。

由于攻城红枪会来源复杂，一些没有受过革命教育的红枪

会，把敌军落伍的伤病号也杀了。进城后并有顺手把群众晒的衣服塞在身上的。幸而发觉早，立即制止，并由张家铎等和红枪会头人在城门口检查出城红枪会成员，把查出的东西归还原主，秩序遂安定下来，深得群众的赞许和拥护。

农民军进城后，立即展开宣传活动，并释放了因欠捐税被押的贫苦群众。同时，从武装农民中挑选二百人编为农民自卫军两个大队，以徐耀材、欧阳炳炎为大队长，由张耀昶负责领导，留城维持秩序（张无公开职称。五月三日起至交出政权时止，由李鸣岐担任农民自卫军总队长）。其余红枪会各回本乡。另有南乡土豪王杰英部及汝南十八里庙富农欧阳英部共一百七、八十人，是自动前来支援攻城的。他们自恃枪支齐全，所带九节龙威力大，竟互相勾结，赖在城内不走，擅自向群众摊派，扰乱革命秩序。此时，我们接到情报，王杰英最近接受盘踞正阳一带的土匪袁英的团长委任，而袁英已被蒋介石委为师长。我们于是率农民自卫军夜袭王杰英部，他们仓惶越城逃跑。欧阳英见势不妙，随之率部退走，这才肃清了城内反动武装。

四月十九日。袁达时率领的总政治部宣传列车到达确山。同时到达的有：国民政府北方宣抚使王法勤先生，慰问河南军民代表团团长于树德，军委前方特别工作组组长胡伦等同志。于、胡两同志立即指导协助驻马店特支进行工作。在此之前，当地同志全心搞武装暴动，对于暴动胜利之后的工作，未多考虑。至此，才由张家铎、林壮志和贺俊夫（记不起是哪个单位派来协助工作的）三人在确山车站研究决定：仿照苏维埃形式由工农商学兵代表十一人组成确山县政委员会，行使县政府职权。而后展开减租减息等活动。后来，于树德认为县政委员会的色彩太左，改称临

时治安委员会，并减少委员名额为七人，更动了人选。把刚从武汉来的国民党河南省党部委员郑震宇推选为主任委员，作为国共合作的象征。另选马尚德、张耀昶、张家铎、李润溥、张立三等为委员。治安委员会下设财政委员会、教育委员会、警察所三个机构。以巩世豪为财委主任（后为张寿峰），耿彬然为教委主任，李述会为警察所长。同时，成立了国民党确山县党部。确山原无国民党的组织和活动，是我们代为建立、开展起来的。四月二十四日，召开县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县政府（即上述治安委员会）。于树德以国民政府代表身份在会上讲话并赠送锦旗。接着，确山县城和驻马店镇纷纷成立了各业工会、商民协会、妇女协会等团体，群众沉醉在一片革命胜利的欢乐中。许多人参加了宣传，响导，谍报，运输等工作，支援北伐军。

北伐军中路指挥何键到达驻马店后，委派县长前来接确山县政。农民军以县城是自己攻打下来的，拒绝不理。何键电告武汉国民政府与我党中央交涉。于是，张国焘以党中央代表身份到河南。他在确山车站声色俱厉地命令临时负责确山工作的贺俊夫：“立即撤销治安委员会，交出县政权，农民自卫军撤出县城。”轰轰烈烈的确山暴动和建立起来的县级人民政权就此结束了<sup>①</sup>。

交出县政权以后，斗争并没有停止。熊某接收县政府，自感势孤，挽留农民自卫军总队在城帮他维持治安。改称治安大队，并改由欧阳炳炎负责。县属其它机关及国民党县党部仍由原来人

<sup>①</sup> 确山党组织与何键发生矛盾后，驻马店、许昌、郑州党组织与京汉铁路工会委员长刘文松之间也有了矛盾。中央考虑到河南地方党组织与西北军可能也会发生矛盾，于是专派张国焘到河南负责处理这类问题。张后来在郑州陇海花园四号房，竟毫无原则地迁就刘文松的无理取闹，强令河南省委把王克新、林壮志、张绍曾调离京汉线。



员主持，革命活动照常进行。但是，共产党人独立领导的县人民政府已转变为国民政府领导下的机构，政权性质不同了。不久，冯玉祥、汪精卫相继反共，我党同志率领农民自卫军转到农村，领导群众进行打土豪劣绅、减租减息、抗捐抗税等斗争。“八七”会议后，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先后举行了确山刘店秋收暴动和信阳四望山战斗。失败后，部分同志转至鄂豫皖苏区继续斗争。

### 确山暴动的历史意义

确山暴动前后，河南名义上归吴佩孚、靳云鹗统治，实际上是由十几个小军阀割据着。盘踞郑州至信阳一带的四个小军阀，为怕北伐军进攻，各自扣留火车车辆。确山交通隔绝，有如孤岛，因此，确山暴动消息无从外传。北伐军到后，才为部分将领和政治工作人员所知。军人关心前方战事，对于已经取得胜利的暴动不予重视。政治工作人员，因后方已有两湖农民运动，复因魏益山已投诚国民政府，对这次暴动和建立人民政权的情况，有意不作宣传。接着国内发生了许多震撼中外的重大事件，确山暴动便宛如一朵小浪花瞬息淹没在接踵而来的惊涛骇浪之中。

尽管如此，确山暴动仍然是有它的历史意义的。

（一）胜利完成了响应北伐的任务。确山农民军攻占县城和信阳农民军久围信阳城，严重打击了盘踞豫南的小军阀，促成他们投诚国民政府，使北伐军得以顺利推进到上蔡、临颖前线。它对北伐军在河南的胜利，是有贡献的。虽因暴动发生在北伐战争末期，北伐军进军河南已失去积极意义，降低了这次暴动的作用，但是，它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一样，是北伐时期仅有的两处工农起义。确山暴动影响虽不大，就执行上级交给的任务来

说，是胜利完成了的。

(二) 为豫南播下了革命种子。这次暴动，在河南开辟了武装革命斗争的道路，给豫南留下革命武装力量的种子。暴动胜利，鼓舞了当地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勇气和信心。因此，才会有以后的确山刘店秋收起义和四望山战斗，才会使确山竹沟成为抗日战争初期的中原小延安，并长期成为豫南革命斗争的一个据点。

也正是由于经过这次暴动的锻炼，才使得一些战士在党的教育下不断成长，培养出杨靖宇那样的英雄人物，为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三) 首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县人民政权。暴动胜利后建立的县政权，是由共产党人独立领导的。它和同时期共产党人在国民政府领导下主持的地方政府的性质，是不相同的。虽然后来把苏维埃式政权改为过渡政权机构，最后终于被取消，只如昙花一现，不曾做出显著业绩，但它毕竟是我国建立工农政权的一次尝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早建立的县政权。当时，一个叫罗绍徽的在给中央农民部的信中，也曾对确山县由县民大会选举产生县政府一事，作过如下的评价：“农工组织县政府，确山首先实现。在革命史上是很光荣的一件事，在农工运动史上也是很有价值的呵。”

(四) “河南苏维埃”惊动过世界。确山暴动的旗帜不鲜明，又发生在兵荒马乱的时候，一般人只把它当作红枪会闹事。但是，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的嗅觉是灵敏的。过去，他们凭借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遇上军阀混战、土匪骚扰、红枪会闹事，向来是安然不动的。这次，在确山的外国传教士一见武装农民攻

，城就嗅出这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仓惶南逃鸡公山。邻近各县的外国传教士也跟着纷纷逃到汉口。豫南农民革命行动的消息通过外国记者传到国外，英国报纸发出了“中国河南出现苏维埃”的惊呼。当然，所谓“河南苏维埃”只是以农民代表为主体的县政权，她不同于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时俄国出现的苏维埃，也不同于中国后来建立的苏维埃。

（一九八一年一月）

## 徐向前同志忆彭湃

李 而 炳

彭湃同志是我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是农民运动的著名领袖。一九二八年，徐向前同志率领红四师在东江同彭湃同志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最近，徐向前同志向有关同志介绍了彭湃同志的一些情况，现整理出来。

徐向前同志第一次见到彭湃是一九二八年元旦，当时广州暴动已经失败，起义部队在广东花县整编为红四师，于一九二八年元旦到了海丰。徐向前同志在红四师当参谋长。

彭湃同志出身于海丰的一个地主家庭，曾留学日本。他早年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是我党最早的领导人之一，也是南昌起义的参加者之一。他搞农民运动是比较早的，曾在海陆丰领导过三次农民起义，在群众中威信极高，当地的农民称他为“彭菩萨”。

起义部队到海丰的时候，这里已经成立了苏维埃民主政府，是已经赤化了的。到处是革命的大标语，有许多以马克思、列宁等革命导师的名字命名的街道，连城墙都刷成了红色。这里的群众基础很好，农民从四面八方赶来欢迎红四师。当晚，在海丰的红场上举行了几万人的欢迎大会，彭湃同志讲了话。那时彭湃同

志二十多岁，身材不高，脸修长而白嫩，象个书生。而他身着普通农民的衣服，脚穿一双草鞋。他用宏亮的声音说道：“我们农民是没有法律的，刀子就是我们的法律。抓住地主就是杀头。”还说：“失败算什么？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畏艰难，失败了再干，革命总有一天会成功的。”彭湃同志很有讲演才能，他的话使大家很受鼓舞。

红四师到东江后，成立了东江特委，彭湃同志任特委书记。

打惠来时，海陆丰失陷，彭湃同志就到了惠来。他的夫人姓许，还有一个小孩，抱在怀里，也一起来了。徐向前同志和他们常在一起，徐那时已是师长。

彭湃同志打仗很勇敢，打惠来时，他带赤卫队，自任敢死队长。他没有进行过专门的军事训练，不懂战术，毛主席说他不会打仗。他提出反对“上山主义”的口号，和敌人死打硬拼。有一次，敌人力量很强，他一个人往下冲，徐向前同志只好带部队冲下去把他保护回来。

彭湃同志常说，和农民打成一片，就要能吃苦。农民的饭碗不干净，他不怕脏，端起饭来就吃。农民都很喜欢他、拥护他。

一九二八年下半年，东江的斗争形势对我不利，敌我力量对比日益悬殊。彭湃同志主持召开了特委会议，研究红二师和红四师的行动方向问题。会上有两种意见，徐向前等同志主张把两个师的兵力集中起来，到粤赣边界去，那里是两者交界的地方，回旋余地大。彭湃同志认为广东民团很多，不容易过去，还是要在海陆丰坚持斗争。特委会议后，二、四师回到海丰。彭湃同志到上海去了。

彭湃同志到上海后，被叛徒白鑫出卖，和杨殷、颜昌颐、邢

士贞同志一起被敌人秘密杀害。白鑫曾在红四师十团当过团长。在东江时，他打起仗来往后跑，身上还带着很多银元。当时，我们曾建议处理他，特委没有同意。后来听说周恩来同志派陈赓等同志把白鑫除掉了。

彭湃同志牺牲后，鄂豫皖苏区成立了彭杨学校，以纪念他和杨殷同志。

彭湃同志的牺牲是我党的一个重大损失。周恩来同志当即代党中央起草了题为《以群众的革命斗争回答反革命的屠杀》的告人民书，愤怒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残杀彭湃等同志的罪行，沉痛哀悼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彭湃烈士的功绩是永不磨灭的。

# 延安纪事

## 续约斋

**【编者按】**第二次国共合作后，不少国内外人士纷纷到革命圣地延安考察，续约斋先生是其中的一个。他奉陕西省政府和财政厅之命，以友军的身份于一九三七年五月从西安出发，到了延安，受到了毛泽东、朱德、林伯渠、博古等同志的亲切接见，了解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抗战到底的决心，并目睹了陕甘边区军民的幸福生活，大为感动，记下了这部今天成为生动历史记录的日记。这里摘录其中的一部分发表。为了保持原貌，仅对个别句段稍作删节，错字作了改动。

### 一、第一次看见红军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九日）

五月十九日清晨，我们从西安出发了，到了三原汽车站停了一个小时，打了打尖，继续北上，下午四时抵达耀县。在南门外，我们一眼就看见有许多红军，他们面带笑容，看着我们的汽车走过去。红军，过去我在报纸上对他们很熟悉，耳中也不断听说过。但是亲眼看见，这还是第一次。他们都很年轻，二十岁上下

的居多，最大的也超不过三十来岁。他们脸色红润，面目和善，并无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狰狞可怕。我们到了栈房，略加漱洗，即与高君赴红军办事处访问。

这是一座普通老百姓的小院落，门前写有“中国人民抗日红军西北办事处”字样。门外站着两个荷枪的守卫，头上戴着列宁式的军帽，用红布剪成的五角红星作帽徽。胸前的徽章系用红星、太阳和光线组成的。他们赤着足，穿着草鞋，在门前走来走去，气势虽不轩昂，但是非常有礼貌。当我们把名片递进去后，里面很快地就出来人，把我们迎了进去。一位负责的袁先生和我们亲热地握了手，用十分谦虚的口吻和我们谈了话。经我们说明来意，想让他们给我们找车北上，他满口答应，一定给我们设法。并说：“栈房里如不方便，可以移来我们这里住。”招待我们的几位小红军，好象是勤务，又象是士兵，当我们走进去的时候，他们正在房内和长官说笑谈天，他们殷勤地给我们斟茶点烟之后，嘴里也含着纸烟走出去了。这在我国军区域内，是极其罕见的，也是十分惊奇的。可见他们官兵之间是非常平等的。我们一面谈话，一面看看屋内，陈设非常简单。正面墙上悬着陕西省详细地图一张，侧面悬两张伟人像：一列宁，一斯大林。院内到处贴有标语，最重要的有：“要求国民党中央和共产党中央重新合作！”“国共合作万岁！”“要求南京政府迅速抗日！”……等等。我们看了几分钟，就告辞出来了。他们一直送我们到大门外边，十分热忱。

当我们走回去的时候，在路上我们二人都不约而同地说道：

“红军真是和蔼可亲啊！”



## 二、有二年历史的轻便铁道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日)

出了耀县南门不远，就有一座牌楼，上面写着“北山锁钥”四个大字。凡是从关中的汽车、马车、行人，都得从这座牌楼底下经过，再往南走不远，就看见一条轻便铁道，这条铁道，是由西安修到耀县，这里就是它的尽头处。在铁道的两旁，堆着许许多多的麻袋，里面装的多是大米，堆起来如同小山一样。一位荷枪实弹的红军在这里监守着。这全是运给红军的军粮，由火车从南方运到西安，再由这条轻便铁道运至陕北。当我们出了三原在汽车上遥遥望见，沿途三三两两的工人推着这些载粮的车斗，循道轨往北行进。运抵这里以后，再由汽车转运延安，供给红军食用。这条轻便铁道现在几乎是红军的交通干线了。但是当初修筑这条铁道的时候，却并不是如此用意。当我问到一个知情的人，他说：这条铁道已有二年多的历史了，它在河北保定、河南洛阳都曾做过东北军的军用。自从东北军调到关中便把这些铁轨带进陕西，直铺耀县。那时正是一九三五年冬天，火车尚未到达咸阳，所以就从西安铺起。据说此线还曾是东北军帮助铁路局修筑咸同铁路运料用的，至一九三六年三月全路铺成，适值“剿共”军兴，军运频繁，这条铁道就专为东北军运粮之用。全路共分十八站，东北军专拨铁道兵一大队保护。陕变解决以后，东北军开往蚌埠，此间只留铁道兵一连人护路，已拨归西安行营管辖。据说此路修成，载重量大增，人力大大减轻，每一车斗可装面粉四十袋，重一千六百斤，一人推行一天可走一百八十里（西安到耀县全程），若是空车一天就可往返。并闻有机车头两辆，每一机

头可带二十辆车皮，只因这条路坡度太大，起伏不平，机车行走困难，故此迄未使用。但是仅仅二年，而铁道的任务竟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已经变成红军自用的一条轻便铁道了。

### 三、踏进北山去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早晨七时，我们就乘着红军的汽车离开耀县了。偕行一共五辆汽车，全是顾祝同主任拨给红军运粮用的。车上坐着十五、六个人，他们大半是到延安上抗大去的，看去年岁都很轻，也都很活泼愉快。

汽车风一样地绕过了同富县的北门外，接着就是一条小溪，道路两旁麦浪滔滔，树木山石，远近点缀。往前地形愈来愈高，两边逐渐出现了高大的山峰，把中间夹成一条小川道，山路愈走愈狭愈险，一直走了四十余里。汽车路下面溪流晶莹，铮铮有声；上面山花野草，芬芳扑鼻。除汽车隆隆之声而外，山中幽静地几乎不闻一声。忽然向前看去，似乎没有路了，不料转过一个山弯，钻出一个小小的山洞，前面又露出了一个大山坡。据说这就是有名的金锁关，在前一、二年、这里是土匪经常出没的地方，凡是路过的人，很少有不被劫掠。但是现在时局转变了，我们今天过来，已经是一条平安的坦途了。

爬上这座大山坡，又看见了无数的大山头、大山沟，岗峦起伏，绵亘无际，很少有可耕之田。我们一连串的汽车象蚂蚁一样地爬行在山岗上，在眼光的视平线之下，看见的群山万壑，真是瑰丽伟奇，极世界之壮观。啊！原来北山就是如此伟大，却也如此荒凉。翻过了两三条很深的大沟，经过了宜君、中部二县，最

后爬上了一个小平原，洛川县城露出了地面。

洛川是一个仅仅方圆二华里的小城，向来不为人们所重视。不料近二年来，因“围剿”红军战争的紧张进行，大军屯驻，官署林立，直至现在，据说已出现了历史上未有的繁荣。计官署有第三区专员公署，有“剿匪”总司令部洛川行营，还有五十七军军部。驻军的长官和张学良副司令过往频繁，驻军调动无常。去岁军队最多的时候据说达到万人以上。所有市场货物、商品经营，莫不利市百倍，繁华热闹有内陆码头之称。不料时局陡变，军队悉数开走，遂致全市商业一落千丈，家家难以维持，尤以饭馆、澡塘业为最甚。足证消费式的繁荣不过是打吗啡针的办法，一旦购买力失去，其危险更甚于前。

这一夜我们为了明早搭车之便，就宿在洛川南城汽车联络站内。红军士兵对我们说说笑笑，招待十分殷勤，把我们过去对他们疑惧的想法，完全消除了。

#### 四、过了榆林桥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汽车沿着洛河前进，我们远远地望去，山势蜿蜒，地形险要。再往前走四十里，就是榆林桥了。

这个地方并非“榆林”，也无所谓“桥”，不过是洛河岸上一个小小的山弯。山坡上面有疏疏落落的几户人家而已。就在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一次惊人的战斗。这一战斗却和解决陕北问题大有关系。那是在一九三五年十月，甘泉被红军包围，东北军一〇七师的一个团，奉令前去解围。团长名叫高福源，学识技能均为张副司令所器重，所率士兵亦勇敢善战，这次奉命兼程挺

进，奋勇出击，必欲灭此朝食。不料就在此地被当地的红军团团包围。如果及时开来援兵，尚可冲围而出，但东北军大部退缩，观望不前，眼看着这一部分精锐被红军解决了。勇敢的高团长被俘虏了，红军把他带到了瓦窑堡，经过多次的说服，他不固执了，就在瓦窑堡的红军党校内学习了五六个月，直到去岁春初，他从瓦窑堡回来，先到甘泉，劝甘泉的守军和红军联合，守军不肯答应。于是他又到洛川，见了王以哲将军，将红军方面的情况一一详述。王以哲将军是张副司令以下的核心人物，可以主持大计。从此，东北军和红军方面来往频繁，而往返传递的人就是这位高团长了。

我仔细地将榆林桥的形势看了一番。这地方一面是洛河，一面是大山，就在这个山弯之内，可以藏一两师人马。可惜对于地形不够熟悉的东北军，竟把一个整团的人马损失在这里了。可喜的是却由此开端了红军和东北军的友好联系。

## 五、一个最近的大战场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十二点钟我们离开了甘泉。这条路上，两面都是高山，中间小溪缓流，细草蒙茸，青葱翠绿，很是可爱。越往前走，山势越高，道路越窄，地势也越险要。山顶上，峰头相接，碉堡密布，几乎数步一碉，由下向上望去，排列的就象队伍一样。这样一直排列了八十多里，一直到达延安。在最近三年以来，这里正是两下厮杀的大战场。啊！在这里不知消耗了多少战费，牺牲了多少热血男儿。离甘泉四十里，便是劳山关，在一九三五年九月间，何立中亲率他的一一〇师人马，搜索前进。不料正走在这里，猛

然间四面山头上，红旗飘飘，出现了数不清的赤色战士。经过一昼夜的血战，结果该师就整个覆没在这里了。何师长自觉羞愧，拔枪自击。一周以后，也就命丧甘泉了。就整个中华民族的武力来说，这是如何的一个损失呀！我们看了四围高峰上巍然耸立的无数碉堡，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一层悲惨的愁云。过了劳山，两山渐渐变成石质，树木小草高高生出，远远望去，青翠得宛如江南一样。我们路过的地方，看见远远近近有数不清的红军，枪架在路的两边，有的在草地上放马，有的在树下乘凉，还有的在溪边唱歌跳舞，自由活泼，十分快乐。突然到了一座山头底下，我们的汽车停住了。押车的红军下来说：等齐后面的五辆车，然后用加速度往过开。我们知道这一处就是前几天周恩来副主席被土匪袭击过的地方，周副主席虽然没有受伤，但是连特务员和士兵遇难者，竟达十五六人。我们等齐了汽车进了山，果然好一个险要所在，两面犹如两堵墙壁，中间夹着一条汽车路，有些地方是用人工凿成的一条细缝，汽车就从这里钻过去，山上面长满了密密的树林，一眼望不出去的蔚绿荫森，其中兽啼鸟叫，风景绝佳。这二十里的路程，却如一阵风一样，刹那间就跑过去了。中间因误会放了两枪，事后才知道山头上寨子里有红军放哨，近来路上并没有土匪。可惜因为我们的汽车开得快，不能在山内细看。这样好的风景，犹如走马看花一样的过去了。后来我们得知这座山叫“鸪岩山”。

## 六、新世界的雏形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出了鸪岩山就是一个平川式的山沟，汽车跑了三十里，远远

望见前面山坡上耸立着一座雄伟的高塔。同行的人说：到肤施了！果然转过一个山弯。就露出了一座城池。啊！延安，红军的首都，中国的莫斯科。我们经过了一周的跋涉，终于来到了你的怀抱。车到城门口，略问了问，就让我们进去。啊！好一座热闹的延安城。街上挤满了行人，磨肩接踵，熙往攘来。其中一部分是居民，大部分是红军的后方工作人员，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中国人、外国人，他们都带着红军的军帽，勒着布带，打着裹腿，来往走去。他们之间没有阶级的区别，没有地位的高下，自上至下，都是一律待遇，所以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满足的笑容。即便是商人和居民，也都可以自由贸易，自由工作，不加捐税，不稍留难。在这里没有重利的盘剥，没有官厅的压榨，这简直是一个“世外桃源”，充满了金色的阳光和自由的空气。在街上我们看到的标语是：“对内和平，对外抗战！”“争取民族解放，争取民主政权！”“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他们真是口心一致，实行他们所宣示于人民的誓言了。这里真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天地，代表着新世界的光明。汽车到了车站，我把压在胸中多年的腌臢气息，全部倾吐干净了。

这座城就是历史上的上郡，曾经尽过国防上很大的任务。背负龟山，面临延河，是陕北极富庶的城池。迺近二年来，经红军的围困，国军的固守，军事上的斗争，毁灭了它的繁荣。四关外的民房全部被拆毁了。附近的许多水田，全部变成了防御工事、军用操场和飞机场了。街道窄狭，房屋凋零。在去年十二月二十日红军未进城之前，它真是气息奄奄，如垂死之老人。“双十二”事变，肤施县旧县长逃跑了。红军入城的第一天，就开了一次抗日救国大会。在会上，宣布了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减低房租和利

息，因此人民都能安心工作，祛除了以前对红军的疑惧。随后中央红军全部移来，边区政府的国民经济部门奖励生产，提倡合作，组织民众，使这个残破了的古城，逐渐恢复了它以前的繁荣。

这座城四面都被险要的山头包围着，每个山头都有国军过去修筑的工事。它的雄堞一直从延河边蜿蜒到西面的山头上，进一步显出了形势的险要。它现在已经是陕甘宁特区所属四个省（陕西省、陕甘宁省、关中省、神府省）自由政治的原动力了，并且也是全国所有红区的首脑部了。

我们一路行来，从洛川到延安见到了成千的红军，其中男女老少、中外南北，到处的人都有。他们都是具有坚定革命信仰的人。我虽见他们的衣着都是层层补钉，拖曳不整，有鞋无袜，有衣无袖，从表面上看来，简直是一群烂骯叫化子；饭食也是粗糙的杂粮。但他们的精神却都紧张活泼，快乐无穷。在他们中间，领导阶层和下级干部相处得如家人父子一样的亲切，胶漆一样的团结。前几天我在洛川时，曾和他们的师、旅、团长并许多士兵，在一个桌子上吃饭，说话谈笑，毫无一点拘束。所以在他们中间是极自由，极活泼，并且也是极民主的。他们熏陶在这样的空气中间，把一切物质上的痛苦全都忘却了。这是一个光明世界，叫我们生来就在这黑暗中摸索的人，怎能不羡慕？

## 七、和平！民主！！抗战！！！！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这是一个微阴的早晨，我们在睡乡中被战歌惊醒了。于是赶紧起床，洗漱，略加收拾，就去财政部访林伯渠部长。该部是设

在一个旧式的商店院落内，门口贴有一个小小的纸条，只要稍不留意，就看不见。我们到了号房，看门的告我们说：部长现在办公室内。我们二人就直然走了进去，并没有打什么招呼，也没有经过什么传达手续；见一位高级干部——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兼财政部长——用这样简单的手续，在我们的头脑里是十分惊奇的。

一个身躯高大，脸色红润、鬓发苍白，容貌和蔼的老政治家，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他跟我们很亲切地握了手，犹如家人父子一样。他穿着士兵一样的军衣，戴着有红色帽徽的军帽，打着裹腿，穿着用粗布做的鞋。他马上让我们到办公桌旁坐下，端来用大碗冲起的两碗茶。这个办公桌是一块安了四条腿子的木板，而座位则是普通的长板凳。屋内陈设极其简单：一个书架上堆着几本经济年鉴，墙上悬着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主席的像，还有两三张地图；此外就是贴着用毛笔写下的一些语录，有列宁的，也有斯大林的。我们开始谈话了，他用高大而宏亮的声音，说明陕北农民是没有多大负担能力的。对于合理的赋税，他是主张保存的，但是陕北仍处在战时状态，百业凋敝。所以他们现在尚未加丝毫负担于农民。他主张中央政府应补助陕西的财政，因为陕西是中央的一个行政细胞；而省政府应在这个时期用种种方法发展国民经济，培植税源。比如，欢迎华侨投资，银行贷款等等。他说话时语言清晰、流畅、滔滔不绝。在谈话中间他不住地用手将帽子取下来，又不住地戴上去。我看见他的头发，已经大部分斑白了。

我们就苏维埃的土地问题，先向他请教。他回答这个问题时说：土地问题是苏维埃的基本问题，直到现在农民还有权利要求他们所需要的土地。共产党的十年革命，主要还是土地革命。不



过陕北方面地主的剥削，亦不同于江西、福建，因为在陕北，尤其是甘宁两省，地主尚带有农具，并贷种子与佃户，故佃户的损失限于劳动力方面，分配也较易。且有江西分配土地的经验，故能一次给农民以适当应得的土地，不作二次、三次的分配，以固其所有权的信念，去岁至今，红军虽扩大垦荒运动，新添土地不在少数，如果今年雨量不缺，粮食必有富余。惟刻下大敌当前，我们的主要敌人不是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了，而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应合全国之力，和平统一，以便打倒我们的共同敌人。故我们已经出有公布，在未分配土地的区域，不再分配；在已分配的区域，地主仍应留予相当的土地。这是我们这次和平政策的依据和理由。如果国民党明智的话，应该不放过这个时机，主动和全国人民共同谈判，协力御敌。

我们又问苏维埃的财政政策如何呢？他说苏维埃的财政收入，过去从未取源于税收。在江西的时期，我们的大部分收入，是没收土豪劣绅和汉奸的财产，这是一笔很大的收入，可以作为我们全部的开支。抗战以后，豪绅不是我们斗争的主要对象了，我们就用劝募抗日捐的办法，谋取财政的来源。如去岁在山西就募得大宗的捐款。我们到陕北后，从没有增加过人民的负担，因为我们从江西和山西带来的黄金，就很够用。但是，要和南京比起来，还是极少数的极少数，所以我们不能奢侈。我们的开支是极端节约的，只要有饭吃，个人都不必花钱。我们的官长和士兵一样，除开零用，都没有薪水方面的报酬，所以我们能支持到现在。现在全国需要抗战，所以共产党愿意和平，愿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改编后的餉项开支，自不必另行筹措了。他还告我们说：苏维埃过去的财政分配比例，军费占百分之四十至五十，教

育费占百分之十五至十六，其他则为行政费和国民经济建设费。

最后他又说道：共产党的和平是为了抗战，而抗战就必需民主；因为要对日本帝国主义作最后的斗争，就必须全国四万万国民总动员。蒋介石先生自以为有二、三百万军队，就可以抗日，这是很肤浅的。如果忽视了民主，则国内和平就不能保证，和平不能保证，如何还能谈到抗战。所以和平、民主，抗战，是相因为果的，相互关联的。

林部长所谈的“和平、民主、抗战！”真是抓住了当前中国的重要问题。使我懵懂多年的头脑豁然明亮了起来。

## 八、在历史上仍然是很直的路子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从林部长办公室出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博古同志今天下午有时间，你们可以去谈话。”

下午一时，我们就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内出现了。这是救世堂的一座小院，院内有矮矮的十余间房子，博古先生的办公室，在正面偏东的耳房内。当我们走进的时候，他正将他的一堆公事收拾起来，让我们到一个矮小的圆桌旁边坐下来。桌凳都是曾经破坏了的，坐起来觉得很 discomfort。

啊！这样一个青年，看起年纪竟象是二十几岁。这就是曾经当过党的书记，现在他名义上虽是组织部长，但是除毛主席外，他仍然是政治上的最高掌握者之一。他皮肤洁白，两目有神，看去很活泼，却是很果断的样子。他是江苏人，口音很难懂，但是他的话慢而有力，是很能给人以兴奋的。

我们提的第一个问题是：国共合作刻下究竟达到何种程度？

他说：国共合作决不是遥遥无期的，从国民党三中全会的转变，  
恩来同志奉命赴宁，当面折冲，均可作为明证。现在所剩的，只  
有方式问题了，究竟采取一九二四年的旧方式，共产党加入国民  
党呢？还是用另一种方式呢？不过三中全会后，中日关系弛缓，  
南京的右派逐渐抬头，有人坚持陕甘宁的苏区应各归陕甘宁的省  
政府管理，这就无异是消灭抗日势力，这样我们就决不愿意进行  
谈判了。最后在四月一号，我们提出一个最低纲领，由恩来同志  
面交给蒋介石，当面折冲，正在继续讨论中。一切都由恩来同志  
就近接头。我们知道中国刻下需要合作，而日本的侵略又是无止  
境的。这些都是打击右派和促进合作的动力。我们这个政策是根  
据国内外的情势决定的，我们需要向各方面解释。我们的许多党  
员，是不愿意放下这顶有光荣历史的红帽子的，所以我们在月初  
就召集全党代表和全军干部，作过一次详尽的解释。我们的这项  
政策，看去似是迂迴曲折的，然而在历史上仍然是最直的。他用  
力在纸上画了一根直线，一根曲线，又重复述了一句，在历史上  
仍然是最直的。

关于国民党右派方面，他说：我们决不用武力去打击他们，  
因为那是内战。但是从事实方面推测，这个暗礁也是不足为虑  
的。至于东北军的改编，十七路军的被压迫，只要内部的团结不  
松懈，就终能促动南京方面的进步，保持抗日的实力，对整个团  
结来说，那是十分有意义的。

此外，关于民主政治的实现问题，统一战线的领导问题，和  
平阵线的巩固问题，英日同盟的复活问题，以及国际上帝国主义  
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的问题，他都有详细的答复。每个问题他都不  
厌其烦地翻来复去地再三申述，而且每一句话又都切中扼要，印

入人的心坎之中。我们听了以后，才知道中国共产党的大政方针，是经过详细考虑，研究了国外的动态和国内趋势而后决定的。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是必然会实现的！我中央政府对此决不可再迟延了，也决不能再迟延了。最后他送我们出来了。他虽然也是穿着军服，但没有打裹腿。他的夫人也是全副武装，颇有英武气概。

### 九、我们是革命的，不是土匪！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在肤施县城内偏西北方一条很窄小的小巷内，一院民房，外面石垣将倾，门口站着两个卫士，院内正北有三间窑洞。我们就在这个窑洞内，会见了一位举世闻名的老英雄。他就是身经百战，现任红军总司令的朱德将军。当我们走到房屋外面，他早已闻声走出来了。他和我们握手以后，就让我们进他的卧室。这位将军早年留学德国，学习军事，他是红军的创始人之一。他能负苦能任重，爱打篮球，精于射击。他的英武在红军中大家都很熟悉，都戏呼他为伙夫头。前岁从松潘北上时，他虽被张国焘挟持，一时失去自由，直到去岁九月才回到中央。他穿着粗布军衣，但不十分整齐，勒着皮带，打着裹腿。大约因为责任太大，负担太重，所以腰背开始有点弓了，在口角上，眼尖上，都深深地印了许多皱纹。说话的声音粗而重，声气下沉。从表面上看，也活象一个从深山出来的老农。我们就在他那个陈设很简单的卧室内，开始谈话了。

他说，我们红军作战已有十年的历史了，我们为的是争取民族解放，改善人民生活，换句话说，就是争取人民生存。我们人

民必须生存，所以我们需要革命，那就是说：我们是革命的，不是土匪！但南京方面的人，硬把我们当土匪来剿，所以就越剿越多，弄成十年来的大战。这一次的合作是蒋介石觉悟的表现。五个月来的停战状态，是十年以来未有的现象。我们希望把我们的敌人移到国外去，但是国民党的右派，政学系和改组派等亲日分子，仍然是天天给我们造谣。他们是革命的叛徒，他们曾经跟我们一道革命，而中途走到升官发财的道路上去了。共产党是为民族解放而战的，决不搞升官发财的勾当，也看不起那些升官发财的人。有人说南京政府靠不住，怕合作后上国民党的当，共产党是不怕上当的，共产党随处可以吃苦，随处可以作战。此次东北军的改编和杨虎城的出洋，有人认为这是南京政府取消抗日势力的举动；但是我们不必怕，从好的方面说，如果他们真的要欺骗人民的话，恐怕要招来他们自己的加速崩溃。

最后，我们问到红四方面军的情形。他说：红四方面军损失是大的，但不象外间所传之甚，徐向前也并未死亡。继又谈到，我们在国军的区域，得不到真实消息，得不到这方面的刊物。他允许供给我们一些东西，他对于南京方面封锁消息，扣留刊物，是深表不满的，认为扣留并非攻击自己的刊物，一定是贼人胆虚，自己先怀下鬼胎了。最后我们告辞出来了，他和我们又紧紧地握了握手，笑着回去了。

朱总司令让他的勤务兵送我们回去。一路上他告诉了我们许多关于朱总司令有趣的事。他说：就在这个窑洞里边，悬着很多很细密的军用地图，每当他没事的时候，老是没完没了地在地图上看看去，经常忘记了吃饭。我们感到朱总司令是一位举世闻名的，劳苦功高的军事领袖人物。

## 十、团结抗日的明灯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多时没有落雨的陕北，田野都已枯黄了。今午十二时前后，突然一阵倾盆大雨洒遍了山坡土梁。正在这个时候，门房带进周小舟先生的信说：“毛主席正在等候着你们谈话呢！”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们对这样一个驰名中外的伟大革命家的访问，是早已热诚地渴望着，所以就冒着大雨，一直走去了。等我们进门以后，他和他的夫人正在读辩证唯物论，一边读，一边用铅笔圈点，一眼看出他是一个好学深思、聪明透顶的人物。他身材高大，年纪大约在四十岁上下，面色微黄，两目炯炯有神，似是一位学者式的典型人物。他看见我们进来，就起来让我们坐下。他的夫人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红军，同他一起给我们烟茶招呼。

毛主席的谈话，缓慢沉着，条理分明，几乎每一个字都要送到听者的耳中去。每讲完一段话，就概括出一个结论来。同时他脸上的表情和眼光的注视，处处都是溢趣横生，引人注目。他解答问题的时候，全是先列举事实，逐条解释，逐条证明，最后下一个结论。他下的结论是肯定的，毫不犹疑的，没有一句空闲无力的话，真不愧是当前中国革命的领袖人物。

他首先分析中国的现状。他说：中国目前的政治是进步的，但是另一方面，进步是缓慢的。比如，“双十二”时，我们所提出的政治纲领，老蒋本已全盘接受。但他被放出去以后，他并没有完全照他的诺言那样办。他虽实行了一部分，但仅仅这些实在是足够的。这就说明国民党的十年错误政策，不是一下就能彻底改变的，而现在已经开始转变了。这个改变的同时，也就反映了国

国民党内部的派别纷争和意见参差，左派和亲英美派已经倾向于抗日了，所以他们也逐步地表明了他们对抗日的态度；而亲日派仍在竭力活动，压制爱国运动。这些矛盾的存在，就是政治上进步缓慢的一个最大原因。但是日本国内的经济状况和他们各政党间势力的消长，使它不能不向中国进攻，这是它既定的策略，今后决不会改变的。过去国民党政治上的一些好转，是由日本的进攻促成的，而以后日本的进攻，更可以促成中国政治上的进步。若果中国人民大众肯努力的话，必能使右派势力逐渐消灭。所以这并非全是国民党的问题，而是还要全国人民一致努力的问题。

其次，谈领导权问题。他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后，我们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十大政纲。为了抗日的需要，特区内已不再没收地主的土地，但要减租减息，取消苛捐杂税，以减轻剥削，减轻负担。民族资产阶级，已成为我们的友人，他们在特区内，也有参政权。老实说，我们并没有放弃我们的革命目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十大政纲实与革命的三民主义，基本上并没有什么区别。这些政纲和其他党派的政纲，哪个能得人民的拥护，哪个就是领导。共产党所争的是抗日民主和改善人民生活，我们并不与他们争政权，争地位。因为地位和政权并不足以作为领导的可靠保证。

又次，又谈特区的改制问题。他说现在的特区政府已经不是苏区中央了。它是直隶于南京政府的。因为这件事，我们曾于月初召集各苏区代表和红军干部开过一次会，作了详尽的解释，上周才闭会，大会通过四条决议：（一）取消苏区，实行抗日；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军事委员会的指导。（二）军事教育要改变过去国内作战的方法，而准备对外的、大规模的作战部署。

(三) 教育方面要尽量减少文盲, 实行国防教育和必要的文化建设。(四) 发展国民经济, 改善人民生活, 恢复战时破坏了的农村。我们不管南京方面的认识如何, 我们在特区就这样地实行了。我们想南京方面也一定会赞同的。

最后我们问, 英国帮助南京之不怀好意, 究将如何对付? 他说目前状况, 帝国主义是处在分裂状态中的, 我们正好利用他们间的矛盾, 争取我们的民族解放。我们暂时还不能反对整个的帝国主义, 因为英美法是可能和苏联连在一起的。老实说南京政府刻下向英国进行的借款, 是有损于国家主权的, 但是这一点我们现在还不能提出。因为如果借不到款, 士兵就没得饭吃, 这是日本所喜欢的。我们目前应该全力对付日本帝国主义, 但是也要提防其他帝国主义, 决不要前门拒虎, 后门进狼。

他说话的时候, 态度很自然, 一边拈烟, 一边吸烟。说到很微妙的地方, 总要抬起头来, 发出幽默的笑声, 引起了听者无穷的深思, 确实具有伟大政治家的风度。所以整整谈了两个钟头, 我们只有愉快, 毫不觉得一点疲倦。出了门, 他还用全力和我们握了握手。

毛主席的谈话, 好似在我们心中点起了一盏指路明灯, 使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豁然明确, 对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倍增信心。

### 十一、屹立中流的一位老青年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几个月来我总是满怀着一个渴望, 很想访问老革命家徐特立先生, 我曾经在《国闻周报》上看见过他的像片, 知道他已经六



十一岁了。前几年他亲自参加过长征，而现在是边区政府的教育部部长。在中国象他具有的这种刚劲精神，是很少有的。

今天上午，我们去教育部访他的时候，他没有在，所以在下午五时左右，这位老翁亲自来回访我们了。

他是一个身体矮小而精神焕发的老翁。胡须虽白而头发仍是黑着，穿着整齐的黑军衣，腰里系着一根布带，足上穿的是千补万纳的一双家做鞋。他的脸色红润，无异少年。见人老是笑着，既不严厉，又无拘束。我将他让到屋内，很恭敬地递了一碗茶。首先我提了几个问题，都是关于教育方面的。他将苏区教育的概况和方针，很详细地介绍给我们。他说：肤施现在设有抗日大学、党校、步兵干校，在延长设有鲁迅师范学校和青年学校，在所属四省，每省设一党校。全苏区共有小学百余所，现在教育经费每月为两万余元。暑假后拟增加为六万元。他主张苏区内所有各阶层的儿童，在受教育的机会上应该一律平等。他又主张将来大、中、小学的学生一律不应收缴膳宿学费，靠学生生产劳动所得支付，他说这是办学的一个最省钱的办法。

他说话时手势动作，很有力气。但是每提出一个主张，都要反说正说，不厌再三重述，考虑得极其周到。他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教育家，事事都以心理感化为原则。嗣后我问他过去办教育的经验。他说：从宣统一、二年起，他就在长沙办小学，以后又在长沙办师范，毛主席曾在他那里上过学。他当过师范学校和女子师范的校长。在大革命时代随红军外出，直至现在。我又问他长征时二万五千里的路程，他是怎样走过来的？他说：差不多全是用步行，很少骑马，因为徒步是对身体有益的。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他的健康大有进步了。最后，我们又谈到国共合作的问

题。他说：现在接洽的情形，当然有些是不能公开的。因为对付敌人，我们和南京政府方面，有些地方都需要秘密。总的来说，合作是正确的，对人民是有益的。所以我们就一定要这样做。有人说，南京政府的表现还不够，但大体上还是进步了；我们不能因为它有某些坏处，就抹杀了它的进步。正如我们不能因为它有某些好处，就说它是完全进步了一样。政治家贵有真认识，一定要屹立中流，不为风涛波浪所动摇。他说这话的时候，似乎用了很大的力量。啊！原来老翁还是一个政治家啊！

我们足足谈了有两个钟头。天黑了，夜星已经全起来了，地上的一切都看不见了。这位老翁不得不同我们告辞了，用他那走了二万五千里的健足，大踏步地走了回去。

## 十二、晚 会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这是红军的唯一娱乐集会。

一个方圆九平方里的小城，内有居民一千多户，红军和后方工作人员一万多人。他们每日每时，工作紧张，毫无闲暇。他们在工作时间之外，要召开生活检讨会与批评会，还要组织宣传，发动人民抗日。此外，还被物质缺乏和食粮恐慌的气氛包围着，所以需要一种休息，需要一种娱乐。这就是他们举行的文娱晚会。

这一天晚上，我们在中央大礼堂参加了他们的晚会。这是一座基督教堂，略加修理，成为一座剧场形式的礼堂。内中可容纳千人左右，但座位很少，后来者大多站在后面。他们是来者就坐，很少让座之风，虽毛主席来晚了也只好站在后面。我因为去

迟了，就坐在最后一排凳子上，看去很觉吃力。内中民众无多，大部分还是年青的红军。他们在这里无拘无束，任情喜笑，在刹那间，把整天的疲乏，全部消除了。最可注意的是，他们既不象国军士兵之备受压迫，态度畏葸；又不象社会上民众的毫无秩序。虽极活泼，亦极严肃。演出开始了，第一幕是《放下你的鞭子》，台上台下，配合表演，惊心动魄，如此情相逼真的新剧，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此外还演了《亡国恨》，叙述日军残杀东北同胞之惨状，全剧用歌舞表演，亦可使人泪下。尤其令人欣喜的是，儿童队的各项跳舞，各种救亡歌曲，配以各种音乐，更加引人入胜。在时针直指十时以后，我们才从大家的欢笑声中跑出来。

他们这种晚会是每逢星期六晚上举行一次。学校有学校的晚会，部队有部队的晚会，市民有市民的晚会。这座中央大礼堂是专供军民娱乐用的。他们并且还专门组织剧社，编演新剧，最出名的，听说就是“阿正时剧社”，此外还有“人民抗日剧社”和“少共青年歌舞团”等。

### 十三、抗日军政大学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九日）

今天，我们参观抗日军政大学。一进校门就听见了各种悲壮的歌声：“中国怒吼吧！”“我们不怕流血”、“救救中国，不要再说失败”，千把人合唱起来，分外激昂动人。他们男女同学，同班上课，同样装束，除开能从歌声里辨别出男女外，从军衣军帽上看去，一样都是雄纠纠的红军战士。他们上午连上三堂课，下午多半是在操场上或者在野外活动。他们每个人的脸色红润，精神充沛。现在已经编到十三队了。原来计划只编十队，收录一千

人，但是三个月的功夫，已经达到一千五百余人了，而现在请求入学的，还象潮水一般地涌来。学校因限于住食处所，无法容纳，不得不宣告暂行停收了。

他们都是从全国各地间道来此求学的。以关外东三省沦陷地区的人数为最多。河北、山西、陕西的也很不少，内地各省甚至远在广东、广西等地方的都不远千里，跋山涉水而来。经过沿途关卡军警的稽查留难，或竟遭到扣押逮捕，真是冒危犯难。完全为了革命救国而学习。编在第一队至第九队的，多半是旧日红军和国军中较有地位的人，如罗炳辉、张庆华等就在第一队上课。张语寰也在这里，算是旁听上课。他们招生并不限于共产党员，只要有组织的介绍信，就可入学。在里面他们很自由，没有号房，没有差人，没有训导职员，平时互相管理，吃饭时大家动手，生活中共同劳动。

他们的课程是《列宁主义概论》、《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中国革命》和《抗日作战方法》等等，都由红军高级人员讲授。每一堂课连续三个钟头。听说以毛主席的辩证法讲得最为动人，每次讲课专听和旁听的人都挤得满满的。

学校共分两处，一处是帅府辕，一处是东关外延河岸的大营盘内，他们的教室除开城内有一座是上大课时用的，其他全是露天下用砖垒成的课桌和课凳。他们白天上课，晚上还要开生活检讨会，间或开思想斗争会。他们每人除伙食外，另外发给三元钱的津贴。生活虽然艰苦，但比红军士兵的待遇好得多了。

当我们去参观的时候，很多同学招待我们。我们同他们一块吃午饭，一块儿谈天说笑。女同学也来了，邀我们到女生宿舍（他们一般叫做禁区）参观，并共同照了像。他们的房屋住处，

都是出乎意料的简单，而他们都能忍受得过，并且乐之陶陶，干得很起劲。这难道不是主义的信仰，促使他们的精神意志，战胜了一切困难吗？可惜的是我们去时，校长林彪将军不在，没有和他见面。

这次参观使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教室内的五张像片，孙中山先生、蒋委员长、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主席，成一字式的排列着。

#### 十四、南京的使者——军事考察团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九日—三十日）

国内和平，统一御侮，是不愿作亡国奴的中国人共同的愿望。所可幸的是在昨今两日的大会上，我竟亲身遇到了。

前几天我们会到毛主席，他就说南京军事考察团不日可到。因此我们从旁感到对于和平，南京方面似乎也一样迫切地需要。啊！历史上的斗争，形成了心理上的隔膜，周副主席虽然亲自去南京折冲，但也僵持了三个多月。现在总算获得初步成功了。昨天各机关接到通知说军事考察团下午二时可到，我于是从城外抗日大学赶回来，意欲躬亲参加这个欢迎盛会。两点钟了，在南门外已经排好了学生、部队和民众的队伍，满街上到处贴着标语，上面写的是“实现总理遗教！”“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实现民主政治！”“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拥护国共合作！”等等。其时天气很热，在烈日底下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都眼巴巴地望着，要看这个考察团的模样儿。连背街小巷的妇女小孩都站出来了。

因为汽车稽延，一直到四点才全到了。林主席代表党中央前

往迎接，带头领路，二十多个考察团员大踏步地跟在后面。再往后是部队和学生的队伍，敲着鼓乐、唱着歌走进城来，街道两旁争来围观。啊！十年中厮杀的两党，今天在共产党的首都居然有了国民党的公开使节，这是多么热烈的盛举啊！

晚上八时，在中央大礼堂由毛主席亲自接待考察团团员，并共进晚餐。餐后召开欢迎晚会。会上由毛主席致欢迎词，他说明两点：（一）有人怀疑两党合作是否有诚意，对双方都有怀疑。他的答案是敌人的挑拨，始终破坏不了共产党的和平政策，而巩固和平要用民主的方法来进行。（二）又有人怀疑两党合作，双方都是临时策略，将来不会持久。他又答复双方合作绝对能持久，因为共产党的政纲和革命的三民主义，根本点上没有分别。后由考察团涂思忠、邵华致辞，大致是对两党合作，表示万分庆幸。顿时会场内呼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的口号，真是如雷贯耳，热烈异常。夜十二时会毕。

今天是五月三十日，为了纪念“五卅”，召开大会，并把欢迎军事考察团的大会，合并在一起举行。会场布置得十分隆重，到会人数约在一万人以上。《救亡曲》、《义勇军进行曲》和《亲爱的同胞们，中华民族不会亡》等令人血液沸腾的歌曲，声声都可以送到离会场很远的地方。会开了，毛主席首先致辞。他说：我们现在最中心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打日本，救中国。现在国共双方都感觉到需要团结，这也就是为了共同抗日救国，所以愿意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下去打日本。一时拥护蒋委员长的声浪，遍溢会场。其次，为朱总司令和林主席致欢迎词。再次，为考察团的肖致平和杨××、王××等三人致答辞。大会六时散会。

够了！这两次大会中的表现，已经够使我欢欣鼓舞了。究竟

他们两方面如何研究，考察团如何报告南京，我们局外人不得而知。第二天清晨，我随着考察团的汽车回甘泉了。

## 十五、杂 记

(一九三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你们现在的生活情况怎么样？”这是我见了每一个红军同志的第一句问话。他们异口同声地答道：“现在改善了。”不错，他们的生活的确改善多了。一个某部的供给部长告诉我，他们每个战士以前所领的是：每天一斤小米，四分菜钱，和每月四毛钱的鞋袜费。而现在是：每天一斤四两大米，五分菜钱和每月一元钱的津贴。这个数目是自上而下一样的，但在中央部门工作的人员，还要更少些，每人只能领三分钱的菜钱。毛主席是个例外，一月能领五元钱的津贴，这是因为他的应酬费特别大的缘故。至于部队集体方面，一个师只有一百元的办公费，二百元的特别费和二百元的杂支费而已。至于军官个人方面每月团一级可领二元津贴，师一级三元津贴，军一级可领四元津贴。这个数目我们试拿来与国军比较比较，两者何止天壤之差。

我曾因为私人和公务方面的事情，曾经要求外交部、财政部和一些高级干部，给过我不少的帮助。只要你的话刚说完，他们的笔就在纸上刷刷地给你写好了。我初以为这种作法只限于对我们外来的人，事后询问，方知他们日常办公都是随说随作，决不拖延。一个普通战士可以直接去见毛主席提出种种请求，并可立刻得到答应，马上给你作公事。他们的公事并没有什么公文程式，也没有收发挂号等等手续，只不过是把公文写在一张麻纸上，装在信封里就得了。我看见他们每天都是五点钟起床，赶时

间办公，很少闲散休息。的确，他们每个人的工作效率，可以抵得上国军区域内几个人或者十几个人的工作成绩。

这是一个笑话，但是他们都这样地传说着：毛主席经常都在晚上办公，睡得很晚，所以早上起得很迟。这样就常被他的勤务员提出批评，这好象是世界上决不会有的事，但这正可以说明，在红军中间，自上而下，一律平等。他们中间不分阶层，一律互称同志。当我们去见林部长、博古部长等各位首长时，曾亲自见他们的勤务员在他们面前，自由起坐毫无拘束，对长官讲话，也并没有什么客气，这些我们见了是很惊奇的。他们之所谓勤务员，并不是卑贱之称，不过是分工的不同而已。他们除开倒茶点烟而外，有时还可以替长官当秘书。平时，他们可以在批评会上，批评长官的错误；战时，长官如果伤亡，他们还可以立刻代替长官发命令。虽然这样，可是他们对勤务员方面的任务，仍然是非常尽职的。

还有一件事，在去年十二月中下旬，红军刚要进入肤施县城的时候，居民家家户户恐慌了。他们恐怕共产党要实行共妻，凡是有女孩儿的人家，都连夜出嫁，但现在已半年多了，红军根本没有这样作。我曾经问过他们如何处理男女方面的关系，他们说：他们主张男女间离婚、结婚完全自由，只要到区政府或乡政府注一下册就办了。娼妓制度和买卖婚姻是他们所绝对禁止的。他们的婚姻法是一九三四年四月八日公布的，但到现在还能适用，内中将离婚后的土地问题、财产问题和子女问题，都规定的很详细。实际上他们的后方工作人员差不多都有家眷，离婚的也很少，至于对贞操观念，好象他们还更为重视，更觉珍贵。“如果在革命的恋爱原则下，守节不仅是对的，而且是非常高尚的，比



如红军的妻属，丈夫从军去，为革命奋斗，他们能守节不嫁人；又如无数的红色战士，为了革命，不方便找老婆，而暂时牺牲这一部分利益，这种为整体而尽了牺牲的道德，才是人类高尚的道德呢！”一位负责的红军干部这样对我说。

## 十六、青年歌咏团

（一九三七年六月六日）

这是一件巧事，从甘泉到郿县的途中，恰好同青年歌咏团坐在一辆汽车上了。他们的南来是为了教育突击和深入民间。

他们一行共二十多人，全都是十三、四岁的男女小孩子。他们穿一致的红军服装，显得十分活泼可爱。我在延安时，曾经看见过他们练习唱歌、跳舞，又看见过他们登台表演，令人羡慕不置。当时有人告诉我，他们就是西北青年救国会的中坚分子，自从少共中央取消以后，青年救国会就代之而起，产生了重要作用。本年三月西北青年救国会在延安召开大会时，曾决议本年为教育突击年，要作好减少文盲和唤醒民众的工作。这一次他们是实行决议，到乡间来作教育突击工作的。

到了郿县的第二天，我和他们便很熟悉了。于是我和那些可爱的孩子们，一个个挽着手儿谈话，他们都很热情地回答我。他们的队长名叫白风连，清涧人，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人很和气，但是不爱多讲话。教练员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曾经当过东北军特务团的政治员，在本年二月孙铭九事变后，就跑到延安来，担任了这项工作。其余十七、八个男女孩子大半是四川通巴一带的人，去岁随红四方面军北来的，年纪最大的才十五岁，大多数是十一、二岁。说起他们的历史来。他们都是老红军

了，他们曾经翻过雪山，走过草地；曾经放过哨，引诱过敌人；也曾经跟随部队，参加过冲锋陷阵的战斗；他们从军的历史都不下三、四年了。他们有随父母来的，也有因流浪而被收留的，但是他们的家庭，多半是一无所有了。他们天真活泼，互相嬉戏，一切行动，并不要人管束。他们每天的作息行动，都由全体开会讨论，作出决定。他们已经感到红军生活的乐趣了。

旧历端午节的那天，他们要在郾县城内作一次宣传，事先曾邀请我参加他们的集会，我就欣然允许了。在郾县县府对面的广场上，约有二、三千人赶来会场，内有全城的居民，有红军的步兵和骑兵，有我们的保安队和警察。我登台讲演了抗日救国的伟大意义以后，他们就开始演出了。他们表演了铃铃舞、海军舞、网球舞和打倒汉奸活报剧等，每一节目告毕，台下就发出一阵欢乐的鼓掌声。同时我也去后台看看，他们在那里自己化装，自行装束，十分忙碌。最使人兴奋的，就是每两个节目中间的休息时间，他们都在后台齐声唱歌，伴以美妙的音乐。有《镰刀歌》、《锄头歌》、《抗日义勇军歌》等，歌声一直从后台送到场内每个听众的耳鼓内，声调悲壮激昂。尤其是当他们合唱《苏联进行曲》的时候，真可以使人血脉膨胀，精神振奋，真不愧是世界上的一曲名歌。

在延安我曾看过他们两次表演，在郾县我又看了一次，深感他们表演的全是革命的新艺术。第二天他们步行返回了延安，我对他们实在有些恋恋不舍。

## 十七、旧坟与新坟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二日）

我在延安停了一个星期，归途中在甘泉、鄜县和洛川，都有短期的逗留。凡是这些地方的古迹名胜和近年来的战事痕迹，我都亲自前往访谒，然而全是极目荒凉，凄惨得使人不敢留恋。

在这许多县的城外，第一件触及眼帘的事，便是许多的新坟和旧坟，在每个旧坟前的小块石碑上，刻着同治十年前后死去的湖南人和湖北人的名字，为数之多，颇为惊人。在新坟上多用木牌作标志，上面写的全是东北人的名字，是从一九三五年到今天新死去的，为数不亚于湘军。陕西的两个大时代，恰好就被这两个地方的雄鬼代表了。

“回乱”是近代史上回族反抗压迫的一次大骚乱，被湘军所镇压。而近几年陕北的“剿共”，唯一尽过力的那就是东北军，所有杂牌部队如八十六师、八十四师和中央军的各个军团，除开运送枪械和军需物品外，决没有和共产党正面接触过。东北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撑持了二年有余。他们受尽了艰难和痛苦，而得到的却是他们意想不到的下场。从肤施到洛川沿途漂泊的东北人，确是难以数计。挑水的、卖油茶的，开饭馆的，开澡塘的，多为东北军的副官和连排长。我曾经和他们亲切接谈过，他们追诉起当年的战争状况来，确实可使人泪下。一九三五年秋天，肤施刚刚收复，甘泉又被包围了。一一〇师用急行军的方式，以救肤施之兵，再折回来救甘泉。不料甫到劳山，就全军覆没了。何师长的自杀，是东北军的一个大损失。牛师长从甘肃开来解陕西之围，就在直罗镇，恰遇红军十五军团，一〇九师也就在密集

的机关枪下，全都被歼了。听说当时牛师长身边只留下几十个人了，被围在一个寨子上，死守不屈。结果牛师长的尸体，被红军恭恭敬敬地给送回来了。一九三六年肤施以上的大路，已经水泄不通了。在一九三五年开过去的一二九师，前进不能，后退不得，既没有饭吃，又得不到棉衣穿，眼看就要困死了，于是冒着危险，由延长、延川一带荒僻无人的山径小路绕回来，总共走了一个多月。春三月了，还是穿着单衣，听说手上的指头，都给冻掉了。张副司令亲自坐飞机不住地来往这一带，在甘泉、延安、甘肃庆阳，察看地形，指挥命令；并且用飞机不住地给士兵送面包，送给养，用种种方法鼓励他们，他们那时也真是万众一心，盼望着能有一个较光明的前途。

陕北到处都是高峻的山峰，决没有五里地的平路，山头上无论远近，都有东北军修筑的碉楼，平地上只要是要冲所在，总有东北军的防御工事。总而言之，凡是人迹能到之处，都有东北军辛苦的痕迹，有时一座大庙全拆了，再由军士把砖瓦木石，运到很高很高的山头上，做成很坚固的碉堡，但是现在又被红军一个一个地拆除了。

在旧军队中，老百姓比较喜欢东北军，他们经常帮助人民耕种收获。不料这样经过了二年余的时间，前途反而愈趋暗淡。于是他们不得不由怀疑生厌而走向灰心失望了。他们一部分搞着枪上山当土匪去了，一部分脱下军衣过漂泊生活了。听说当东北军开出潼关的时候，他们所有的人数已经不到入关时候的四分之一了。

在这许多新坟底下的东北军士兵们，你们已经是永远长眠的望乡鬼了。我深深地为你们叹惜，叹惜你们和那些为清廷效忠的

湘军们，竟然在地府之中一起哀叹了！

## 十八、收麦声中

（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日）

由郾县南行四十里，就是交道原，这里仍然是红军防区，红独立师就驻在这里。由此再往南走，就进入我们的防地了。这一天，我们骑着红军给我们预备下的马，沿着洛河南下，马在半山沿上行走，足底下踏着峭壁深崖，下面流着波浪滔滔的洛河。我们骑在马上，真是提心吊胆，假若一不小心，就有随波逐流的危险。在河岸的那边有一眼望不尽的枣树林，蜿蜒好几十里，风景煞是好看。过了芥子河，就爬上了洛川的高原，于是我们换乘汽车，在当日下午二时抵洛川城。显然，这里是红区以外的另一种风貌了。

这里的驻军是十七师的骑兵团。他们的军纪的确比以前的十七路军好得多了。他们凡有所需，都是请县政府给他们转办，而不是直接向人民索取了。人民对军队已减少了过去的许多畏惧之心。在街上面贴着许多布告，是骑兵团愿意帮助人民割麦子，并且声明这是军民互助，并不要人民用饮食茶水招待。这是在和友军接触以后，我们的军队所得到的进步！此间是红军往肤施运粮必经之路了，他们在南城根设有红军联络站一处，我们在各方面对他们有很多的协助。两方相处非常融洽。这就可以证明国共两党只要坚持团结抗日，红军和国军在交往中就会互相观摩，互相促进，从而消除对立和同化的危险。

这里是三区专员公署的所在地，也是陕北的政治中心。因为年末游击区域的扩大和“剿共”莫大的损失，现在时局虽告和

平，而地方上的难题仍然是重重叠叠。第一个问题就是粮价的飞涨，麦子从每石三元，涨至每石二十余元，杂粮从每石二元涨至每石十余元，差不多家家户户都愁着没得饭吃。第二个问题就是地方武装过渡膨胀，每个县都组织了庞大的保安队，而每个乡又有很大的保甲队。过去是利用他们打共产党，而今却又无法收拾他们了。一位负责政治的官员曾经对我这样说：“现在政治上的阻力已不在外而在内；已不在任何对方，而在我们本身了。”

虽然这样，地方上却很安静。因为友军的帮忙，社会上秩序几乎达到了夜不闭户的程度。“这是陕北最平静的日子，二十多年以来，陕北没有一天象今天这样地平静过。”老百姓都这样对我说。他们虽然家中缺着粮吃，但他们毫不痛苦，因为他们可以在平安中度过他们的穷日子；不象前几年奔走逃亡，时时刻刻有生命的危险。况且夏麦正在收割了，再不过旬日，就有新面吃了。

在洛川，我每天见到的是农夫收麦时繁忙的景象，听到的是收麦时的快乐歌声。遍野的农夫农妇夹着许多小孩，有割麦的，有拣麦的，他们每人的脸上，都在欢笑着。

### 十九、骑兵团的训练

（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一日）

在洛川搞骑兵训练团的是一位孟团长，他曾经当过步兵训练班的教育长。有一次我遇到了他，他很恳切地问我：“我们的军队缺点何在？在实质上 and 表面上有些什么应该改进的地方？”他真是不厌其详地虚心下问。不久以后，我和他们全团的官长们都熟悉了。他们作风谦虚，对人和蔼，已一改过去十七路军的作风；

虽然还没有象红军官长们的平民化，但这是进步的开始。我和他们几次谈话以后，知道他们正在对全团士兵施以一种短期的训练。

他们是今年二月从鄂县开来此地驻防的。因为过去十七路军的军纪不佳，失去了许多民心，所以孟团长开始拟了一个训练纲要，以三个月为一期，据孟团长说：这是一个初步的训练纲要，毕业实习以后，将来还准备让他们进行较高级的第二期训练呢。

他们全团六连，三连驻洛川，两连驻中部，一连驻宜君。从本年三月起开始训练。他们对于当前中国的政治环境和国际间的斗争情形是十分注意的。他们除开进行军事知识和国文基础教育以外，每周还有精神讲话，拟口号，记口号等科目，差不多经过三个月的训练，士兵和官长的脑筋，都焕然一新了。

当我来到洛川时，正是他们举行毕业考试之期，对考试他们特别认真，全团官长一起动员。术科考试在东关飞机场举行，学科考试就借学校教室。他们的试卷我全部看了一遍，一般都很不错，甚至也有超过中等学校程度的。国文试题是：《试述你入伍的志愿》，世界知识试题是：《世界和平战线和侵略战线都是哪些国家》，大部分都能答出同盟国和协约国的国家名字。如此对士兵普遍的训练和军队质量的提高，不只在十七路军是破天荒的，就是在所有国军中也是绝无仅有的。洛川考完了，孟团长亲身率领他的总部人员到中部检阅考试，我也和他们乘车偕行。中部考完了，我又和他们相偕到了宜君。沿途我都向老百姓询问他们对于十七路军的观感，他们一致的回答是：现在的十七路军比过去好多了。

还有他们对于士兵娱乐方面的设备也十分注意。他们选了一

些士兵，组织了一个业余剧团，也排演了一些新剧，每到星期日就给士兵公演，借以休息精神，我曾被邀请前往观演数次，技术中常，但也可资娱乐，现闻他们又募集到几百元的款子，预备扩充组织，添购服装道具，为士兵们增加一些娱乐，以加强他们的精神食粮。

## 二十、谒 黄 陵

（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当我们行抵中部的第二天清晨，就登桥山谒黄陵，我们共四个人。除我而外，一位是艾县长，一位是驻军李团副，一位是当地绅士刘君。当我们穿过耸密的柏树林，爬到将近山顶的时候，面前突然现在一座茅亭，茅亭后面就是一座高大的土坟。“古轩轶黄帝桥陵”七个大字，赫然跃入我们的眼帘。啊！这就是黄帝陵了。

黄帝，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在四千六百余年以前，正是草昧初开，昧氓芜杂的时候，他就在这地球的东半壁，独树一帜文明的火炬。他开辟了中华民族的壮丽山河，他创造了世界文明的伟大前导，他的功绩真可与宇宙齐名，永垂不朽。他真是太古的巨人，凡我中华民族，堪以自豪于世界各色民族之前。我们今天特地前来虔诚地敬谒，我们虽然没有具备三牲醴祭，但是我们用了自己心上的一点赤血，来祭奠我们所要祭奠的祖先，我们心是虔诚的，一点都是不假的。

我在这陵的四围绕行了一圈，我突然想到五千年前的景况。那时我们先民的一族，游牧于黄河流域一带，披荆棘，斩草莱，且辛且苦，同化教育了反抗我们的人们。我又想到阪泉鏖战，另



一民族是蚩尤所率领的，对我们进行挑战；逐鹿的平原草地上，变成了巨大的战场。我们祖先利用了指南针的发明，战胜了异民族的进攻，于是我们才有了四千余年的冠盖衣裳，制度文明，我们真是天之骄子，历来都是站在世界各民族的指导地位。不料近百年来，大好山河，一再割裂，我想，黄帝，我们的祖先，若果有灵的话，也要对不肖的子孙以斥责和训导呢！

陵的对面，就是一座极高的土台，上面有个小亭，新近被风刮倒了，听说那就是祈仙台，汉武帝征朔方，还过此地，筑台求仙，因之为名，我们攀登台顶，极目四望，全桥山的面貌都历历如在眼前了，我们四人就在祈仙台顶上，听艾县长给我们讲今年祭陵的故事了：

三月十二日，正是国共合作会谈开始不久以后，南京派来了祭陵的几位中央委员，就在这祭陵来的一般大老以内，还来了一个奇怪的老头，那就是林祖涵先生。他是代表中国共产党祭陵来的。他还不避风尘地从延安跑到西安，又从西安来到中部。他说他们也是黄帝的子孙，他们也有拜谒祖先的权利。其实林老和那些大老，全是曾经在一条道上偕同革命过的，不过因为政见的不相同，在中间分手走过几年，而现在他们又携手共赴国难了。他们还带来祭轩辕帝的祭文，上面的辞句，沉痛哀切，但也光明磊落；并说在黄陵底下的大团结，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决不会被人消灭。就在这一天晚上，他们全都宿在中部县县政府，并且整整谈了一夜，但在第二天清晨，这位老翁又坐汽车回延安去了。

大家听了以后，都默默无言，内心很受感动，日已正午了，我们走下了祈仙台。四个人在陵前合摄一影，用作纪念。

## 二十一、抗日的枪声打响了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四日)

芦沟桥一声枪响，惊醒了全国的人民，二十九军打响了第一枪，顷刻之间，全国大地风起云涌，到处爆发了抗日的呼声。宜君县因为交通闭塞，消息欠灵，直至今天方才知道了“七·七事变”，日寇已确实向我进攻了。我当时血脉膨胀，怒火填胸，认为这是动员全国人民抗日的最好时机。抗日即生，不抗日即死，事关全民族的生死存亡，中央和地方不能为了党派私利，再闹意见了。我于是找见驻军史连长和李县长商量，他们和我的意见不约而同，认为马上应该搞一次抗日大宣传。当时我即请高警佐通知县党部和救国会，一起来到我这里开会。

救国会，是延安的党务组织。实际它也兼办延安和此地一切事务的交涉，好象是红军驻宜办事处。前两天，陕西省党部为了恢复宜君县党部，也派来两个干事，办理筹备事宜。因为没有地方，他们两方就住在一块了。他们都是党员，一方是共产党员，一方是国民党员。过去他们互相仇视，现在却十分和睦。他们每天在一个屋内谈话，晚上在一个坑上睡觉，这是一般人过去意想不到的，而今天他们竟成了国共合作的缩影。高警佐去了不久，他们两方都来了。

延安派来的救国会主任是位杨同志，县党部干事是徐同志和张同志，他们也听到了这个消息，也和我一样激昂慷慨，激烈陈词，我告他们说现在打开了，既然打，就要打个他死我活，拼到底，敌人虽然强大，但是只要我们全民总动员，不怕牺牲流血，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我们共同决定在最近期内召开一次抗日

宣传动员大会，并请他们两方联名召集各界代表，先开一次筹备会议。

下午二时，筹备会在县府开会了。会场空气异常热烈，各项议案都很顺利地通过了。他们两方都拟稿发表宣言，唤醒民众，抵抗侵略，县党部担任致电二十九军，声援他们誓死抗敌；救国会担任致电中央，请求政府发扬民主，全面应战。并定于阴历十五日城内集会之期，开正式宣传动员大会。

第二天的下午，周小舟、张经武、边章五三位先生来到了。他们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前往西安接洽抗日的。由延出发本来坐的是汽车，要当日赶到西安，因为到中部后，汽车路坏了，就乘马车来到宜君。然后改乘汽车前往，我也顺便乘他们的汽车回到西安了。在路上他们告我说：延安八日就得到了日寇在芦沟桥开衅的报告，当晚发表了抗战宣言，并致电委员长，促其即刻出兵宣布对日作战；同时并下令党的全体部队和后方工作人员，紧急准备，听候命令出发。闻委员长的动员令，九日已经发出，这时同仇敌愠之心，已遍于全中国，不管是中央、地方，还是各党各派，都是共同要求抗日的！

我想，在国共两党团结抗日方针的指导下，全中国四万万同胞奋起抗日之时，也就是夺取抗日最后胜利之日！

# 送往草岚子监狱的两封信

——孔祥祯同志谈“六十一人”出狱

本刊记者 石 肖 岩

---

十年内乱之初，在五花八门的“小报”上，出现了一条骇人听闻的消息：“一九三六年六、七月间，刘少奇发出了‘狱中共产党员可以履行反共自首手续’的黑指示。……这个黑指示，通过林枫和徐冰、孔祥祯写成信件，由魏文伯介绍魏茂林送进草岚子监狱中，……叛徒们在狱中看到刘少奇的黑指示以后，正中下怀，欢喜若狂，……分批从敌人的狗洞里爬出来了。”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轰动全国、震惊海外的所谓“六十一个叛徒”案件！

---

事发的一九三六年，距今已整整四十五年了，和“六十一人”案直接有关的人，张闻天、刘少奇已经去世，徐冰身亡，殷鉴早歿，魏茂林成为古人，柯庆施死了，唯一知道内情的，只剩下了一个人。他，就是中纪委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孔祥祯。为了了解这一段历史，我特地访问了这位年已古稀的长者。

孔祥祯，“文革”前任第一轻工业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他的家，座落在西城一个幽静的院子里，当我叫开门，步进会客室，一下就怔住了：孔老已经瘫痪了！他高高的个子，不能直立，倚靠在一把长背椅上。他的夫人姚汝安同志愤怒地告诉我：“‘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为了诬陷刘少奇等同志，在草岚子监狱问题上大作文章，不遗余力地威逼、迫害孔老，致使他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后来，一次中风，他就半身瘫痪了。……”

孔老以坚强的毅力，用不很清晰的山西口音，把有关情况和盘告诉了我。

### 保 外 就 医

一九三〇年，刚刚从苏联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回国的孔祥祯同志，担任了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一年后，他调任唐山市军委书记。一次，他赶赴北平，向河北省委军委书记汇报工作，不幸被捕了，押到了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因设在草岚子胡同，故又称草岚子监狱）。

惨无人道的狱中生活，折磨着每一个革命志士。孔祥祯的右手臂上长起了一个拳头大的脓疮，狱医草草开刀，前后一年不得愈合，在无法继续治疗的情况下，三二年十二月，狱方不得不同意他保外就医。经组织安排，由地下党员、北平榆林会馆馆长出面作保，孔祥祯出狱了。

在党的组织“互济会”的接济下，孔祥祯在德国医院医治了半年，手臂伤口逐渐愈合，他又参加了党的秘密活动，奔波于山西、北平等地。

## 一次意想不到的任务

一九三六年初，孔祥祯由北平中国大学教授、实际上是在党的北方局工作的徐冰同志（当时叫邢西萍）单线联系。这时，孔老经人介绍，已经在一个满洲国大汉奸的家里任家庭教师，教三个娃娃，功课不多，掩护条件相当好，他按照规定的时间常在徐冰家碰头。徐冰家是高官府第，在家排行老三，大哥做过安徽省民政厅长。特别巧的是，徐、孔两人同在莫斯科读过书，早就认识。

孔老说：“记得他家在东城，是个深宅大院，红漆大门，黄溜溜的铜狮门环左右各一。我每次去，总是先拍拍铜环，叮咣作响，待家人开门后，问：‘三爷在家吗？’家人通报后才能进入，真有一股气派哩！院内花木葱茏，幽雅清静，徐冰住在南边的厢房，里面摆满了书籍、家什。”

孔老接着告诉我，一次，他在徐冰家接受了一项意外的任务。“那是七月里的一天，气候燥热，阳光灼人，我照例到徐冰家去找‘三爷’，他一见我就曳着我的胳膊，匆匆忙忙地走进内屋。”

徐冰突如其来地说：“现在抗日形势甚好，党需要一批干部，但是干部很少，没有办法。听说你过去呆过的草岚子监狱里还有几十个党员，你有没有办法让他们出来？”

孔祥祯听后先是震惊，后感到毫无可能，回答说：“这怎么行呢？刑期不满，敌人怎么能放他们出来呢？何况刑期满了，不登《反共启事》，照样出不来呀！除了一条，登《反共启事》，声明从此不再做政治活动，那也得有人保咧！”

徐冰好象心里有数地笑笑，对孔讲：“我已经接到上级指示，说中央有决定，可以让他们用自首方式和登报启事的办法出来，你可以不可以把中央对他们的这个指示送去呢？这是一件极重要的事，无论如何要想办法完成。”

孔祥祯说：“虽然我在狱中任过支部书记，对他们熟悉，但已几年和他们没有联系了，他们怎么会相信我呢？我知道这些同志在狱中立场是很坚定的，你说用自首登报方式出来，他们能干吗？再说，这对他们是个极其严重的政治生命问题，必须上级确实负责才行。”

徐冰马上接上说：“这的确是中央的指示，不然我怎么敢跟你说呢！你要知道，这就是假自首，中央一定会在政治上负责的。”

孔祥祯的疑虑，在徐冰的解释下，渐渐地消去了，他说：“既然象你说的这么绝对可靠，那我可以去做。不过，我和他们长期没有联系，又怎么能把信送去呢？同时，狱内的党组织有无变化，我也不知道。”

徐冰在屋内踱了几步，仔细考虑了一下，说：“你先去想想办法再说吧。”

就这样，一次谈话结束了。孔祥祯接受了一项他没有想到的，后来竟在十年内乱中引起轩然大波的“特殊任务。”

### 邂逅街头

孔祥祯十分苦恼。

他离开牢狱毕竟太长了，现在情况生疏，手无“关系”，甚至左右环顾，连个亲友都没有。但是，这是组织上交下来的一项

任务，党一定也有所考虑，现在再没有能比自己更合适更了解狱中情况的人了。怎么办？孔老想：事情决不能草率去办，再多想想办法。

他苦思冥想，迈着沉重的步子，在北平的大街上踟蹰、徘徊

……

“一次十分凑巧的机会，使我获得了希望。”孔老兴奋地说：

“一次我正在街上走着，忽然有个面熟的人在人群中闪过，我仔细地一看，那不是魏文伯（当时叫万曲非）吗？他是反省院内的一个老病号，常常大口大口地吐血，我在狱里和他认识的。……不错，他是一个湖北人。

“我急忙赶上去，偷偷拍了他一下，顿时我们俩的目光碰到了一起，既惊奇又会意，两人的手不由自主地握上了。路上谈话实在不便，他请我来到了附近的东来顺饭馆，要下了两大盘饺子。”

魏文伯同志也是因病被保释出狱的，他告诉孔祥祯，狱中情况无大变化，大致还是过去的样子。由于当时的条件和纪律，两人都不便谈自己有无党的关系，孔祥祯问他说：我有一些东西想送到狱里，不知你有认识的人没有？魏回答说：有个族侄，叫魏茂林（当时叫王伯平），他和狱内的一些看守人员有关系，可以帮忙。孔祥祯忙问：他可靠吗？能不能往里边送信呢？魏说：他是同情分子，非常可靠，可以帮助送书报、送信。听了这些话，孔祥祯心中大悦，和魏文伯同志匆匆吃完饺子，就一同奔向魏茂林的家。

魏茂林确如魏文伯所说，他一口答应完全可以帮忙。当然，送什么性质的东西，魏氏族侄两人是不得而知的。



## 第一封信

“当我把这个情况告知徐冰后，他高兴地直摇我的臂膀，叫我先与狱内联系上，然后再送中央对他们出狱问题的决定。”说到这里，孔老笑了，苍老的面颊绽开了几道重纹，可以想到，四十五年前，他们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多么兴奋啊！

孔祥祯坐在徐冰的桌前，由徐口述，他作笔记，一封以孔祥祯名义给殷鉴的信写出来了。殷鉴，是孔老出狱后的党支部书记，据魏文伯说，他走时，殷仍是担任这个职务。

由于光阴流逝了几十年，今天，孔老只记得信中写了这样一些内容：目前抗日运动普遍高涨，许多工作都要人去做，我与家内（指党）联系上了，家里让我营救你们，如果平津失陷于日本人之手，再办就困难了。意思十分含蓄。

信送出约半个多月，没有任何回音，孔祥祯心急如焚，他找到魏茂林，证实信绝对没有失落，肯定送到了殷鉴之手。另外，从过去狱中的一些情况分析，看守人员时常受到我们的“照顾”和感化，他们乐于帮忙，甚至见上边有人来，还帮助打暗号，因此，这方面出问题的可能性也不大。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这时殷鉴同志已不是支部书记，改任支委，他接到信后，交给支书薄一波同志和另一名支委刘澜涛同志，经小范围研究后，认为来信可疑，特别是感到党中央、北方局不会作出这样的指示，而十分担心，这是敌人设下的圈套。有的同志还发出疑问：吴维德（孔祥祯在狱中的名字）是个什么人，我们也不能完全相信。

就这样，第一封信犹如泥牛入海……

### 第二次直截了当的指示

孔祥祯同志将第一封信的情况报告了徐冰，徐又询问、了解了一些情况后说：既然送信的人可靠，殷鉴又是支部书记，那么，干脆把中央对他们的有关指示送去好了，并告诉他们，这是党的决定，要坚决执行组织命令。

孔祥祯回到住处，按照徐冰所说，马上将第二封信写就，着魏茂林立即将它再次送交殷鉴同志。

这封信，据狱中同志回忆，它明确地代表组织作了如下指示：根据新的政治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并且考虑到你们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党认为，为了争取你们尽快出来为党工作，你们不但可以，而且必须履行敌人规定的程序出狱。这样做是符合党的最大利益的。党认为你们过去坚持不在敌人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做得完全正确，但是，你们那时的斗争，还是在小圈子、小范围内的斗争，现在要求你们出来在广阔范围内作斗争。……这是特定的条件下所做的决定。党现在向你们作出保证，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中央完全负责，政治上一律不视为自首叛变分子，组织上不歧视，你们要相信中央。如果你们接到此信后，仍然拒不执行，那你们就要犯严重的错误。孔老说：“为了防止意外，这一次我还把登报、发启事以及其它一些内容写成了俄语，我知道，殷鉴在苏联留过学，他都懂。”

这时，狱中支部又一次改选，支书是赵缚，支委杨献珍、张友清，他们开会讨论了这封信，一致决议准备执行，并将内容交全体党员充分讨论，得到了一致同意。

八月底，第一批九位同志出狱了，薄一波、周仲英、董天知同志径直和孔祥祯联系。孔老说：“当时狱中同志的警惕性还是非常高的，先出来的三位同志由我接头，为使他们相信，我又约徐冰在太庙（今劳动人民文化宫内）茶馆里和他们分别见面。”后来，党组织又根据狱中同志的联络暗号，送去了一只鸡，表示的确是组织上指示出狱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周仲英等五十二位同志（并非六十一人），终于陆续出狱，他们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分别奔赴到抗日救国的新的工作岗位。

### 留在历史上的话

孔祥祯同志叙述完这一段经历，十分感慨地说：“过去很多不清楚的情况，包括‘文化大革命’中不清楚的情况，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了。这件事的初因，是一九三五年底，刘少奇同志作为党中央代表到北方局主持工作，当时在日寇侵占华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北方局为了开展工作，解决干部缺乏的问题，拟出了要关押在草岚子监狱的一批党员履行手续出狱的意见，并报告了党中央。时任总书记的张闻天同志代表党中央批准了这个意见。毛主席也知道。这个决定，是由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转告徐冰办理的。”

孔老又讲道：“今天，我仍然和过去的认识一样，经党中央决定做的指示，就应该坚决执行，尽管我因为写过那两封信，在‘文化大革命’中吃了一些苦头。……”

孔老的话使我想起了“揪叛徒”口号喧嚣尘上的日子，早在一

九六六年八月，康生就把这一早已经中央结论的所谓“六十一个人”的问题重新提了出来，江青、陈伯达、谢富治之流到处支持一些不明真相的红卫兵揪斗这批党员。

我还想起了十年内乱中的一份“小报”，那上边有“揪叛徒”赫赫有名的南开大学造反派的一篇“揭批”文章，它写了这么一段话：“狗叛徒徐冰还狗胆包天，竟往柯庆施同志身上栽赃，胡说刘少奇对监狱的罪恶黑指示是通过柯庆施同志传达的。现在有些单位竟然轻信叛徒的口供，不作周密的调查研究，公然把柯庆施同志打成‘叛徒’。”……这短短几十字，今天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都多么发人深省啊！

我向孔老告辞时，他意味深长地说：“斗争并没有随着历史的进程而简单结束，一九七八年夏天，江青一伙早已完蛋，但是是一些专案人员秉承个别人的旨意，还多次来纠缠我，要我在一份结论上签字，承认我当时是执行了刘少奇的指示写信的。我一听火冒三丈，我明明是执行徐冰传达的中央指示，怎么说成是刘少奇一个人的指示呢？何况我当时还根本不知道刘少奇这个人嘛！他们显然是留了尾巴，以为刘少奇同志平不了反，以后还可以算账。由于我跟他们一见就吵，他们就打电话劝我爱人做工作，竟说什么：承认刘少奇的指示也没有关系嘛！手段极为卑鄙，我爱人当即在电话中断然拒绝。”孔老接着说：“真理的阳光是每个人的巴掌也挡不住的，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所谓‘六十一个叛徒’案件就彻底平反了，历史终于还了它的本来面目。”

离开孔老的家，我的脑中还萦绕着孔老的声音：“往事几十秋，昔人多作古，亲身经历其事者，一人幸存，我若不说，谁还能详细说出这一事件的真相呢？”

# 红四方面军为什么要撤出鄂 豫皖革命根据地

谭克绳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位于大别山区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立的时间较早，发展规模较大，坚持的时间也较长，成为仅次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一块较大的革命根据地。可是，由于张国焘推行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红四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失败，并于一九三二年十月被迫撤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从此，大别山区人民进入了艰苦斗争的历史阶段。

对于红四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军事行动如何评价，过去人们大都没有或不敢明确地加以肯定。如有的说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过早”，有的却说是“西逃”。看来，这些说法都是不符合历史真实情况的。尊重历史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态度。我们不仅看到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中起了重大作用，而且也应该看到它在特定的条件下，实行外线作战也是必要的。本文拟对这个问题作一个初步探讨。

如何正确评价红四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军事行动呢？我们的回答：是一次著名的西征。为此，就需要详细考察当时的历史条件，才能明白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为何要采取这一重大的战略决策。

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们党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经验，深刻指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张国焘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期间，特别是在反敌人“围剿”斗争中，常常表现两种倾向，时而轻视敌人，时而为敌人所吓倒。一九三二年六月，敌人积极准备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六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会议，确定这次“围剿”的重点为鄂豫皖、湘鄂西两块革命根据地，以解除红军对武汉的威胁。蒋介石为扑灭鄂豫皖根据地，设“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于武汉，由他亲任三省“剿匪”总司令，并调集了二十六个师零五个旅约三十余万人，而且在战术上改变了过去此进彼退易于各个击破的弱点，采取“纵深配备，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的作战方针，妄图把红四方面军“聚歼”于长江北岸。

敌人这次“围剿”，形势是严重的，但打破敌人“围剿”的条件是存在的：“我军取得第三次反围攻的巨大胜利后，士气高涨，部队壮大，械弹充实；根据地猛烈扩展，使我们有了更广阔的回旋余地，特别是有广大群众作依靠；而敌人屡遭挫败，必有余悸。”<sup>①</sup>如果主观指导上正确，打破敌人的“围剿”是可能的。但是，张国焘这时却为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头脑，

<sup>①</sup> 徐向前：《鄂豫皖红军的反围攻斗争》。

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还在黄安战役<sup>①</sup>胜利后不久，张国焘的左倾机会主义的形势估计，便明显地暴露出来了。一九三二年一月，他在鄂豫皖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上宣称：“估计国民党主力只剩下七师人，其余的都是杂色部队”，“红军有这样力(量)，已经不论多少敌人都不怕了。”<sup>②</sup>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军进攻上海后，南京的国民党政府被迫迁都洛阳。在这一新的情况下，更使张国焘等人头脑发热，他们不承认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敌强我弱这一基本特点，和“围剿”与反“围剿”长期反复的规律。二月十七日，中共鄂豫皖省委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紧急任务决议》中，提出了“偏师”说，认为“国民党政府的迁都洛阳……表示国民党由于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失败，已经成为帝国主义所斥逐的走狗，或者宁可说是降了级的走狗。不过降级都是地主、资产阶级所欢迎的，因为从此在进攻苏区与红军的战场上主要的火线，将由帝国主义者所直接担负，而国民党的洛阳政府和其他军阀政府，只担任偏师的任务。”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党组织面前的“第一件大事可就是我们快要和帝国主义者直接战争。”张国焘鼓吹的“偏师”说“大”得出奇，连当时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的党中央，也批评为“对于反动统治的崩溃的程度的估计是过分的，以为国民党政府及其他军阀政府在进攻

---

① 黄安战役是红四方面军成立后第一次进攻作战。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日，我军以八个团的兵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发起黄安战役，其目的是歼灭守敌六十九师，夺取黄安城，以打乱南线敌人的“围剿”部署，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这次战役历时四十三天，活捉六十九师师长赵冠英，共歼敌一万五千余人，内生俘近万人，缴获迫击炮十余门，电台一部，各种枪枝七十余件。

② 《鄂豫皖苏区省委报告》，一九三三年一月五日。

苏区红军中只担任偏师的任务，这是不顾事实的胡说。”<sup>①</sup> 尽管如此，在当时条件下，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党中央不可能纠正张国焘的“偏师”说。相反，都在红军不断胜利的刺激下，张国焘的左倾机会主义观点，仍然在继续发展。

苏家埠战役<sup>②</sup>结束后，蒋介石正在调兵遣将，大军云集汉口等地，准备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大举进犯。可是，张国焘等对于新的反“围剿”战争毫无思想准备。六月十九日，中共鄂豫皖分局在新集市召开各机关团体党团活动分子报告会，其中心内容不是动员反“围剿”，而是根据张国焘的“偏师”说，继续向敌人进攻。报告中把蒋介石亲自组织的第四次“围剿”，说成是“敌人大崩溃”的表现，只是“集中所有残余力量”来挣扎，认为现在“从武装力量对比来说，我们占了优势”，战争已转变到“决胜负”的时候了。报告会上除提出一个“扩大三万红军，准备三万石粮食”的空洞口号外，根本没有什么具体的准备。在这一错误思想指导下，决定了红军打武汉的行动方针。六月二十五日，我军攻下鸡公山，歼敌三十五师一个团。七月初，鄂豫皖分局在夏店召开会议，讨论军事行动方针。会上，徐向前，陈昌浩两同志提出因部队已转战七个月之久，亟需休整，应暂时停止进攻作战，将红军主力集结于适当地区待机，并抽一部分兵力配合地方

① 《中央为反帝问题致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一九三二年三月六日。

② 这次战役从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开始，到五月八日结束，历时四十八天，共歼敌三万余人，内俘敌总指挥厉式鼎、五十七师代师长兼一〇七旅长梁鸿恩、十九旅长李式龙、二十一旅长李文斌、一三六旅长王藩庆、一三七旅长刘玉林等五个旅长和十一个团长以下官兵两万余人，缴获步枪一万二千余支，机关枪一百七十一挺，各种炮四十三门，电台四部，解放了淅河以东广大地区。这次战役是在徐向前等同志直接指挥下，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军获得的一次空前的辉煌胜利，在红军战史上也是少见的。



武装肃清根据地内小块白色区域的反动武装，以便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对付敌人的“围剿”。这是扭转战局、转危为安的正确意见。但是，张国焘竟加以拒绝，仍然坚持“不停顿的进攻”。七月上旬，敌人开始进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奋起反抗，给敌人以严重的打击。冯寿二、七里坪两次激战，击溃了敌第二、六两个纵队的先头部队，重创蒋介石嫡系第二、十两个师，共计杀伤敌官兵五千余人，缴枪三千余支。但因张国焘战略指导上的错误，我军苦战两个月，未能扭转战局。九月上旬，红四方面军被迫转战皖西。在敌人前堵后追的严重情况下，张国焘开始由轻敌、狂妄自大一变为惊慌失措，说什么“今天打出了一个厉害的敌人来了。”“红军只可打一仗，就没有打第二仗的力气了。”<sup>①</sup>九月中旬，他两次打电报给党中央，要求“紧急动员各区红军及工农群众起来策应。”当时中央局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同志及时复电，明确指出：“此次敌集兵力，分进合击我鄂豫皖苏区，整个形势已不同于去年，但其战略战术颇似去年三次‘围剿’对付中央苏区之并进长追，并益以坚守据点，稳扎稳打。”“因此，我们建议红四方面军目前应采取相当的诱敌深入到有群众工作基础的，地形便于我们的地方，掩蔽我主力目标，严格的执行群众的坚壁清野，运用广大的游击队，实行四面八方之扰敌、截敌、袭敌与断绝交通等等动作，以疲劳与分散敌人力量，而不宜死守一点，以便利敌之分进合击。这样，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猛烈打击与消灭敌人一点，迅速转移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

---

<sup>①</sup> 《鄂豫皖苏区省委报告》，一九三三年一月五日。

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敌人‘围剿’”<sup>①</sup>。

可是，张国焘没有采纳这一正确意见来挽救危局。这时，他已失去了打破敌人“围剿”的信心。在燕子河地区召开的干部会议上，张国焘先主张“南下袭英山，建立新的根据地。”后又提“出潜（山）、太（湖）打游击”的计划。由于张国焘的这些错误主张遭到沈泽民、王平章、甘济时、蔡申熙等同志的坚决反对<sup>②</sup>，于是，十月初，红四方面军经英山、罗田再次西进，返回黄安河口地区。这时候，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已损失了六分之五，黄安、商城、霍丘、英山四座县城相继失陷，根据地的重要城镇如新集、七里坪、金家寨、麻埠、独山、燕子河、宣化店、张店等全部被敌人占据。在此危急关头，红四方面军往何处去，成为必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十月十日（一说十四日），鄂豫皖分局在河口北的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参加这次会议有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徐向前、徐宝珊、王平章、吴焕先等。这次会议，围绕着红四方面军要不要转入外线作战和在内线留下兵力等问题开展了激烈的争论。在讨论红军是否要转入外线作战问题时，张国焘认为：现在第四次反“围剿”已经失败，敌人力量大大超过红军，革命根据地主要地点被敌人占领，红军大兵力回旋已无余地，难以粉碎敌人的“围剿”了，只有跳到敌人包围圈外，才能保存力量。徐向前、陈昌浩等同志，鉴于以前几仗未打好，敌人重兵云集根据地内，红军在内线作战回旋区域很小，因此同意转移外线作战，以调动歼灭敌人，待机打回根据地。而沈泽民同志则不同意红四方

① 《周、毛、朱、王对红四方面军冲破敌人四次‘围剿’的指示》。

② 参见《鄂豫皖苏区省委报告》，一九三三年一月五日。

面军离开根据地，要红军留在当地分散游击，以待时机。会上，这种意见占少数。其次，讨论在内线留下兵力问题时，陈昌浩同志主张把红二十五军的第七十三、七十四两个师带走，只留下第七十五师。王平章同志则主张留下第七十四、七十五师，带走第七十三师。经过讨论，会议最后决定：（一）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红四军的第十、十一、十二等三个师和红二十五军的第七十三师及少共国际团，“暂时离开苏区”<sup>①</sup>，赴京汉路向西转移。（二）沈泽民仍任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率领红二十五军的第七十四、七十五师、独立四师、独立一师一个团和七个独立团，共计十五个团，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sup>②</sup>

黄柴畈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外线作战，这个决定在当时条件下是必要的，也是及时的。毛泽东同志曾指出：“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但也有防御和后退——这种说法才是完全正确的。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运动。”如前所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反“围剿”斗争胜利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只是由于张国焘坚持错误的形势估计和错误的战略方针，结果使红四方面军在敌人的严重“围剿”面前处于无能的地位，在这种条件下，在内线反击已无胜利希望，只有及时转入外线，调动敌人离开根据地，待机破敌。这是革命军队应该采取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步骤。当然，这同主张放弃革命根据地的逃跑主义是根本不相同的。同时，我们还认为，不仅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外线作战是必要的，而且转移的方

<sup>①</sup> 《中央致鄂豫皖苏区省委信》，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五日。

<sup>②</sup> 参见徐向前、倪志亮：《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

向选择在京汉路西也是正确的。因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南靠长江，北临黄河，东面是津浦路，这三方面的军事要道，均为国民党重兵驻守。当时，只有西面比较有利，这里有桐柏山、大洪山等有利地势，又有鄂豫边游击根据地的基础，还可以得到湘鄂西地区贺龙等同志领导的红军相配合。

黄柴畈会议后，七月十一日黄昏，红四方面军的西征军集中于四姑墩，各师的负责人为：第十师师长王宏坤，政治委员周纯全，政治部主任傅钟，第十一师师长倪志亮，政治委员李先念，政治部主任周光坦，第十二师师长旷继勋，政治委员甘元景，代政治部主任韩继祖，副师长何畏，第七十三师师长王树声，政治委员张广才，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女）。少共国际团团团长陈友寿，政治委员（缺）。总计十三个团，连总部直属各单位，共约二万余人，枪一万五千余支，<sup>①</sup>分为左、右两纵队，开始向西进发。

西征途中，张国焘违背了黄柴畈会议的决定。十月十六日，红四方面军进驻鲍家店时，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讨论军事行动方针时，多数同志建议南下与红三军<sup>②</sup>会合，以便集中力量打击敌人，待机打回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这时，张国焘无重返根据地的决心，强调目标太大，给养困难，加以拒绝，决定继续西进。不久，他就将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改称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因为这样，红四方面军主力在转到外线后，虽然广大指战员仍然准备打回去，徐向前等同志也计划去枣阳县新集地区反

① 参见徐向前、倪志亮：《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

② 活动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红三军，在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后，于一九三二年九月间，转移到大洪山一带休整，后闻红四方面军西征，也跟踪西进，由随县、枣阳北上桐柏山，准备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由于种种原因，两军没有会合。

击敌人，创造条件，打回根据地，由于在张国焘逃跑主义指导下，均未能实现。红四方面军主力从湖北经河南去陕西，于十二月进入汉中地区，行程三千余里，一再翻越秦岭，涉汉水，翻巴山，途经二百余里无人烟地区，加上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困难极为严重。但是，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发扬了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歼敌近万人，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自己保存一万五千人，胜利地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这时，蒋介石正集中五十万兵力集中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对红四方面军还来不及组织新的进攻；四川、陕西两省军阀内部又是矛盾重重，加上当地党组织有长期的工作基础，这些条件，有利于红四方面军在川、陕两省边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到一九三三年十月，英雄的红四方面军又在川、陕边区创建了一块包括二十三个县（市）的革命政权和四百八十余万人口的革命根据地，部队由入川时四个师一万余人，发展到八万人。

综上所述，红四方面军在强敌围攻的严重形势下，毅然决定跳出敌人包围圈，转入外线作战，保存了一支坚强的革命武装，并以它为骨干力量，迅速地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因此，我们决不同意把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军事行动指责为“西逃”的说法。其实，毛泽东同志对于这个问题早已作了明确结论。他说：蒋介石“集中了数十万军队进攻鄂豫皖与湘鄂西苏区，压迫红军离开围绕武汉的区域。在我们方面，虽然因为要避免与过于强大的敌人力量作战，因为我们主观上某些策略的错误，红四方面军不能不退出鄂豫皖苏区，作了有名的远征，但红四（方面）军在四川南江、宣汉、绥定一带创造了新的广大的苏维埃根据地。……红四方面军的英勇善战，在

不足一年之内，已经在二十余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已经发展了十倍以上的红军队伍，号召了整个四川的工农劳动群众与白军兵士倾向于苏维埃革命，在中国西北部建立下苏维埃革命的强有力的根据地。”<sup>①</sup>当然，也应该指出，我们在充分肯定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实行西征的同时，由于张国焘机会主义的领导，在这次战略退却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主要是：第一，对于红四方面军实行战略转移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张国焘没有报告党中央就走了，尽管当时鄂豫皖分局同中央失去联系，难以及时报告党中央，但从组织原则上看，这样作法是错误的；第二，仓促退却，没有深入政治动员。红四方面军这次战略转移，是打了败仗后被迫行动的，并不是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因此，没有在部队中广泛地进行政治动员，甚至师一级的干部也不明确部队行动的目标。也不通知当时留在鄂豫皖边区坚持斗争的沈泽民等省委负责人；第三，缺乏周密的计划，留在内线的兵力不足。当时虽然留下十五个团，其中大部分是地方武装，增加了留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军作战的困难。

---

<sup>①</sup>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载《苏维埃中国》，第二四八页。

# 李鼎铭传略

李敬谦 熊宇良

李鼎铭先生，是一位为人们所熟知的人物。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一年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曾经写道：“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下面介绍的，是李鼎铭先生一生的简略情况。

——编者

李鼎铭，原名丰功，陕西省米脂县桃镇人。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清光绪七年阴历八月初六）出生于一个中农家庭。一九四一年后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是陕北著名的开明绅士。

李鼎铭幼年家贫，无力延师。一八九五年寄住舅父家中就读，他学习勤奋，还兼习医学。一九〇三年，赴绥德州应考。取为廪生。

一九〇四年，李鼎铭在本地教私塾。一九一〇年受聘于绥德中学堂任教。辛亥革命后，他拥护孙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张，身体力行，提倡放足、剪发、禁赌，破除迷信，兴办学校。一九一三

年任米脂县米东区区长期间，他利用临水寺庙宇开办米脂县第一所国民小学，并兼任校长。一九一六年，受聘于榆林中学，担任国文、数学教员。一九一八年返乡，在家乡一带行医，并和当地群众在桃镇创办国民高等小学，担任校长，在教学中主张给学生讲些科学知识。他从事教育十余年，成绩卓著，颇受群众的欢迎。

一九二三年，李鼎铭担任榆林道尹公署顾问、科长等职。一九二六年因病旋里，一面行医，一面为地方公益事业服务。例如当群众与榆林道镇守使井岳秀部下一个专门敲榨勒索老百姓的所谓剧团发生冲突，并打死了一名坏头目时，李鼎铭挺身而出，站在群众一边，奔赴榆林找井岳秀交涉，终于使事态平息。他还为维护本乡群众某些利益，经常与官府及城内豪绅据理相争。一九三〇年后，李鼎铭一直住米脂县城内，继续行医。尽管在这期间，他经济拮据，但多次拒绝了杨家沟大地主马醒民等要他做总管家的邀请。群众说，李鼎铭一不贪财，二不要官，主持正义，为人公正，因而在群众中颇有影响。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对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反复“围剿”。一九三四年至三五年上半年，米脂县长及反动军官孙绍山妄图趁机破坏米东区共产党组织，李鼎铭担任米东区所谓“肃反”委员会主任，曾一度反对革命。三六年他继续行医，还担任米脂县财务委员会主席。

一九三五年十月，党中央、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由于我党政策的影响和日寇侵略的加深，对李鼎铭的思想转变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由于他的学生中有共产党员郭洪涛、艾楚南、张汉武等对他的多次争取，以及他的二儿子李力果<sup>①</sup>早年参加革

<sup>①</sup> 李力果一九二六年参加革命，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曾任唐山市委书记，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等职。一九五八年病故于北京。



命的影响，加上他自幼生长在农村，壮时行医又较多地接触广大农户，使他晚年思想有了较大的转变，并随时代不断前进。“七七”事变后，李鼎铭逐步接受我党领导，拥护党的团结抗日的政治主张，反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

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为了加强根据地民主政权的建设，实行“三三制”，开展普选运动，李鼎铭代表开明绅士被选为米脂县参议长，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副议长。是年冬在边区第二届一次参议会上，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他在《就职演说》一文中，对自己的思想作了诚恳的解剖。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边区第二届二次参议会及一九四六年四月边区第三届一次参议会上，均再次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李鼎铭自参加边区政府工作以后，注意学习党的政策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在工作中勇于负责，敢于大胆地提出各种建设性的政见。众所周知，一九四一年正当陕甘宁边区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困封锁，经济处于严重困难时期，他在边区第二届一次参议会上，提出“精兵简政”的提案，毛泽东同志当时非常重视，不但一字一句把内容记下来，而且还写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后来，毛泽东同志又给予高度评价说：“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精兵简政政策不但在陕甘宁边区实行，党中央还把这个政策推广到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对战胜困难，提高工作效率起了积极作用。一九四二年至四三年，李鼎铭还根据陕北的特点，提倡精耕细作，多种洋芋，推广养蚕，种棉造林，纺毛织布制皮子，移民开荒等措施，促进了农业生产。

李鼎铭真心诚意与共产党合作，一九四二年七月，在接见晋西北绅士参观团时说：共产党是进步的政党。余今年虽六十，但已决心和共产党患难与共，休戚相关。……从共产党此次整顿三风中，可以看出共产党已切切实实谋与党外人士合作，此我更深信不疑。”一九四三年一月，他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邀请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发言及同年七月在《七七专刊》上发表文章，热情帮助和盛赞我党开展的整风运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李鼎铭在陕甘宁边区召开的劳动英雄代表大会闭幕式讲话中，满腔热情的赞扬我八路军说：“这样的军队，我是没有见过的，所以我们要尽心尽力的拥护军队。”一九四四年，看到边区部队在生产节约上取得巨大成绩时，他又兴奋地对记者说：“几千年来，国家养的兵，都是穿老百姓吃老百姓的，唯独我们八路军，除了打仗以外，还进行生产，自给自足，并帮助人民春耕夏耘秋收，这是天下少有的。”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在边区二届二次参议会上，他作了《文教工作的方向》的专题发言，对边区消灭文盲、培养知识分子、普及卫生习惯等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改进意见。一九四五年，李鼎铭被推选为陕甘宁边区出席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留守兵团政治部还给他赠送一面“民主典范”的光荣匾。

李鼎铭对全国政局的发展也十分关心。每当时局逆转或胜利，他都要发表文章或谈话。一九四三年，当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他义愤填膺地指出：“反共就是反对三民主义，进攻边区就是破坏团结抗战。”严正地痛斥了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滔天罪行。同年他还发表了《驳斥关于我被‘撤职’的谣言》一文，有力地揭穿了敌人挑拨离间，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伎俩。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企图发动全面内战，天空出

现一片乌云，中国面临两个命运、两种前途大决战的历史关头，李鼎铭能继续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一边，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内战政策。一九四六年三月在接见记者谈到关于中苏友谊问题时，以及同年四月在边区第三届一次参议会上作的《关于选举工作报告》中，他斥责蒋介石指友为敌，发动内战，欺骗国统区人民参加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卑劣行径，号召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和平民主而斗争。当蒋介石、胡宗南匪帮进攻延安时，他随陕甘宁边区政府转战陕北。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他极表赞同；他说：“共产党发动群众彻底平分土地，审查干部和党员，这两项政策伟大极了，有了这两项政策，它将保证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必然成功。”

李鼎铭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任职七年，贡献颇多。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上午六时，他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临时驻地绥德县义合镇突患脑出血症病故。边区政府曾举行追悼会，表示哀悼，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陕甘宁边区政府都送了挽词。毛主席亲书的挽词中说：“李鼎铭先生与其他许多和先生一样的开明绅士，在中国人民民族民主斗争的困难时期，在日本帝国主义者进攻中国时期，在美帝国主义者援助蒋介石匪帮举行反革命内战时期，抱着正义感毅然和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人民民主事业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一切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蒋介石独裁，赞助人民革命战争，同情消灭封建制度，实现土地改革的真正爱国的民主的开明绅士，无论在过去与现在，都是中国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一分子。对于李鼎铭先生的逝世，表示我们的哀悼之意。”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李鼎铭家乡群众的要求，决定将米脂县桃镇小学命名为“桃镇鼎铭学校”，以资纪念。

## 关于张汉民烈士的资料

〔编者按〕 张汉民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早年参加革命，从事秘密工作，为党的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一九三五年间，由于某些原因，他不幸被误杀了。下面的两份资料，对当时的情形分别作了介绍，因为所处地位不同，谈的也不尽相同（包括张汉民同志遇害的时间），尚有待于进一步的查证和研究。

### 张汉民同志是怎么牺牲的<sup>①</sup>

周 益 三

张汉民同志，山西省稷山县人，一九〇三年出生在一个农民的家庭。一九二四年，他毅然放弃升学机会，西渡黄河，到了陕北安边杨虎城将军创办的、训练基层军官的教导队学习军事。第二年下半年，他率部驻守三原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三

① 本文原题《追念张汉民同志》，刊用时作了删节——编者。

〇年杨虎城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汉民被任命为省政府卫士营营长；翌年该营扩编为警卫团，汉民任团长。他利用合法身份扩充队伍，为党秘密地进行工作。截至一九三四年，全团的共产党员已达二百余人；以后又在宁强、勉县以招考文书为名，先后吸收地方上的党员二十多人，将他们安排在各个基层。

三三年下半年，汉民两次派共产党员张含辉携带军用地图和大批医药去川北同红四方面军联络，计划打出红旗，同红四方面军汇合，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则认为，在杨虎城的旗帜下从事秘密斗争，对革命更为有利。汉民对我说：现在必须等待一下，杨虎城将军曾答应给我编一个旅，这一计划如成事实，部队可能进驻关中西部的淳化、耀县或彬县、长武，那时就可以插红旗大干革命，北与红二十六军刘志丹的部队联成一片，在淳耀以西陕甘边一带，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了。三五年二月二十七日，警卫团奉命扩编为警备第三旅，汉民被任命为旅长。

警卫团扩编之后，汉民对旅、团正在进行初步调整，转战中的红二十五军，已由湖北郧西一带，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神速地攻到佛坪，消灭了驻军十七路军的张飞生旅，并从那里向东运动。汉民接到西安绥靖公署命其堵击红军的命令之后，一面派人去红二十五军送信，一面率七、九两个团由镇安出发尾随红二十五军。三月十七日，当部队行进至菜玉瑶地区时，有的同志即提出，送情报的同志未回，值得注意，可等去上海中央局请示我旅与红二十五军协同问题的汪锋同志到来再动（当时汪锋已回到西安，缓行一两天即可等到）。汉民同志认为我们已与红二十五军来往数次，并定好互不侵犯条约，相随亦非一日，并未违约开火，绝对没有问题，于是按计划尾随前进，十八日到曹家坪，十

九日向目的地九间房（属柞水）前进。

当时九团任前卫，于部队前进中，阎揆要团长每进一段路程，即向汉民报告所见情况。十九日下午，快到九间房附近，揆要同志报告红军业已坚壁清野，沟内似有埋伏，但汉民同志坚持己见，仍命大胆前进，毫无戒备，他和平时一样的轻松闲散，途中还与红军一个洗衣队女队员拉闲话。当先头部队已进到九间房，部队正在集结准备宿营，左侧宿营警戒即将上山时，枪声大作，为避免交火，汉民同志当即决定向左侧山撤退，刹那间，红二十五军已从正面和两侧冲来，警三旅遂溃不成军，除未进入宿营地的官兵逃出外，其余都被包围俘走，张汉民同志亦被俘去，战斗不到一小时即告结束。俘去的官兵，仅有少数几个非党人员被释放回来，大部都被错杀。

逃出的官兵，当日由阎揆要同志收集在曹家坪，第二天回驻菜玉瑶，恰巧汪锋同志来到部队驻地，揆要便向汪锋谈了九间房发生的情况，第三天，汪锋即赴红二十五军驻地葛牌镇，传达上海中央局的指示，并营救汉民同志和其它被俘官兵，不料反被拘押，被带到陕北，直到党中央抵达陕北后，汪始获释返回西安。这时得知，事件发生后，红二十五军已将张汉民同志等共产党员错当反革命处决。

这一不幸，形式上红军胜了，“白军”失败了，但却牺牲了我党培养多年的许多好同志，成为党史中一个亲痛仇快的沉痛教训。

## 张汉民同志被杀经过

徐 文 伯

一九三五年三月下旬，红二十五军占领柞水城后，正准备休息半日，杨虎城部张汉民旅（警三旅，是由原警卫团扩编的）赶到柞水附近，与我军接触。我军急转菜玉窑，敌人进占柞水县城。次日我军进至曹家坪，敌人进驻菜玉窑，见敌人紧追我军，军政委吴焕先、军参谋长戴季英审问张汉民派来取联系的一个姓张的人，据他供称：“张汉民原是共产党员，四方面军经陕西入川时，张汉民是警备一团团长，在子午镇截击四方面军，俘去六百多人，缴枪四百多支。杨虎城很高兴，后派他镇守汉中，对付四方面军。从此张汉民退出共产党，加入法西斯蒂。二十五军到陕南后，又调他来进攻二十五军。张汉民进军顺利，杨虎城升他为旅长。这时张汉民积极想消灭红军，继续报功。”吴焕先同志把上述情况向徐海东同志说了。因为张汉民旅追击红二十五军很紧，使部队得不到休息，甚至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因此当时鄂豫陕省委书记徐宝珊、吴焕先、徐海东、戴季英共同研究对策时（程子华同志因负重伤未参加讨论），分析万一张汉民叛变了，情况紧急，是要红二十五军呢？还是要张汉民呢？经过充分讨论，最后决定，为了保存革命的动力，使红二十五军不受损失，

坚决打一仗。四月七日，我军由蓝田县葛牌镇南返数十里，在九间房设伏。当时还留了一个余地，如果张汉民真想消灭我军，继续尾追，我们就坚决地消灭他，如果不再追来就算了。约十二点钟，张汉民旅继续追来。在军领导指挥下，全军指战员英勇奋战，分三路打下去，将张汉民旅的五个营全歼，生俘了旅长张汉民。

一九六〇年写红二十五军战史时，据张体学同志（当时红二十五军交通队队长）回忆，他对徐海东同志说：“戴季英同志在处理张汉民旅战俘时，张汉民说他是共产党员，并要一些是共产党员的战俘出来作证。戴季英不信，就把张汉民和这些出来作证的人，一起杀了。”后来，西北地下党组织证明张汉民同志没有叛变党，所以，张汉民等同志是属于误杀。写红二十五军战史时，徐海东同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红二十五军决定打张汉民旅是对的，杀张汉民等同志是错误的，这也是红二十五军的一个沉痛的教训。”

以上是根据我父亲徐海东生前的回忆整理。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四日）